

1984
革新版

5

夏潮論壇

焦點

台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昨日・今日・明日(一)

南方朔：面臨解體危機的黨外運動



台灣黨外運動的社會分析

再論《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趙福島

給許信良的一封信●陳鼓應

- 華勒沙・諾貝爾和平獎受獎演辭●警總陰影籠罩《高山青》●中共找回了「北京人」
- 春風：三十年來第一本被查禁的詩刊

黨外知性的挑戰！中產階級不動員症的總診斷！

夏潮論壇

黨外言論・

風雨再起!!

1984
革新版

進步的黨外，讀進步的雜誌!!

三月號焦點：台灣結的大體解剖

- 二十年來台灣意識的真相與虛相

四月號焦點：是誰真正統治著台灣？

- 如果您認為只有國民黨在台灣統治一切，您就錯了！



請逕向本社訂閱，
學生和勞工團體五折優待

郵撥帳號 / 714363

電話 /
(02)708-4191

夏潮論壇

一九八四年五月號
第14期 / 總第八卷 · 第三期

名譽發行人 / 楊遠 · 黃順興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務顧問 / 何春木 · 吳陳惠珍 · 洪壽美
高信雄 · 蔡伯堯 · 蘇惠珍 · 李信志

名譽社長 / 蘇逸凡
社長 / 王永
執行主編 / 梁春幼
編輯組 / 張元平 · 田華容 · 李勁春
陳秀賢 (南部採訪編輯)

資料室 / 于青
法律顧問 / 湯金全
發行所 /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87號4F
編輯部 / 台北市安居街8巷6弄5號3F
經理部
電話 / (02)708-4191 (02)7038504
郵撥帳號 / 714363王永帳戶
零售 / 每冊國內新台幣80元 國外美金3.5元
長期訂戶 / 國內：全年12期730元 · 半年40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40元
亞太地區美金35元
港澳地區美金32元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 J. 07932
U. S. 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104
Berkeley Ca. 94704
U. S. A

北美業務部 / Mr. Wan-Lai Chao
1765 W. 49th St.
L. A. CA 90062 U. S. 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
但請註明出處。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宏恩書報社 電話：(032)280212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芙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榮正書局 電話：(038)359352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文強堂書報社 電話：(035)239207
花蓮文具行 電話：(038)322941

□榮譽訂戶：

凡捐助5000元以上，
即為本刊榮譽訂戶，
並長期贈閱本刊。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請開本刊英文全名 CHINA
TIDE REVIEW 或「夏潮論壇雜誌社」



不歸之路

在大眾消費社會下，
黨外逐漸成爲一種商品
；在走向上，把群眾變
成觀眾，把賣得最好的
，認爲是最好的黨外，
漸漸走上「劣幣驅逐良
幣」的不歸之路。

文 / 南方朔
圖 / 梁正居



△ 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面臨解體之危機。(頁2)



△ 陳鼓應要求許信良不要違反民主原則。(頁25)



△ 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不得不減去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人口。(頁14)



△ 資本主義下的台灣消費社會。(頁18)



人(頁66)

■ 版權 頁
■ 目錄 錄
■ 編輯部評論
■ 卷首語
停止爭論，加緊反省，從頭做起

■ 特別企劃 ■ 台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昨日·今日·明日(一)

面臨解體危機的黨外運動

南方朔 2

再論「台灣一千八百萬人」

趙福島 14

台灣黨外運動的社會分析

台灣現況的社會力分析，為台灣民主運動提供新的探索、新的運動指向

林文彰 18

大衆辭典

中產階級

本刊資料室 24

海峽濤聲

給許信良的一封信

陳鼓應 25

生意經和拍洋屁——許忠仁

台灣治安好在哪裏？——黃順興

「春風」創刊，警總查禁——陳省民

全斗煥打了阿Q一巴掌——黃承興

鮑島和兄弟之邦——金惟名

台灣女工被扣產假臺灣——蕭艾

警總陰影籠罩「高山青」——韓惠萍

劉家昌排名第八十五——李小中

特別報導

雷根訪問中國大陸

王開 40

賴和入祀大典實況

康橋 42

名古屋反核運動

李立苓 44

蘇俄電腦背叛老大哥

周濤音 46

電腦工業的發展力量，跨越了意識型態、東方和西方，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環球經濟

國際最難唸的經

周世櫻 48

台灣跨國企業廠商排名

張元平 50

一般認為，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投資政策，將加速新興國家的工業化，事實則不然。本文揭開跨國公司的真象

台灣與世界

〈台灣與台灣人〉

戴國輝著 52

吳濁流的世界(中)

洪鯤譯

工人廣場

阿義的礦工歲月

士盛 58

台灣第一——礦工死亡率

張望 64

華勒沙演講辭

工人與世界和平的希望

沐皮每譯 66



△四月廿六日，雷根在北京下機。禁不住向獻花的小女孩瞄了一眼。走在中央帶眼鏡者，即為中共外交部長。(頁40)



△人由於勞動，變成工廠的真正主人(頁66)



△資本主義下的台灣消費社會。(頁18)



△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不得不減去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人口(頁14)

官商財系、厚利口腹
台灣女工被扣產假臺灣——蕭艾
警總陰影籠罩「高山青」——韓惠萍
劉家昌排名第八十五——李小中

■特別報導■

雷根訪問中國大陸

王開 40

賴和入祀大典實況

康橋 42

名古屋反核運動

李立苓 44

蘇俄電腦背叛老大哥

周濤音 46

電腦工業的發展力量，跨越了意識型態、東方和西方，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環球經濟■

國際最難唸的經

周世櫻 48

台灣跨國企業廠商排名

張元平 50

一般總認為，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投資政策，將加速新興國家的工業化，事實則不然。本文揭開跨國公司的真象

■台灣與世界■

〈台灣與台灣人〉

戴國輝著 52

吳濁流的世界(中)

洪鯤譯

■工人廣場■

阿義的礦工歲月

士盛 58

台灣第一——礦工死亡率

張望 64

華勒沙演講辭

林波海譯 66

工人與世界和平的希望

華勒沙以一個工人的眼光，來看世界，呼籲工人起來談判

■海外短波■

巴西的左派和右派(周正宏)

73

韓國教會和獨裁政府(楊布仁)

蘇俄拒絕參加洛城奧運(王開)

中共找回北京人?(李立威)

美國人為何也叫窮?(高聞道)

艾奎諾的死亡錄音(卓同)

雷根為什麼佈雷?(張元平)

■每月評論■

(台灣話)和(台北國語)

洪鯤 82

追究公害

黃順興 86

不選也罷! 馬可仕表演選舉鬧劇

黃順興 87

楊麗花換腔走板

因是非 88

台灣的土洋之爭

孫隆基 93

■電影文化■

殖民與反殖民——台灣早期的電影活動

陳國富 97

■人物訪談■

社會主義·運動與理論的困境

本刊資料室 104

■讀者來函■

112

停止爭論，加緊反省，從頭做起

編輯部評論

最近以來，黨外內部「中國」與「台灣」歷史關係的公開議論，固然在二十年來黨外文化的歷史上，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在基本上，「中國」與「台灣」的分合，並不是黨外運動關切的焦點。因此我們主張適當地結束這個議論。我們的理由有二：

一、台灣黨外運動，在基本上，是二十年來台灣新興的自由中產階級政治上要求權利，經濟上要求地位的一個運動。在形式上，它主要表現為選舉參政的運動；在思想上，它主張議會政治、開放社會、自由經濟、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等等。在社會上，這個運動與二十年來台灣經濟、社會的繁榮與發展，和台灣自由中產階級的興起互相照映。因此，二十多年來台灣黨外政治運動，是台灣自由中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在這個社會定性上，顯示了運動的若干優點：即人權、自由、民主、公平的選舉，自由之經濟；這些比較上革新的思想和價值；同時，也顯示了運動的一些缺點：即基於台灣中產階級獨立性、意志力和創意的缺如，所顯示的機會主義，軟弱、依賴；這些影響深遠的性格。因此，所謂「中國民族」對「台灣民族」的支配論，在台灣生活的現實上，根本是虛構的，不存在的。從而反映在意識上，所謂「中國」與「台灣」分合的爭論，根本就不不是黨外群眾關心的焦點。這只要調查絕大多數黨外民衆、知識份子和青年就有明顯的答案。

二、正如松永正義先生在「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這篇論文所指出（本刊將於下期刊出），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同質性格，表現在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歷史中，台灣與大陸在為了中國的出路探索的歷次鬥爭和運動中，顯示出共同的方向性和共同的切身性這個同一基礎上。但是，正如日本殖民體制下，有一部份台灣中產階級受益於該體制，從而在複雜的殖民——反殖民鬥爭中，一時地突出一島的改革論，一時地脫出台灣向着中國出路共同探索的主軸（例如蔡培火的右翼台灣自治運動）一樣，在當前東西對立的、美國支配的介入，中共政治的失敗、國府政治遺留下來的若干歷史問題之下，台灣與大陸隔絕卅年，又因為當前一島戒嚴體制，沒有工會，沒有學生運動，台灣工商階級得以進行自由的榨取，蓄積資本而獲得一定的利益。故台灣分離主義即是在這獨特的歷史，獨特的社會政治和國際關係下，產生一時的一島改革論。這一島改革論，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自然也將有一定的歷史條件的終末消失。因此我們不主張誇大地擴大這個爭論。

我們因此毋寧是寄希望於有思想的黨外民衆、知識份子和青年，集中他們的注意力，從事謙虛、嚴肅和認真的反省、檢討和探索的工作。這一期，我們推出南方朔先生繼「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後又一重要的著作「台灣民主運動史論」，目的就在於展開黨外內部深刻的反省性思考。在台灣大眾消費社會形成的過程中，黨外批判運動和反對運動的商品化問題；大眾傳播對於反對訊息的異化問題；權威國家支配結構的形成與台灣中產階級的政治不動員症問題；黨外運動中，中產階級的虛無主義、宗派主義問題；第三世界——以及台灣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弱質問題

：這些具體而又要求着深刻的理論分析的難題，要求黨外對之做認真的研究、調查、思考和分析。此外，在全球性資本主義體系和新舊殖民主義的世界結構下，中國連帶地是台灣的出路；黨外運動對美國的依存關係，也擺在認真思考問題的黨外知識份子和民衆的面前，等待着解決。

但是，反省和檢討的工作，首先要要求黨外要有一定的知性，和文化思想的高度。因此，在對於二十年來黨外運動中所存在的諸問題，進行反省、批判和探索的同時，有意識地養成有知識、有文化、有思想的黨外革新知識份子，成為當務之急。少數當前黨外比較讀書、比較有知識的知識份子，由於台灣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在吸收來自國外的批判思想，不及在台灣具體生活中加以消化時，和民衆間形成一道越來越深的鴻溝，越來越失去共同的語言，從而個人的批判思索，形成不斷的「縮小再生產」的過程，終於在——群喪失了目標、向着對商品之不知饜足的貪欲狂奔、失去了理想、憤怒、感動和愛的力量。也落在「消費者」所構成的汪洋大海中，成為一葉孤獨的島嶼。

戰後日本三十多年間，在野的革新政黨和知識份子，始終無法改變戰後日本長期的保守政治體系，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從大正時代發展，經過三十年代，達到發展的顛峯，又在苛刻的戰時法西斯體制下經過考驗的日本革新系政治運動，固然在戰後受到美國麥帥本部一時的壓抑，但隨著日本保守政系領導下，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進入豐裕期的日本經濟、社會結構，只有使革新系的運動和思想不斷地無力化，即使在一個像日本那樣「自由」的社會中，却無從發展。面對着台灣式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和國民黨在新一代留美技術官僚逐漸接管下，統治的手段已顯明地向「資本主義合理化管理」蛻變。故台灣中產階級黨外，急需要充份掌握住當前台灣社會、經濟、生活的實質，找出運動所面臨的問題點。否則，只是一味沈醉在「美麗島連綫的勝利」、「公職掛帥批判」、「一千八百萬居民自決」；這些不負責任而又武斷否定的囁語中，而整個黨外運動可能被歷史和民衆無情地棄絕。

目前台灣黨外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中心任務，是爭取自由、民主、人權和社會公平。在爭取自由、民主、人權和社會公平這個目標下，黨外民衆、知識份子和青年，應該不分階級、派別、立場，團結奮鬥，共同建設一個有民主、有自由、有社會公平、有人權保障的台灣，並且以這經驗做為全中國民主、自由、人權和社會公平之建設的重要參考。台灣民衆、知識份子和青年因此寄厚望於今日黨外，認真真地做好反省、檢討和認知的的工作，老老實實地領導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和社會公平的運動，除此之外，廣泛的黨外群眾，知識份子和青年，對於「統、獨」爭論，根本沒有興趣。我們因此主張根本上停止所謂兩個「結」和兩個「意識」的爭論，把分離運動和當面台灣黨外政治運動徹底劃分開來，從頭做起，使黨外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真正地負起制衡，和促進民主、自由的功能。

*

卷首語

本期特別企劃「台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昨日、今日、明日」，是本刊長期策劃的，一系列即將陸續推出的重點探討。由於於廿多年來，台灣的民主運動從萌芽到倒退，從中智派擡頭到美麗島時期，一度引起台灣人民相當熱切的期望。這個運動，也一

以上三篇，乃是本期的討論重點，也是「台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昨日、今日、明日」這個特別企劃所推出的第一篇，並由於篇幅受限，本期先刊導論「面臨解體危機的黨外」，本論及結論將陸續在本刊刊出，敬請黨外思想界熱烈期待。

本期的「特別報導」，乃針對歷史、時事、科技、反核等問題，分別登出本月的重點話題，內容上不僅要求可讀性，並提供讀者知的樂趣。

就環球經濟而言，新殖民經濟才是真正的國際黑手黨，他的



△人由於勞動，變成工廠的真正主人



△四月廿六日，雷根在北京下機。禁不住向獻花的小女孩瞄了一眼。走在中央帶眼鏡者，即為中共外交部長。(頁40)

華勒沙以一個工人的眼光，來看世界，呼籲工人起來談判

海外短波

巴西的左派和右派(周正宏)
韓國教會和獨裁政府(楊布仁)
蘇俄拒絕參加洛城奧運(王開)
中共找回北京人?(李立威)
美國人為何也叫窮?(高聞道)
艾奎諾的死亡錄音(卓同)
雷根為什麼佈雷?(張元平)

每月評論

(台灣話)和(台北國語)

洪鯤 82

追究公害

黃順興 86

不選也罷！馬可仕表演選舉鬧劇

黃順興 87

楊麗花換腔走板

因是非 88

台灣的土洋之爭

孫隆基 93

電影文化

殖民與反殖民——台灣早期的電影活動

陳國富 97

人物訪談

社會主義：運動與理論的困境

本刊資料室 104

讀者來函

112

卷首語

本期特別企劃「台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昨日、今日、明日」，是本刊長期策劃的，一系列即將陸續推出的重點探討。由於廿多年來，台灣的民主運動從萌芽到倒退，從中智派擡頭到麗島時期，一度引起台灣人民相當熱切的期望。這個運動，也一度以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為首功，他們以新興的中小企業為社會基礎，廣泛地展開黨外運動，他們的熱情與智忱，曾經獲得民眾讚賞，但他們究竟為誰發言？為甚麼不公不而出力？這是「台灣黨外運動的社會分析」乙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自稱「台灣民間學者」的南方朔，繼「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及「憤怒之愛」，「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之後，再次出發，撰寫「台灣民主運動史論」。南方朔誠摯地談到，黨外面對一個運動的高原期，除了票源明顯下降，「黨外」已成爲一種反抗的商品。面對著台灣今日社會，人人爲衣食忙碌，爲消費慾望所引領，造成人人無力的「政治不動員症」，因而南方朔宣稱，所謂「中產階級作爲改革動力的時代」，已告結束。這篇洋洋灑灑、論證嚴謹的導論篇，應是本期的重點文章之一，也甚爲可讀。

再論「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是以另一層面的社會分析，爲黨外運動提出關切性的質疑，從而探索新的運動導向，也從人口分析比較中，讀者得以進行思考判斷。

以上三篇，乃是本期的討論重點，也是「台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昨日、今日、明日」這個特別企劃所推出的第一篇，並由於篇幅受限，本期先刊導論「面臨解體危機的黨外」，本論及結論將陸續在本刊公刊，敬請黨外思想界熱烈期待。

本期的「特別報導」，乃針對歷史、時事、科技、反核等問題，分別登出本月的重點話題，內容上不僅要求可讀性，並提供讀者知的樂趣。

就環球經濟而言，新殖民經濟才是真正的國際黑手黨，他的名字就叫「跨國公司」。在舊殖民地時代，外國侵略以槍炮武力爲後盾，對落後國家實行經濟侵略，現在，新的殖民經濟却是一群西裝筆挺的人，挾持最新式的資訊與設備，以龐大的環球性投資，壟斷國際自由市場。至目前爲止，大概除了中央情報局之外，美國沒有一件創舉，像跨國公司這樣，引起世人如此深重的猜忌、疑慮和譴責。本期「國際最難唸的(生意)經」，即是探討這項問題，相信這是讀者所關注的。

「臺灣話」與「台北國語」乙文，是針對台灣最近探討語言問題而作的文章，我們歡迎大家公開來討論。

「臺灣的土洋之爭」，是本刊從孫隆基先生所著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節錄登出，特此致謝。「楊麗花換腔走板」是一篇嚴肅的文章，作者除了飽學多識，在文字學和語音學方面很大功夫，在文中提出「楊麗花價值錯亂與知識人價值錯亂」的問題，值得我們一讀。

這一期出版，又逢「五一」勞動節，本刊除了刊登一篇工人自己寫的「阿義的礦坑歲月」，謹在此向台灣的工人致敬！

臺灣中產階級政治運動的
昨日、今日、明日 (一)

面臨著解體危機 的黨外運動

● 南方朔

編按：

自稱「台灣民間學者」的南方朔，繼「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及「憤怒之愛」，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之後，再次出發，撰寫「台灣民主運動史論」。這篇史論的論旨由黨外票源凝聚力的倒退出發，追溯台灣民主運動是世界性反抗運動的「依賴文化」產物，這種依賴性及依賴性造成的扭曲，使得台灣的民主運動者因而無法正確的觀照台灣社會，自亦無法適當的採取合宜的民主策略。根據社會民主主義者——法儒波南札斯以及德儒哈伯馬斯等的理論，南方朔認為目前的台灣社會已日漸成為「權威式的國家管制主義」和「消費主義」併存的體制，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台灣的民主運動必須走上另一個負責任而卻艱苦的新歷程。



● 美麗島事件大審

「我們必須指出，紐約這些吵嚷不休的知識份子，當他們夸夸而談共產主義時，他們也同時大談特談現代主義的重要性，他們可真有知識份子的天賦，這使得他們縱非該問題的專家，但也能隨時在國際重大問題上發表意見；這正如同他們雖然未受傳統文學訓練，但也能適時發表文學意見一樣。……老一輩紐約知識份子對政治和文學並無充份知識，但卻任意作評論的作風是不會長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知識份子的確已變得更加專業了。……從以前到現在，紐約知識份子對政治的介入都很狹窄，我經常對我的夥伴們都敬鬼神而遠之，他們仍然投注太多力量在政治歷史和觀念上，這只不過是我們需要了解並探討的問題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他們關心的問題必須擴及科技的角色，核子武器，福利國家的政府權力擴張，種族衝突，貧國與富國的關係，世界性的移民問題等。這些問題，美國知識份子仍少關心。」

— Nathan Glazer (美國社會學家)

抗運動想要在優勢文化下定義它自己及其世界觀，想要建立一個自我形成的文化建制上層結構，這已變成極端困難或難以想像的工作。在業已集中化了的商業文化世界裡，製造意義的過程類似於勞工創造價值的過程。勞工創造貨物時，他們對製造了甚麼？如何製造？如何分配與使用？毫無置喙的餘地。這正如同意義的製造者，他們對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報導他們的所言所行，以及媒體的整個架構，一樣的無從置喙。」，「面對一個急速就能享有盛名的世界所產生的誘惑與壓力，一個運動已失去了它證明及控制自己領袖的能力。成名乃是運動的一種政治資源，也是達到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但它目前則已墮落成一種需要投資、囤積、戰鬥、或者放棄的個人資源。運動的領導者們，一開始就對自己的領導有著雙重感情，他們對自己的權威和義務感到異常難以掌握。追隨者需要領袖們的領導，但同時又對領袖們的領導感到不安，他們將這種矛盾而混合的訊息傳給領導者，使得領導者的境遇難以自處。」

— Todd Gitlin (美國政治社會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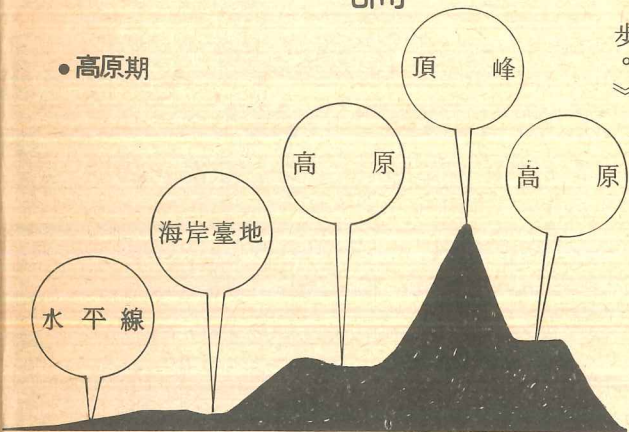


臺灣民主運動史論

在去年底增額立委選舉的前夕，我曾
在「選舉書籍的黃昏」一文中指出：「自
六十八年以後，黨外政論雜誌日多，目前
已到了一個相當飽和的時期，根據粗略的
估計，這些黨外雜誌的總銷數，扣除可能
重疊的部份，大致仍維持在『美麗島』雜

誌加上『八十年代』那時的份數，這顯示
黨外在政治意見的市場上大致已到了飽和
時期。至於它帶動的選舉成果方面，經過
三次的選舉，大抵也到了一個穩定的停滯
或緩慢成長的時期。不但如此，黨外的政
論雜誌經過多年的衝刺，它的內容題材，
也開始呈現後繼為艱的局面。所有的這些
事實都顯示出黨外已到了一個『高原期』
」。《編者按：指一個時期或某種層面
，相當平穩，很少改變。或指某個階段，
或個體的學習過程中，停滯不前，不再進
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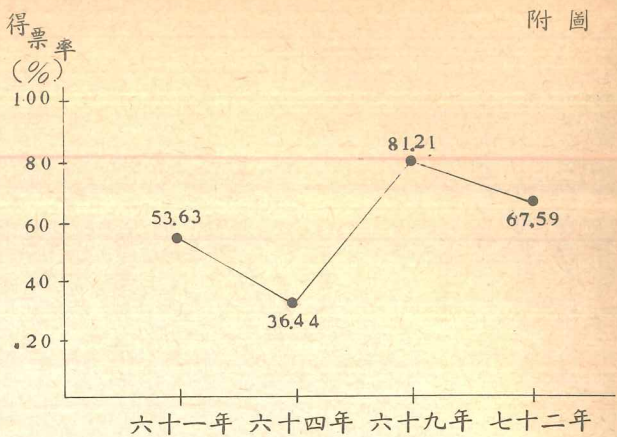
●高原期



●面臨顯著退潮期的 黨外

以上的話，在去年底的選舉中果然不
幸而言中的獲得了印證。在那次選舉之後
，國民黨以及黨外的報紙刊物，仍夸夸而
談的大玩統計魔術，宣稱無黨籍候選人得
票率仍高達百分之廿八點多云云。事實上
，作為一個黨外人士是不能自欺的將「無
黨籍」視為「黨外」的。那次選舉已相當
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得
票率雖無明顯的成長，但黨外對票源的凝
聚力却有了明顯的下降。在概念上，同時
也基於戰略的觀點，國民黨多年來已大致
能恒定的掌握住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選票，
這些票源是國民黨透過細緻的組織操作而
奠定的，黨外大致上很難撼動，因此基於
實際的需要，黨外必須儘量將百分之卅左
右的非國民黨票源集中。在「美麗島」事
件後，黨外的這種票源凝聚力的確有了成
長，但去年底的選舉却又出現倒退。在此
姑且僅舉台北市歷次增額立委選舉的得票
率為例，以見黨外票源凝聚力的減退。（
如附圖）

附圖



●黨外票源凝聚力分析圖

復複雜的實證研究才能探其底蘊的問題，
它可能代表了國民黨選舉操作技術的改進
，也可能代表了中間人士（如黨友或地方
性獨立人士）的可能崛起。總的說，這
可能代表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退潮，對熱衷
於黨外運動的人，這應是足資警惕的現象。
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從理論的觀察以
及現實的印證，都可以找到若干解釋的觀
點。

●中產市民階級作為改革 動力的時代，已告結束

在工業革命後，西方的中產市民階級
（編者按：見本期「大眾辭典」一欄，頁
二四）的確曾是民主改革的動力，當時的

統治者王室貴族在經濟體制上可以說和中
產市民階級並無合作關係，腐化無能的王
室貴族和新生的中產市民階級純粹成爲一
種對立的關係。這種對立的關係促成了當
時的民主改革。不過，這種對立的關係在
現代已不存在，在現代的社會裏，無論是
資本主義成熟的歐美，或如亞非拉的軍事
強人政治，以及共黨社會，都已演變成一
種法國政治思想家波南札斯（N. Poul-
lantzas）所謂的「權威的國家統制體
制」（Authoritarian Statism）。
這樣的結構與體制使得國家機器有著極大
的統制力，「國家機構」（State Appa-
ratus）將造成社會整合力和控制力的
增強。中產市民階級作為改革動力的時代
已告結束。

●國家支配體制和中 產階級的不動員症

中產市民階級作為改革動力的時代業
已結束，這點在米爾斯（C. Wright
Mills）、派克（Richard Parker）
的專門性著作中都有過詳盡的討論和描
述。綜合而言，他們認為歐美社會的中產

如果我們將「票源凝聚力」定義為：
「黨外得票率在非國民黨得票率中所佔的
比率。」，那麼，民國六十一年，黨外票
源凝聚力為百分之五三點六三，爾後依次
為百分之卅六點四四，百分之八一點二一
，百分之六七點五九。黨外票源凝聚力的
倒退是很明顯的事。以上所學的雖然只限
台北市，但台北市以外的地區亦大致都是
這樣的走向。
黨外票源凝聚力的減退，是一個需要



●選舉活動掠影

階級已告凋零，中產市民階級為衣食忙碌，被社會的大機器捲了進去，被消費社會所激起的消費慾望所引領，他們生活在無奈的安逸中，政治上成為無力和不介入的「政治不動員症」(Political Immobility)。

●自由主義業已庸俗化，和現代社會理論脫節

不但已開發國家的中產市民階級有著這種特徵，第三世界國家亦同樣如此。

米爾斯曾經作過如下之痛論：「自由主義是一組明顯的觀念，它曾是西方世俗化傳統的主要部份。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政治高調，它曾是上昇的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自由主義亦為一種社會理論，它描繪了中產階級的英雄時代，這幾點是緊密相連的。作為觀念的承載工具，自由主義業已和任何站得住腳的現代社會理論脫節，它已不再是一種能夠指引人們未來的有用指標。在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的大部份時間，自由派的理論的確曾經澄清並提出過精闢之見，但在廿世紀，它只產生了混淆。自由主義的觀念已和近代社會結構的實體遠離，這使得它成了一個很好的面具

，被那些沒有，以及不能，或者不願實現其理想的人拿來作為藉口。作為一種政治高調，自由主義業已庸俗化，它現在業已普遍的被每一個人拿來，為了各種不同而矛盾之目的而談論。……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性的自由派遂經常產生『猶豫不決崇拜症』，而他們說這是心靈的開放和保持彈性。」

●小商人成了自由主義的英雄

十八以迄本世紀初期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在廿世紀最劇烈的變化，乃是它所強調並歌頌的自由競爭已被廿世紀的保守主義所奪去，自由主義者遂只得將它的英雄形象寄託到小商人身上，米爾斯指出：「在廿世紀初期，小商人以其人格特質，成了自由主義的英雄。小商人被認為是個老傳統的憂鬱的繼承人，他的奮鬥過程愈艱苦，他所獲得的同情及英雄形象就愈明確。但是，這種情況是很悲哀的，因為他不能遵從他所承擔的傳統。」，小商人徘徊瞻顧，它的階級行動性曖昧不明，小商人已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先鋒隊」；當然更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知識怠惰，精神貧乏，中產階級的弱質

中產階級的「政治不動員症」，在資本主義成熟的歐美社會如是，在開發中國家亦同樣如是。前法屬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領袖及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曾說過：「歷史清楚的告訴我們，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並不是沿著民族主義直線前進的。……由於受教育階級的無所準備，他們和大眾缺少實質的聯繫，他們的怠惰，甚至於他們在戰鬥的決定性時刻的怯懦，都使得悲劇因而產生。……民族意識，本來應該是全民內心最深處希望的結晶，本來應該是人民動員的當下而最明顯的結果，實際上却成了一种空虛的殼子，一齣粗糙而脆弱的鬧劇。……這種步調的倒退以及它所造成的軟弱及嚴重危機，乃是民族中產階級未能思索人民行動所造成的歷史性結果；……它也是民族中產階級知識怠惰，精神貧乏，以及都會心態的結果。」，法國的夏里昂(Gerard Chailiand)在比較了近代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運動後，也這樣表示：「都市中產階級被整合到體制中，工人仍然缺乏階級意識，

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都被認為是邊緣人，這造成了政治不動員症的持續不變。第三世界的革命潛力已被過份高估，革命意識型態的可能角色被人們太過強調，但該意識型態被移植的社會環境却缺少適當的評估。」

●黨外運動，如何找到「可能性群眾」？

無論激烈的改革主張，勞工和農民運動，甚至革命，在政治行為上我們都可稱之為「侵略性的政治參與」(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對於「侵略性的政治參與」，目前普遍受到學者們的注意，學者們也提出了各種解釋的模式，由於這個問題普遍受到注意，導致「侵略性的政治參與」失效的「政治不行動」(Political Inactivity)也當然受到廣泛的討論，對於台灣的黨外而言，了解這種世界性而同時也是結構性的所謂「中產階級政治不行動性」實在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只有透過這種結構性的反思，黨外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可能性群眾」，並由這種反思來改造黨外的語言和行動方式。

國民黨新、舊官僚「社會控制」對照表

類別	舊官僚	新技術官僚	實際效果	新舊比較
社會控制	1. 命令、禁制。 2. 威脅、處罰不服者和反抗者。	1. 開放管道，彈性行政。 2. 沒有強烈的懲罰傾向。 3. 較不作威作福。 4. 增加物質和勞務生產。 5. 給予獎勵，教育灌輸。 6. 給予更多的物質誘因。 7. 增加社會剩餘價值。 8. 增加社會福利基金。 9. 在利潤誘因、消費、職業安全方面，接受勞工參與。	1. 壓迫受害團體的運動導向。 2. 刺激直接挑戰。	1. 文化資本不同。 2. 不同的控制系統。 3. 新技術官僚對自己的價值和未來較多自信，也較少焦慮自己的階層地位。 4. 新舊官僚皆不會容忍工人控制，也不相信平等之論。

現階段的黨外運動由票源凝聚力的倒退，可以追溯到黨外政治訴求所造成的「政治不行動」已增加。從政治行為的動機論來看，這表示「行動」和「不行動」之間的拉力和推力已有了改變，根據現階段的情勢來看，國民黨方面似乎已強化了它

的轉化力和拉力，但黨外却反方向的增加了它的推力。

●變革中的國民黨

人的不行動可以認為沒有必要行動

以減少。這種行為則表現出行政官署的「有反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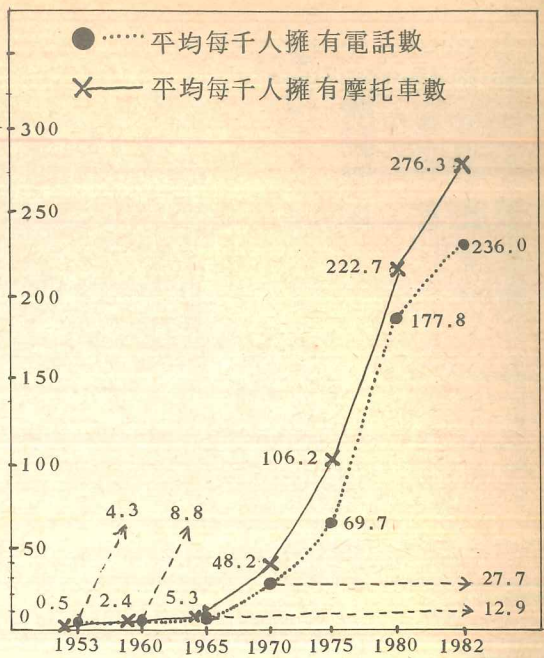
● 國民黨的老官僚與 新技術官僚

近年來，國民黨無論在政治事務或經濟事務上，它的表現對於黨外這種「價值導向的運動」的確有極大的包涵力，緊張的泉源和未建制的敵意已被相當的打消。舉例而言，六十七年的停止選舉到六十九年的恢復選舉，宣佈不擴大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範圍，以李登輝為副總統，這些政治表現對未建制的敵意即有很大的解消效果，縱使黨外仍有一些人基於「反國民黨」的原則而仍然大做文章，可是就實際效果而言，這種論調只有「有觀眾而無群眾」的惡果。根據史邁塞的分析模式再多舉例證，可以肯定的說，近年來的國民黨「社會控制」的高度有效，乃是和它的治權基礎逐漸由「老官僚」(Older Bureaucrats) 轉移到「新技術官僚」(New Inteligentia) 有密切關連的。高德勒(Alvin W. Gouldner) 即曾經指出過：「老官僚和新技術官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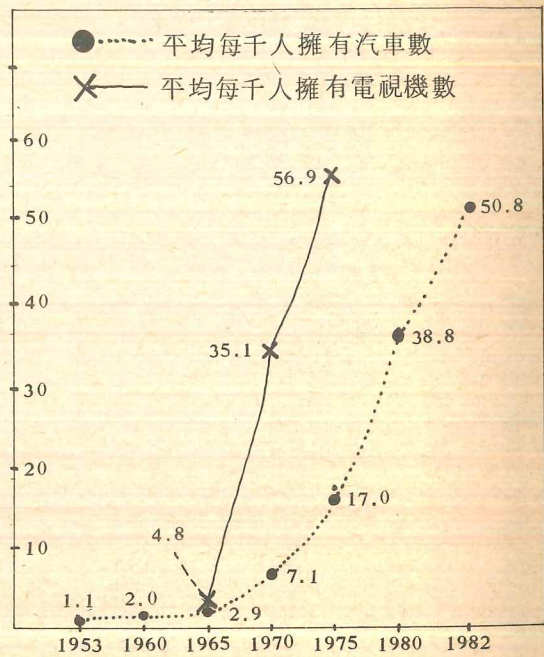
由於文化資本的不同，因而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控制系統。老官僚的控制機器以命令和禁制為內容，威脅和處罰不服者及反抗者，但新階級的技术官僚菁英則否，他們由於有能力增加物質和勞務的生產，他們的控制形式乃對能和他們齊一者給予獎勵，同時給予更多的物質誘因和教育灌輸。他們以任務為本和以工作為本，對自己的價值和未來有較多的自信，因此他們對自己的階層地位較少焦慮，也不容易非理性的將這種焦慮轉移給他人，基於此，他們比較不會作威作福，也沒有強烈的懲罰傾向。」由於他們的文化資本生產力能夠增加社會剩餘價值，他們會願意增加社會福利的基金，也可能會在諸如利潤誘因及消費，職業安全等方面接受勞工的參與，但他們不會容忍工人控制，他們也不相信平等之論。」

● 由「政治競爭」轉到 「消費競爭」

國民黨在亞洲國家乃是極早就注意技術官僚主政的少數國家之一，而同時國民黨在社會控制的技巧方面也深獲歐陸的德意志及英美的加拿大兩個傳統的黨陶。在



● 台灣消費指數統計表



● 台灣消費指數統計表

可見的未來，台灣的技術官僚菁英在治權上將扮演日形重要的角色，整個社會控制的基礎將以經濟表現 (Economic Performance) 為本，以利潤和物質的誘因等獎勵手段作為「胡蘿蔔和棍棒」(Carrot and Stick) 的胡蘿蔔。而這種胡蘿蔔將有助於人們「競爭人格」(Competitive Personality) 的由「政治資源競爭」轉移到「消費資源競爭」，而這種「消費資源競爭」在一個現代社會中，它對反體制事務的轉化又有著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效果。

● 「黨外」成爲一種消費品

在一個「消費資源競爭」的社會裡，內化了的消費心態能夠將一切反體制和非體制的事務都消費品化。目前在台灣這種趨勢已愈來愈明顯，「黨外」逐漸成爲一個人們愛好新奇的消費心理下的一種消費品，被消費品化之後的黨外，成了人們每日忙於衣食享樂之後發洩其疏離感或浪漫情緒的消費品，群眾變成觀眾。最好的黨

外是那些能將「黨外」這種商品賣得最好的。而既然是商品化，就難以避免商品價值的消費價值折舊。

黨外變成一種不是民生必需品的消費品，理論上並不一定是悲劇的開始，如果黨外能夠將「黨外」這種商品以充實而創新的內容和包裝好好推銷，並不致於造成黨外票源凝聚力的倒退和群眾疏離後的政治不行動性的增加。但目前的黨外似乎正在走一條不幸的路，它不以充實而創新的內容及包裝為務而展開良性競爭，相反的却走向一種藉民主之名而黨同伐異，只講

黨外民主運動新、舊兩代對照表

舊一代	新一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靠行動。 2. 保持一定的進步，但不激烈。 3. 目標一致，感情互通。 4. 決定自主的行事步驟。 5. 懷有理想，默默作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靠資訊。 2. 不能自己創造意義，依賴市場價值和市場導向。 3. 運動的自主機能逐漸喪失。 4. 運動領袖無從產生，失去領導力。 5. 和群眾之間，失去信任的鎖鏈。 6. 脫離既存的社會秩序。 7. 反權威綱領變成不負責任和自戀症。 8. 根據敵意，建立自己的小世界。 9. 變成一種宗教式的「排他性團體」。 10. 劣幣驅逐良幣。

新奇而不講實質的惡性競爭方向，這種方向的轉變造成了黨外成爲無領袖的混亂狀態（Mess）。

●以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爲例

一個消費文化對反體制運動的轉化，最成功的例子在於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以一九六五年爲分水嶺，在此之

前，它的發展不靠資訊而靠行動，由於以行動爲準，它保持了一定的進步但不激烈，成員們有目標的一致性和感情的互通，他們知道自己的目標，也能相應現實而自主的決定步驟，他們是默默作事的理想年青人。然後一九六五年以後他們却成了「商品」——一種新奇的商品，閒雜而好出風頭的人物混了進來，運動本身在量上有了進展，但質的方面却完全改變，其結果是：

(一) 它本身已不能爲自己創造意義，而依據外界來賦予意義，所謂「外界」指的是它商品化了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導向性格。

(二) 它的成員對運動的了解，不依據本身的實踐參與和了解，而依據惡性市場性格的好奇與導向，運動的自動機能逐漸喪失，運動的領袖也無從根據自動機能產生；尤其惡化的是，真實的領袖並無法抵擋這樣的趨勢，被迫在這種混局中失去他的領導性和領導力。

(三) 運動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使得它和群眾之間失去了任何信任的鎖鏈，運動成爲「群眾之海裡的孤島」，只有那些喜好鬧事，態度虛無但却又有愛出鋒頭的青年才能竊佔領導權，運動走向「劣幣驅逐良幣」的不歸之路。

●大眾消費文化對反體制運動的「消化」

六〇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被「消化」掉，它的軌跡有許多地方似乎在台灣，黨外運動中也明顯可見，其實在有著相當多的相似性：

(一) 兩者均爲少數自稱的「中產階級者」不

單位：萬元

● 1978年~1982年台灣地區廣告投資額統計分析表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報紙	242,484	325,620	442,620	484,729	510,637
電視	203,000	248,850	295,380	340,300	347,400
廣播	55,815	65,820	75,570	90,720	100,800
雜誌	38,100	46,200	61,300	68,200	73,100
電影院	5,800	9,200	11,400	12,656	13,100
戶外	16,700	15,100	18,300	17,200	16,800
直接函件	48,200	60,300	74,100	70,300	73,600
其他	28,048	35,000	52,000	53,400	54,500
總計	638,147	806,090	1,030,670	1,137,505	1,159,937

滿份子所發動，但均很快的就面臨了「中產階級政治不行動性」的結構性瓶頸。

(二) 兩者均有著強烈的消費社會下被商品化了的跡象，商品化之後的運動使得它在發展時期之初即被接種下了致癌原因，運動愈發展即愈接近死亡。

這兩者的相似性，或許可以由布瑞芮斯（Paul Breines）對中產家庭青年運動的評價看出。他認爲這種運動並未對危機中的社會注入新的希望和誘發大家同意的元素，而只是加速向虛無主義的方向移動，在一種具有「強化了的疏離」情況下，它的反權威綱領反而變成不負責任以及自戀症的執照。復次，它所提出的否定性乃是「武斷的否定性」（Artificial Negativity），這將它推向「不好的穹蒼」（Bad Infinity）自然無法抵擋資本消費社會無與倫比的巨大整合力。

●虛無主義·宗派主義·武斷的否定

由上所述，台灣的黨外面臨票源凝聚，力倒退的危機，我們必須從台灣「政治不行動性」增加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在一個

消費型態的政治及社會條件下，政治及社會資源的分配關係及其結構，自然的形成強大的支配和整合力量，它乃是群眾「政治不行動性」的淵藪，在這種支配和整合力量的前面，是有歷史性和規範改變意義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會被頑固而不知守經達變者帶向所謂「死亡的咆哮」的階段，它可能值得惋惜和同情，但却不容易獲得支持。因爲面對強大的支配和整合力量，運動會很快的「結晶化」，並且加速退化，變成一種宗教式的「排他性宗派團體」（Exclusive Sectarian Association）。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即氏（Kurt Lang & Gladys E. Lang）對這樣的過程會作過如下之描述：「結晶化所指的乃是一種過程，經由這種過程，對於社會秩序的疏離，乃能達成一種基本組織形式的表現。變動不定的互動形式亦因而得以例行化，捉摸不定的行爲樣式亦得以轉化成癡聚的單元，並且有團體感和或多或少定型結構。因爲結晶化而造成的群體感，組成了一種宗派團體，它是和既存社會秩序切開的團體，它的成員離棄了這個世界，他們據以建立自己小世界的團體精神，所根據的乃是敵意。宗派團體的重要事實是：它是和外者在者對立而產生的。所有

的那些沒有被包含在宗派核心的都被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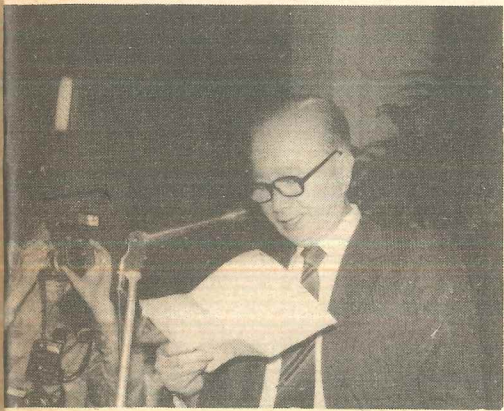
●一個退潮面臨歷史性的反省

台灣的黨外流派甚多，清濁合流，左右交混，激進與穩健併生，然而總體而言，它是在走向一個退潮的方向，無論黨外的理論工作者或實踐者，在可見的未來都無法且無力抵擋優勢的國民黨政治及社會支配力量，更遑論在這種力量之前建立雖非足以匹對但至少不讓前者獨佔的「二元權力」(Dual Power)。

因此，這或許已到了一個黨外從事「歷史性反省」，並由「歷史性反省」進而作出一種「歷史性妥協」的時刻了。一種基於歷史的重新觀照，或許才能避開歷史的陷阱，從而走另一條新的道路。目前台灣的黨外似乎仍然缺乏這樣的思考，以致於在面對強勢的支配與整合力量時，乃顯得漫無章法，甚至毫不自覺的跌入歷史的陷阱中，反而助長了強勢的支配與整合力量，進而加大了群眾的「政治不行動性」。這種情況正如同歐美的反體制運動在遭遇優勢資本主義的支配力量時的結果相同。

●無法抵擋國家機器的支配和整合

歐美的反體制運動，自本世紀卅年代以來，面對資本主義的優勢支配力量，在充滿無力感之餘，吊詭式的在理論和行動上作出柯希(K. Korsch)所謂的「反動的烏托邦」(Reactionary Utopia)之逆轉。在政治認識論方面，他們將現代社會人的「政治不行動性」和「疏離」等現象，概化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極有滲透性的「壓制」(Repression)所造成的「壞信念」(Bad Faith)之結果，這種相類似的論點在後期沙特(J.P.



●黨外面臨「歷史性反省」的時刻

Sartre)、馬庫西(H. Marcuse)等許多理論大師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觀點。大體而言，這種觀點可以說仍然是本世紀初期無政府主義以及工團主義結合而成的偽形馬克思主義，它不但形左實右，更主要的是，這種舊意識型態的形式和語言中是具有「暴力的實踐」(Praxis of Violence)的內涵的。卅年代或許有效的觀念，到了七十，甚或八十年代，縱使加上新的次元或新的變項，但若觀念和行動的基本架構並未改變，則它自然無法抵擋國家機器的巨大支配力與整合力。

●偽形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懶惰者的遁逃藪

也正因此，澳洲國立大學教授卡孟卡(Eugene Kamenka)乃指出：「馬克思，在一八九〇以迄一九四〇年代的這段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他對現代社會思想作了無與倫比的刺激，但現在則已變成懶惰的思想者逃避努力工作和不確定感的遁逃藪。」

這樣的現實情況，似乎已在在明顯的表示出，在目前這樣的時代，一種基於歷史惰性的舊路，人們已必須重新估價而後

作出「歷史的決裂」。泛意識型態所造成的對歷史所作之「過份政治性解釋」已喪失了它的意義，堅持那樣的思考形式就成了一种歷史陷阱。

●台灣民主運動的三個歷史傳統

這種情況也同樣的顯示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之中。台灣的民主運動延續了三個歷

●競選活動現場



史傳統：一、是被殖民國家的反殖民運動；二、是第三國際普羅運動及其延長而成的「國共鬥爭」，三、是帝國主義者所策動的「第三勢力運動」。這三個傳統所共同使用的語言及行為模式均為意識型態串聯而成的「革命」或「政變」模式，昔日的統治者日本殖民政府認為反殖民運動者為「非國民」，證明日本統治者當然明瞭反殖民運動所使用的語言中之「革命」行為內涵，國民黨自然也了解繼承了這三個傳統的所謂台灣民主運動之語言及行為模式之內涵意義。

●從「歷史性反省」到「歷史性妥協」

不幸的是，由於歷史的發展，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在繼承前述三個歷史傳統時，它所繼承的乃是三個歷史傳統最狹隘的一面：

一、在反殖民運動的傳統中，它繼承了本土意識，但卻將這種意識狹隘成泛情緒的政治意識。

二、從第三國際普羅運動及其延長而成的「國共鬥爭」傳統中，台灣的黨外朋友中有極少數一部份人仍繼承了那個早已被

否認了的「庸俗化了的階級分析法」，書空咄咄。而普遍黨外所繼承的則是「國共鬥爭」那種背景下的「國民黨觀」。黨外以提國民黨的過去痛腳為樂，並延長為現今那種並不真切的「國民黨觀」，從而也自然不了解真正的台灣本身結構。

三、在「第三勢力運動」的傳統裏，有相當多的黨外朋友繼承了那種「以獲得海外掌聲」為樂為榮的習性，並從而不自覺的受到那種掌聲的催眠和媚惑，甚至牽引，迄今仍未體察這種掌聲的虛妄。

●挑戰者必須是道德的

任何非體制的運動，其成員不外下列四類人：(一)那些社會價值正當的分享權利被剝奪的下層階級。(二)那些發展期中有特殊興趣，但他們的興趣卻不為傳統團體所接受的青少年。(三)並未被主流社會接受的少數民族或其他邊緣人。(四)創造性願望未獲發舒，因而受挫的無根知識份子。人們受挫後乃會尋找一個「神聖的目標」(Holy Cause)來奮鬥，於是和當權派之間的資源競爭遂告開始。挑戰者必須給比當權者更好的希望，而不能使人在成本

利益的風險性上作太多的投資，除非當權者以永恆的壓制使大多數人都已面臨「沒有什麼可以再失去的」的處境，挑戰者必須是道德的，有說服性的和有責任感的。所有非體制的事務都有無政府主義的可能性，基於責任感，它必須加以避免。否則它會成爲只不過是「社會邊緣人」的集合體，偶爾扮演社會氣壓計的角色而已。

特別企劃二

再論

「臺灣一千

八百萬人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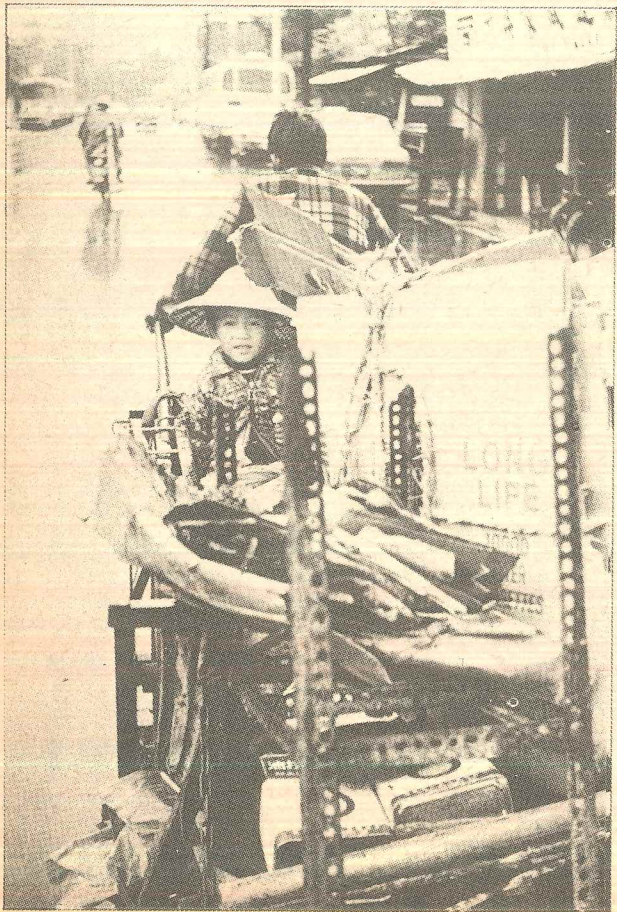
／趙福島

●「台灣結和中國結」之爭，只是茶壺裡的風暴

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已面臨成長的高原期，且亦面臨倒退的危機，這種情勢的形成，有著極主要的歷史條件。而目前，那樣的歷史條件已在崩解之中，以往那種歷

史條件所形成的黨外，自然相對應的開始崩解，這時候所出現的中國結和台灣結之爭論等茶壺裡的風暴也將變得毫無意義。一種歷史架構可以映照出一種政治關係，只有勤奮努力的人才能佔得應有的地位，爰作「台灣民主運動史論」，是爲導論。

●一千八百萬人論！你聽得見他腳踏著雨水「叭塔叭踏」的聲響嗎？



(14) 夏潮論壇／，84年5月號

去年選舉，黨外人士不分「體制改革」或「改革體制」派，都以台灣前途由「一千八百萬全體自決」爲號召。這個口號，漸漸證實了台灣民主運動在體質上的蛻變。本文將以台灣現況下社會力的分析，以佔台灣人口七成九，一千二百萬人的大多數利益，作進一步的討論，並爲台灣民主運動提供新的探索，新的運動指向。

●由多數利益到全體自決

去年競選期間，黨外人士不分「體制改革」或「改革體制」派，都以台灣前途由「一千八百萬全體自決」爲重點。這提法是個蛻變，「美麗島」雜誌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號（最後一期）以黃信介署名的「發行人的話」，它的標題却是「政治是大多數人的事，要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兩相比較，四年來由「多數」「利益」變到「全體」「自決」，這種黨外認爲高層次的提法，內容究竟如何？那就有待檢驗。檢驗的工具之一，是台灣人口統計。以下以行政院主計處所發行的中華民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三年版裡的數字，從「全體」出發，加以檢驗。

●一千八百萬人必須當眞相待



一九八二年末我們台灣已有總人口一千八百五十萬人，所以「一千八百萬人」的說法在數目上是对的。但既然說是要由這一千八百萬人去自決，顯然說的就不能只是數字，而是一千八百萬個天天要生活，有血肉腸腦的人。然而，無論干涉我們內政的老美也能，認真說假的國民黨也能

，以義自居的黨外也能，並沒把這一千八百萬人當眞人相待，而是口頭禪地提提數目了事；這種人頭數的結果，或稱爲沒內容的數目，並不能「自決」什麼。等而下之的，連個人頭數都不提的所謂「台灣前途」、「台灣命運」等說法，便很值得商榷。

●放寬視野，探討潛在的全體人數

「一千八百萬人全體」的說法，聽來眞爽，好像人人有份，其實不是那回事：老美一心想擺佈台灣，它要「決咱」，可不是要我們「自決」，因而一千八百萬其實等於零；黨國一家的國民黨是決定人民的，因而一千八百萬其實等於當權派系及其附屬；即使無力自決的黨外，所謂全體云云，如果不包括國民黨主流，不含主張「台灣人意識」者，要剔除的人恐怕要以百萬計。如果把視野放寬，撇開政治操作的狹角而看社會全面的話，就不得不減去十四歲及以下的兒童人口，他們實際上不可能有社會行爲；也就是說，自決的全體最多包括社會行爲潛在人口，這群人口以年齡十五歲及以上的人來說，在一九八二年末有一千二百七十萬人，比總人口少五

百八十萬人；換句話說，「一千八百萬人全體自決」的說法，其實至少要扣除三分之一之後，才是潛在性的全體人數。此外，如果把六十五歲及以上的人口視為退休而不參與社會行為時，則有八十萬人要扣除。結果是，所謂「全體自決」，即使沒有政治的干涉，由社會行為潛在人口來決定，只有一千一百九十萬人，不是「一千八百萬人」。

●自決之前，先讓大眾自知

自決潛在成員的誤差，在數量上固然錯誤，若以民主互重而言，應在提倡自決之前，先讓大眾自知，自決的潛在成員必須知道我們台灣社會組成因子和互動機制的大要，以及各成員自身參與的角色，然後，自決的提法自然也從自知的基礎上建立：一段段地彼此要自決什麼，一步步地彼此要怎樣地踏到。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不與大眾相互在認知上充實長進，而是自義地不顧大眾自知的先決條件，逕自鼓吹自決。這樣，在鼓吹的一方，是欺人無知；在被鼓吹的一方，是自欺無識，也是盲決的結果。

就業為目的來看，我們台灣是個商品社會，以商品做中介，交換彼此投進社會的人力和精力。從這種社會的基調出發，每人的基本利益大致是如此：(一)就業人口間講究彼此之間的收支相抵；(二)家事人口講究重劃關係，就是說，只要是為他人所付出的精力，在整體的商品社會下，也可藉商品換回他人的社會報酬；(三)就學人口講究蓄積，在受教育期間的精力，能得實現的保證。簡約這三點，可匯成一個社會體制基本重整的指向：使潛在的社會性精力實現或正規化，並使社會性精力彼此公平交換。——不妨簡稱為「有效、正式、公平的社會工程原則」。

●人人地位有別，要找什麼運動？

很明顯，這樣的社會工程指向，與老美、國民黨、黨外所訴諸的政治目的格格不入。目前台灣社會重整的力量要來自新的人群，簡單地說，即是從就學人口找學生運動；從家事人口找婦女運動。至於從就業人口要找什麼運動？下面的「地位別」就業人口統計對這問題有所助益。去年六月的就業人口中，有四個地位別人口群

所謂「民主自決救台灣」，這種「全體」自決的提法，含混地暗示一個全體有利的結果，這是另一個致命的過錯。由一千八百萬人所組成的社會，實質上並非均質，而是異質交錯，包括各類社會利益差別，甚至利益對抗的人群；相對於國民黨的黨外就是現成的例證，又如賀兆雄事件中的漁民，漁主和漁工也是無法含混的。簡單說，一個全體有利的自決，從來沒有正面的證實存在或在過，負面的反駁却很真實，可見全體自決云云，只是一把迷人的砂子罷了。翻翻人口統計，也有些區分：性別、年齡、市鎮鄉野、婚姻、受教育、就業、收入等等，也表明沒有全體均質的社會。了不起的提法，只能宣稱「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這正是四年前黨外「美麗島」雜誌所標榜的。四年後，自以為提升到「高」層次的全體自決，其實是自我架空到零層次了。——對於真正從事改革運動的黨外人士而言，不能不相互提醒：「大多數人」是指那些群人？「利益」則又是什麼樣的利益？

●商品社會下，多數人的利益

地位別	人口數	比率
僱主	廿八萬	四分
自僱者	一百五十萬	二成一
無償家庭	七十七萬	一成
有償工	四百五十萬	六成四

把這組數字想一想，我們台灣這個商品社會，由社會性精力彼此交換的準則衡量起來，(一)無償工有支出沒有回收，他們講究精力重劃，變無償工為有償工，與前述的家事人口同類；(二)自僱者和有償工是典型的有出有入的社會精力交換者，講究的是收支相抵，公平交換；(三)僱主是有入無出的非交換者，白拿他人的社會性精力自享；(四)僱主白得與無償工白虧。

換句話說，台灣社會的機制本身，有一成的社會性精力被為數不詳的尊長(不事生產活動)拿去，近三分之二的社會性精力被半成不到的老闆拿去。這是改革體制的根本重點所在，他的人口數比率是：無償家庭七十七萬對未知有償工四百五十萬對僱主二十八萬。另有兩成的社會精力是旁觀者或體制改革者，他們的人數是一百五十萬自僱者。

關於「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人口統計是探索的工具之一；在我們的社會，既有官方無能及反科學的動機因素，又有倡言者自命超然，忽略了反立場的諸種因素。因而，使用它的時候，難免是選擇性或批評性的重整，而且不能希冀切題地提供完整的答案。相對地說，這工具確可提供若干解題的線索，以下逐一列出。前面提過，即使談「全體」自決，可能的全體充其量只是「社會行為潛在人口」；同理，「大多數人」利益也最多只能從這類人口集合中抽取。以一九八三年六月統計來看，這類人口有一千二百萬人，其中：

類別	人口數	比率
就業人口	七百萬人	五成八
家事人口	三百萬人	二成半
就學人口	一百二十萬人	一成
其它	八十萬人	七分

把這些數字與(一)以貨幣做為商品買賣，(二)大量而且多樣的商品在社會裡交換着，包括有形的物品和無形的勞務、信用、關係、人格在內，(三)佔就業人口七成以上所接受的是職業教育，即直接以

●分析人口統計，導出運動指向

「政治是大多數人的事，要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從這動機出發，不妨先就「人口統計」分析，導出運動的指向。如果運動指向是學生，潛在對象共有一百二十萬人，提法是已蓄積的社會性精力的實現保證；如果運動指向是無償家庭工和家事人口，潛在對象共有三百八十萬人，提法是把實踐的社會性精力正名兌現；如果運動指向是有償工，潛在對象共有四百五十萬人，提法是實踐的社會性精力收回自主。三組對象合計九百五十萬人，佔社會行為潛在人口一千二百萬人的七成九，「大多數人」的「利益」算是照顧到了。沒照顧到的，有旁觀者一成三，即一百五十萬人的自僱者。另外，有因着這運動提法而樹立的對抗者，他們的總數未能從人口統計導出，我們姑且不論。只知道有二十八萬的僱主(佔兩分)以及未詳的家族、學校尊長們；如用減法推算，減去有利的七成九和沒利害的一成三，則對抗者的潛在總和為八分，即一百萬人，其中包括二分僱主(二十八萬)和六分尊長(七十二萬)。

臺灣黨外運動的社會分析

● 林文彰

特別企劃三



● 台灣新興的第三階級

目前推動台灣黨外運動的主導力量，來自七〇年代初，在台灣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為誰發言？為那些不平不公而出力？

● 「中智階級」的興起

經過尹仲容的時代，台灣的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迅速發展。加工業也興起了，開放外資，成立加工區，促進了進出口貿易。再者，六十年代的越戰也刺激了台灣經濟繁榮，台灣為美軍提供了運輸、修護的工作，甚至成為駐越美軍的「休假」之地，而有「無烟囱工業」之稱。由於加工外銷，台灣湧現了一批中小

人足跡已征服了世界，這是幾千年的中國史上青年人從沒有發揮過的威力，影響所及甚至使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強權不得不因惶恐而對他們設限；幾十年來，台灣以蕞爾小島幾經風雨摧殘仍然安如磐石，也不能不以他們為首功。這代青年，在經濟界裡有他們海闊天空的世界，只要不對他們的才氣加以拘限，他們的潛力和潛能，就足以創造出世紀的奇蹟。」

● 正義和人民的旗幟

並且，張俊宏把這些「青年商人」（張本人則稱之為「中產階級」），加上知識份子通稱為「中智階級」。關於「中智階級」，張俊宏說：「濃郁的鄉土情感，使他們最容易成為保家衛國的衛士。他們之不同於無產階級，因為「有恆產則有恆心」。同時，也因而有「恆力」足以使他們有能力為社會的不平不公而出力。」張俊宏的話雖有誇張，但却誠懇。

在歷史上，任何與現實政權相抗衡的團體總是喜歡打着正義和人民的旗幟出現，明明是政權的爭逐，却以「弔民伐罪」

企業商人及其幹部，為原料採購和成品推銷，穿梭於國際之間。但他們的資本額小，風險大。另外，由於外資來台，也湧現了一批外資工廠和企業的幹部。外資來台是由於勞工低廉，台灣的加工商品之所以能外銷，也是由於勞工廉成本低。這批中小企業家和企業幹部，國際青商會是他們的團體，在政治上，他們也需要有代言人。

● 不能不以中產階級為首功

一九七一年一月，「大學雜誌」以改組後的面貌出現了。這次改組，實際上是結合了一批受西方教育的大學知識份子和青商會的會員。從七一年到七三年是「大學」輝煌的年代。接着「大學」的知識份子也投入選舉運動，而與各地非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相結合，是為今日「黨外」之始。並且，這批青商會知識份子在黨外迅速的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而老一輩的無黨籍人士則逐漸衰微。在黨外中能認識這一個事實的當為張俊宏，他明白地說出：「二十年來臺灣經濟的發展被認為奇蹟，如同信良常說的：臺灣的青年商

為號召，連梁山泊的好漢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子。當然，在抗衡一個腐敗政權之時，他們和人民的願望和正義是有一定的相重疊的，可是一旦奪取了政權之後，則獨吞人民革命的果實，這正是中國二十五年政權輪替的寫照。

我們不否認「中智階級」黨外運動的現階段進步性，但也不能不正視其局限性。從近代歐洲民主政治的歷史來看，所謂「無議席，不納稅」，誰納稅呢？付稅最多的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或稱第三階級），起初英國的選舉權甚至是採財產登記制的，沒有財產的人根本沒有投票權（好一個「有恆產則有恆心」）。法國大革命是由於要加重第三階級的稅負而引發的。資產階級為了取得政治的參與和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推動了近代歐洲的民主政治。由民主政治更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消除了封建殘餘，生產力得以大大的提昇。

● 台灣資本之分析

誰都知道，台灣的政治並無充分的民主，根據歐洲的經驗，台灣的資產階級應為推動民主運動的主力。但事實上，台灣

著名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王永慶、吳火獅、林挺生、嚴慶齡，他們對民主運動並無興趣。蔡萬財、林榮三標榜過一陣子「無黨無派」，當選後也都加入了國民黨，不再是制衡國民黨的民主力量。有興趣於政治的資產階級，盡為國民黨「金牛」榜上的人物。其故安在？

今天台灣的資產階級主要的大概可分為三類：

一、官僚資本：即公營事業，具有壟斷性質，如公賣局、電力公司、銀行……等，其本身是為政府體系中的一部分，當然不具有與現政權相制衡的民主性質，如趙耀東為中鋼董事長，進而為經濟部部長，正是今日官僚資本的資產階級代表。

二、官僚寄生資本：此乃為依賴政治特權之資本，最具典型的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另外則是一些大官僚透過其家屬或代理人所經營的企業，如謝敏初是最惡名昭彰的。其他的一些私人企業，為求取政治特權的經濟利益，也莫不利用各種方法與黨政大官僚掛勾，如林挺生就曾擔任台北市議長，又如國泰與王昇政工系的關係。這與「銀行國有」當有一定的關係。

三、外國資本：根據統計，至一九八二年止，外國在台的私人投資達10.6億美元。

腐敗的專制統治階級和入侵的外國資本，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十九世紀，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是依賴洋槍大砲的，戰爭當然是一種最高矛盾形式的表現。在專制腐敗統治下的人民，與統治階級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即民變頻繁，正是這一矛盾的表現。

●買辦原為葡萄牙語

「買辦」原為葡萄牙語 Comprador，意採辦。中國的買辦起自十六世紀初年（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葡萄牙商人來中國沿海活動之時，自「五口通商」後大盛，成為帝國主義商人在華之工具。一八四四年，美國強迫清政府簽定的「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甚至規定買辦與外商之間的關係，「或請各領事館官酌情辦理，中國地方官勿庸經理」。跟着，「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亦作類似規定，自此遂成為各國之通例。在帝國主義的淫威下，買辦亦如教民，享有某些中國法律的豁免權。仗着帝國主義勢力，買辦遂可勾結外商，狼狽為奸，作威作福，也成為中國人民痛恨的對象。

元，美國佔43.6%，日本佔27.7%，合計佔71.3%。投資的企業中以電子工業最多，佔43%，每年外銷，除去成本外，可淨賺十多億美元。日本在尚有許多不公開的「秘密投資」，據估計約公開者之一至二倍。台灣的十大財團中的台塑、國泰、裕隆、大同、台南、遠東等莫不與外國資本有密切關係。外國資本投資額雖不大，但却具支配性的地位。

官僚資本的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對現有政治權力相抗衡的，因為他自己就是現有政治權力體制中的一部分。官僚寄生資本，更是依賴現有政治權力的特權才能生存的，更不可能有獨立的制衡力量。一些大企業又是依賴大量的銀行貸款，透過貸款的控制，大企業即使與政治權力有一定的矛盾，也終得俯首稱臣。

●報紙炮轟財神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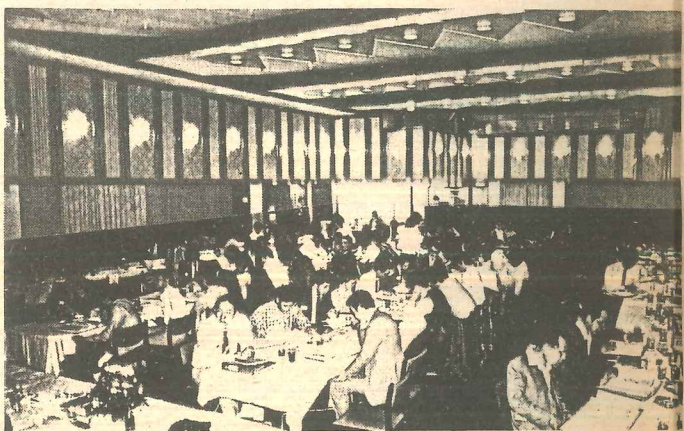
以銀行控制的手段而言，可以用當年傅朝樞的「台灣日報」為例來說明。「台灣日報」一直是中部一份不起色的報紙，從夏曉華到傅朝樞二位老闆，雖都與國民黨的情治系統有一定的關係，但傅為突破

報份，開始報導黨外新聞，並請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俞國基擔任總編輯。果然，因報導黨外新聞，報份有上升的趨勢，可是政治壓力也紛紛而至，最後，政府使出銀行催繳貸款的手段，傅自恃資金雄厚，而演出台灣報紙唯一一次炮轟財神爺財政廳長的事件。催繳貸款未能使傅朝樞屈服，才以軍方出面，以吉普車「約請」傅至三軍軍官俱樂部，簽訂出讓契約。

●買辦和民主的關係

在第三世界投資的多國籍公司，為了維護其投資環境，基本上是支持現有政權的，尤其反對當地的經濟民主，而歡迎戒嚴和禁止罷工，以維持低工資之勞工。但是，投資國家之政府若不利於外資之政策，則外國資本經常成為敵對派系政變的支持者。外國資本之當地幹部，因在僱傭關係上不受當地政府之直接控制，而有相對有限的自由和「獨立性」，這也就是所謂的「買辦」（Compradore），或稱「康白度」。

買辦資產階級和民主運動之間，則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民主落後的國家中，



●青商會知識份子迅速掌握了黨外運動的領導權

●買辦和民主的矛盾

買辦資產階級和專制統治，有一定的矛盾，被統治的人民與專制統治也有一定矛盾，但被統治的人民又何嘗與帝國主義工具的買辦沒有矛盾呢？被統治的人民與專制統治有着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而與外商、買辦之間有着侵略與被侵略的民

族矛盾，這個三角矛盾的關係，隨着不同的條件而推移。

例如，外商和買辦要求專制官僚取消賄賂陋規，則亦符合中國本地商人（民族資產階級）之利益；當外商和買辦挾帝國主義特權及其雄厚資本獨佔中國市場，則又與民族資產階級之利益衝突。

●台灣人的「三腳仔」

在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史上，和商人類似的角色還有傳教士，也使得教民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地位與買辦相類似。在社會角色的認同上，買辦和教民多具有一種「邊際人格」。

在法國統治非洲時，因種族歧視而視黑人為未進化之人種，但那些幫助法國統治的黑人則稍有不同，而被稱之為 évolue — 進化的黑人。他們是介於法國統治者與黑人之間的一種人，他們的皮膚雖然還未進化成白色，但是腦子裏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則唯恐不能「進化」得和法國人一樣。

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也有類似的情形，即民間所稱之「三腳仔」，還有一些到

大陸去的「台灣籍民」，和中國其他地方日本淪陷區中的漢奸份子。他們瞧不起自己的同胞，甚至狗仗人勢的欺壓自己同胞，拼命模仿統治民族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自覺比那卑賤的同胞高人一等，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而任意污辱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但在日本人面前却又不得不卑顏屈躬，且視為當然。

●日本的衛星工廠

那麼許信良所說的「青年商人」或張俊宏所說的「中產階級」又是屬於什麼性質的資產階級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讀一篇「中國時報」為日資辯護的社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其中說到：

第一，在我們歡迎外人投資中，日本資金流入台灣的為數甚巨，尤其日本廠商與我們很多的中小企業都有技術合作關係，我們的若干小廠實際上等於是日本大廠的衛星工廠，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的生產設備、零件、原料的大量輸入，乃是必然的事。

第二，坦白的說，我們不敢說整個台

灣的工業都是日本的加工業，但大多數都是日本的加工業則斷然不錯。我們大部分的工業從日本進口機器設備、零件、原料、技術，與部分資金，在國內設加工廠予以加工、包裝、裝配，然後以一小部分供應國內市場，大部分出口至國外，主要出口至美國。我們從日本進口與自台灣出口至其他國家，約有一半要經過日本的貿易商，我們在國內加工時，還有無數的小廠靠日本融通資金。如此，我們自



●被查封的「美麗島雜誌」高雄辦事處

日本資源不斷的進口，形成對日貿易的逆差；於加工裝配之後，又源源不斷的輸往美國及其他市場，形成出超，而我們的整個經濟也就得以繁榮發展。

這些中小企業不正是許信良所說的「青年商人」和張俊宏所說的「中產階級」嗎？張俊宏還極力的說，這些「中產階級」乃是台灣經濟繁榮，社會結構改變之後，在資本家和無產者之間所形成的新興階級。『並歌頌他們是「真正穩定台灣社會，促進社會合理化，推動民主政治最堅實的力量。」而實際的情形，這些「中產階級」却只不過是日本資本的「加工業」和「衛星工廠」而已，雖非外資，却為外資所控制和支配，當然也是為外資服務的，其基本性格與買辦資本又有何異？在本質上，他們又如何能不是「因著產業在資本上的結構，不是帶着買辦性，就是帶着官僚性，缺少獨立、創意、自信和堅毅的品質，而較多依賴、投機、小派小系的個性」？

●龍與鄉土

不錯，在現階段，他們是台灣唯一熱

心民主運動的資產階級，並主導了今天的黨外運動，但不可避免的，他們也把自己「中產階級」的品質帶進了黨外運動，並成為主導的方向。能明白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黨外動輒告洋狀、崇洋媚外，無論在內政外交上，不時反映着美國或日本的觀點。如果黨外真的像他們口裡說的那麼「鄉土」的話，為什麼在宗教上會和長老會結合，而不去與台灣鄉土最大多數人信仰的宗教掛勾，搞得連民間每座廟宇的柱子上都有龍也不知道，而鬧出台灣沒有龍和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的笑話來。

。在進出口貿易中，「中產階級」佔了絕大多數，也就是許信良所說的「青年商人的足跡已征服了世界」。如果這種情形不改變的話，在未來的黨外運動中，「中產階級」仍然會佔有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們的融資和貸款，一部分依賴外資；一部分依賴外商的信用狀，向銀行貸款融資，而不是以其產業得到貸款。由於借不到銀行的錢，相對的，即不受政府透過銀行對彼等的控制，因此，而具有較大的自由和「獨立性」，這是依賴外資對政府的「獨立」。

但以長遠的台灣民主政治運動的前途來看，除非台灣這種「新殖民地經濟型態」永遠不會改變，或被統治的矛盾永遠超過民族矛盾，否則，具有買辦性格的「中產階級」黨外運動，肯定是沒有希望的。去年立委選舉的黨外挫敗應該是一個警號。

有不平的抱怨，又有較大的自由和「獨立性」，台灣的「中產階級」，遂成為唯一的介入黨外運動的資產階級。今天的黨外民主運動是不是已經達到可以揚棄「中產階級」的階段呢？

即使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也不是說要在現階段排拒「中產階級」介入台灣民主運動，並且在事實上也不可能，而是要求「中產階級」發揮其有利於民主運動的積極性，但必須克服和約束其買辦性與不利於民主運動的消極性。

再者，為什麼這些「中產階級」會那麼熱心介入黨外運動？這個問題恐怕也不是幾句口頭的自由、民主、人權、鄉土所能解決的，而是必須從其「中產階級」的本質條件上來分析。

「中產階級」不是官僚資本，又沒有足夠的政治特權，加之資本主義心臟的銀行又是國有。官僚化了的銀行，除了照顧官僚資本和政治寄生資本，不怕擔負龐大

●借不到銀行的錢

●探索台灣民主前途

根據一九八二年的統計資料，台灣的國民生產總額為1,824,244百萬元新台幣，對外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的總值為1,600,331百萬元，共佔87.73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們，恐怕還必須在「中產階級」之外，另外尋求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如何開拓未來的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這是大家的事業，也必須大家共同來探索。

中產階級

本刊資料室

所謂階級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佔有一定位置的一群人，譬如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就是由擁有資產（資金及生產工具）的一群人以及僅擁有勞力和智力的一群人結合而成共同從事生產的一種關係，在此我們就稱呼前者為資產階級，後者為無產階級。如果再把它細分的話，又可將前者區分為擁有較大資產的大資產階級，以及擁有較小資產的小資產階級。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若從生產關係來看，概可大別為以上三種階級。

至於中產階級一般是較傾向於從既得利益方面來稱呼，因為在一個社會裏從利益的分配上來看，亦可大別為：大既得利益階級，小既得利益階級及被剝去應得利益階級三種。這裡的小既得利益階級就被通稱為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這字的誕生是源於十三、四世紀的歐洲社會，當時在封建的生產關係裏，由於經濟的發展，逐漸萌芽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誕生了一批在此種生產關係下從事經濟活動的一群人，而在這生產關係中擁有資產的一群人，由於在當時的社會裏，其既得利益是介於貴族僧侶階級及農奴階級之間，故被稱為中產階級，又被稱為第三階級。又由於當時這批新興階級因為經濟活動的需要大都居住於「自由市鎮」，故法文以 Bourgeois（市鎮）加上 eois 結合成 Bourgeois 稱呼之。因此在此時的中產階級在意義上可說泛指資產階級之意。

封建社會崩潰後，資本主義取而代之，社會的既得利益重新劃分，原來稱呼的中產階級，由於其取代了貴族僧侶階級成為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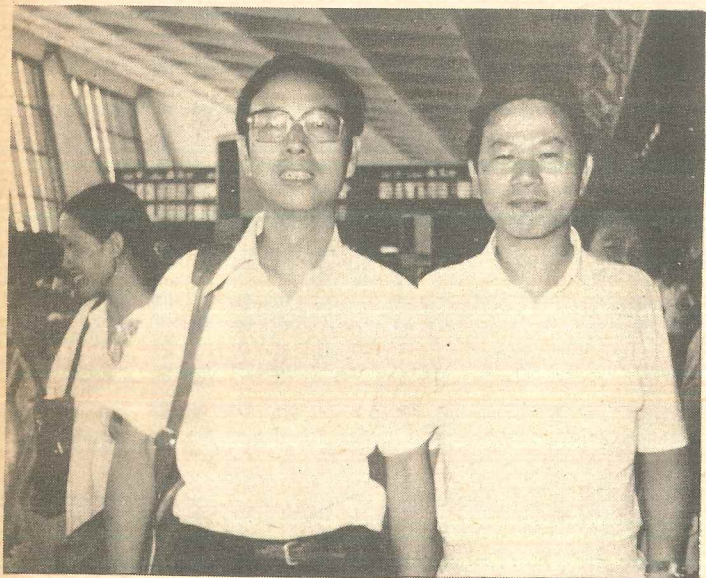
會的大既得利益階級，故使得中產階級在意義上也有了變化，它不再泛指資產階級，而被引用來指稱小既得利益階級。

至於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主要的乃是指一般的中、小企業主，他們在經濟活動中既受到壟斷資產階級的壓迫和排擠，也受到無產階級的抵制和抗拒，在社會兩極分化的過程中處於一種不穩定的存在狀況；此外，一些非資產階級的高所得者也被歸類為中產階級，他們具備經濟活動所必要的技能和文化上的知識，但自己却又不擁有生產手段，所以只得成為高酬勞的僱傭勞動者，不過因為他們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和文化上的素養，顯然有別於純粹出賣勞力的沒有文化的無產階級，因而，只得歸類為中產階級，在今天的社會來講，舉凡中小企業者、高收入的自由職業者（如醫生、律師、會計師：）以及高所得之薪俸階級（如政府部門裏的部長、局長、大學校長或私人機關之高級支薪人員：）等都是屬於中產階級的範疇。

中產階級由於其經濟分配關係上之中間地位，因此其既得利益的維持及擴大，往往遭受到大既得利益階級的威脅及阻礙，但同時它也扮演著剝削階級的角色。中產階級的這種經濟處境，使它在政治上表現的性格是強烈的反對官僚壟斷，但為維持或取得它的一點利益，却又易於妥協退讓，至於對下階級群眾的實質利益往往是漠不關心，或者只為結合政治力量的需要，而給予些微的憐憫、服務而已。

給許信良的一封信 公開信

陳鼓應



◀陳鼓應（左）和許信良（右）合影

我發表這信，是希望大家不以派別成見來討論這類嚴肅事件。因為我們大家一向認為：因虛構謠言進行譏謗，甚而以政治構陷手段代替討論問題的方式，都是極其違反民主政治基本原則的。以保障人權，反對政治迫害為號召的反對派，尤不當做出羅織入罪的行為。

信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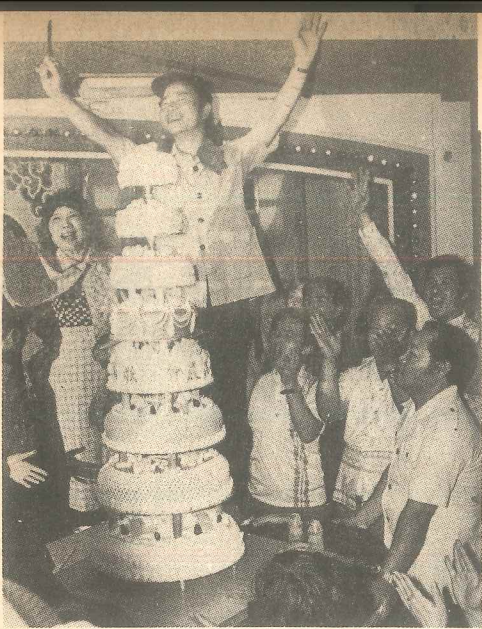
自從一九七九年秋與你在舍妹家相敘之後，轉眼間就快五年的時光！這期間，你我離鄉背井，境遇雖似，却人事殊非，以致再也沒有機會像從前在台北時候那樣暢談過。回憶「大學雜誌」時代，我們促膝而談，每至深夜仍依依不散的情景，猶歷歷在眼前。想起往時，常覺得同是客居異國，彼此本應存異求同，相互砥礪，你我昔日戰友，從此南轅北轍，乃至良友向背，委實惋惜！

●連連向我和珊珊道歉

一九八二年二月間，你辦的「美麗島」週刊上，突然對我施放謠言，誣稱：「灣區華人讀書界盛傳，陳鼓應負有中國任務」。你們不經查證便替「亞洲商報」傳播虛構的「盛傳」故事，所謂「盛傳之說」，便是你那位執行編輯陳芳明（筆名宋冬陽、溫萬華）坐在寫字檯上編造出來的。而你每星期三晚上親臨編輯部督陣，竟也同意對老友散播如此不負責任的謠言！尤可怪異的是：在你們對我進行謠言攻勢的不久以前，「中央日報」說你秘密前往中國大陸，你還以特大號標題字鄭重

發表「許信良聲明」(見貴刊十三期), 抨擊:「『中央日報』最近誣指本人會秘密前往中國:這是一個令人厭惡的齷齪謊言。」信良,當「中央日報」誣指你的時候,你如此憤恨地發出怒聲,但你的憤慨之聲尚未飄散,而你竟用同樣的「齷齪謊言」加在我身上;你既然厭惡「黨報」造你的謠,那麼你為什麼在「美麗島」週刊上又散播我的謠言?你這樣做,不僅無法向讀過你那「聲明」的讀者有所交待,也是無法向你自己作交待的。

上次你們對我虛構故事以行人身攻擊的事,本來我的律師一再提出要控告你。



但我總存不忍相殘之心,而且你在電話中連連向我與珊珊道歉,因此作罷。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打這誹謗官司是「小題大作」。我要告訴你,不是的。第一,我們既然厭惡別人用造謠的方式污損我們,那末我們自己就絕不能以同樣的行為模式施之於人。想想看,口談理想的「民主鬥士」竟也使用不光明的手段去傷害人,這如何可能期待培養一個民主空氣的環境?其次,唯有訴諸法律途徑的制裁,才能逼使惡意誣毀者公開承認過錯。我這場官司打下來,雙方律師費的負擔,至少要比上三、四萬美金——這是我採取控告方式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樣我不僅要給誣謗者一個難忘的警告,也希望讓以後有造謠惡習的人,知所警惕。否則動輒揮筆傷人,輿論空氣總是暴戾相加,永無了時。現在看來,我當初對你抱着「與人為善」的用心是白費的,以至你們知過不改,竟又重施故技。

●對戴國輝的前恭後倨

前天,我看到你們在三月廿四日「美麗島」週刊上,有一則關於「夏潮論壇」

與台灣人」,直至新近出版的「台灣霧社事件研究」等書,就可證明其立場的一貫性及其觀點的邏輯性。所謂「立場一變再變」反倒是你自己。

●向國民黨栽陳映真的賊

在你們的「報導」中,最失原則的是對陳映真的指控。你們聲稱「根據島內消息」,指陳:「『夏潮論壇』革新號的主導者陳映真於不久前來美國『充電』,廣泛地與統派餘孽及中共外交人員會晤。回台以後,立即將他所收集海外台獨運動的資料主動提供給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以建立他在國民黨官方中的威信。中共奧援於外,國民黨默許於內,陳映真等人方如此大膽猛烈地攻擊島內台灣意識論者」。

你們寫這「報導」的動機,原來是不滿於「夏潮論壇」三月份革新號刊出的四篇討論「台灣意識論」問題的文章。但你們不在這論題上進行討論,却在與此論題不相干的事端上做文章。「夏潮」這幾篇文章,對目前島內外泛起的「說法提出檢討,是就事論事的態度。對於這類關係

和陳映真、戴國輝的報導。我非常驚異,委實難以置信,一位島內民主運動的知名鬥士、一個海外「反對派」的喉舌刊物,竟淪落到使用告密的方式對陳映真進行政治誣陷!

你們在這節「報導」裡,完全襲用台北「疾風」雜誌的口吻,攻擊:「『夏潮論壇』已與海外統派餘孽掛鉤」、「暗示他們甘為中共統戰之馬前卒」。報導中用詞遣字之輕浮油滑,充分顯示執筆者的人格心態(如使用「統派餘孽」、「前來美國『充電』」一類損人自損的字眼)。至於信口開河,說戴國輝為「一向喜歡講大話的無聊文人」,尤屬不該。信良,這樣謾罵戴教授,和你七九年經過日本拜訪他時恭敬的態度,豈非前後判若兩人。你心裏清楚,戴國輝在台籍學者中是難得的人才,即在日學界中也很受敬重。他是位史學工作者,又是台灣史專家,你們一再扭曲歷史事實去附會自己主觀的政治意圖,而他從社會科學觀點分析問題,你們無法在學術立場上和他理論,就空泛地說他「立場一變再變,致不受台灣人歡迎」。事實上,他來美這一年所發表的言論,他的日文著作出版了十幾本,從他六十年代出版的博士論文,七十年代出版的「台灣

豈非要使關過八年監的陳映真,再坐上十年牢嗎?你們這樣的做法,嚴重地反映出政治品格、政治手段及政治空氣三方面的問題。我想是值得我們來重新反省的。



(余光中)

●「美麗島」竟向「疾風」看齐

(一)關於政治品格的問題:當一個以理想自期,向不平等怒鳴的反對派,應該持守一些基本的政治倫理——特別是,我們所反對的東西,自己既不當悄然去做,也不當公然以行。你們對陳映真所做出的政治構陷行為,不僅有違一個反對派的基本原則,也有失一個普通公民的基本原則。尤其你曾是島內抗議運動的鬥士,你當知這種羅織入罪的手段,是衆人所唾棄的。你當記得「疾風」集團誣控我們的時候,我們是何等憤慨,正派的輿論是如何地群起而攻。現在,你們竟也使用「疾風」人物相

同的方式對待映員，這就反映着無比嚴重的政治品格的問題了。

〔關於政治手段的問題：假如我們不能培養「和而不同」的氣度，假如我們不能養成透過理智討論問題的態度，那麼起碼不可以公然使用流言蜚語，更不可行使政治裁贓的手法。說實話，我從你們多次的「經驗行為」中，使我深切感受到：如果你們一旦得勢，豈不要加倍的搞幾個警總來對付陳映真、戴國輝、王曉波這樣想法的人。想到這裏，想到近年來島內所呈現的一股相互逼伐的作風，不免感到民主空氣孕育之艱難。

〔關於政治空氣的問題：島內空氣的逼狹，我們是長期領受過的。人們總以為在海濶天空的海外，特別是多數「反對派」所嚮往的美國，總該有較多的自由討論的氣氛，總可學習一些別人容忍異己的長處。那曉得從台灣出來的反對份子，竟比在島內的更多紛爭、更為氣窄，動輒施以人身攻擊，乃至反對迫害的團體，竟也轉而傷害同在戰線上的人士。同類相殘的「個案」，我在美國也耳聞目睹過不少，總之，時下輿論空氣污染的程度，確是辛亥時期或五四時期留學界中所從未有過的。比起前輩，我們深感汗顏！

●會笑死文工會

信良，當年我們一起在台灣爭取發言權，難道現在你反轉過來，不惜以羅織方式消除別人的發言機會？

當年我們在一起呼籲大眾參與，難道現在你反轉過來只容許「獨」家之言？

信良，十年前我們一起高喊：「我們所理想的社會，乃是公平的、自由的、合理的、開放的、無恐懼的、無壟斷的社會。」難道現在你對陳映真所做出的，是開放的、合理的行為嗎？你們對不同意見的人使用扣帽子的方式，不是在製造恐懼的空氣嗎？

昨天上午，我給在台灣陳映真打了一個電話，問了他這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跟「中共外交人員會晤」之說，他的回答是：「我在美國的行踪，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什麼問題，CIA、FBI和國民黨的安全系統，比他們更清楚，實在用不着許信良忙着向台灣通風報信。我總認為，不同意見要用理智方式解決，：我為他們惋惜。」我再問他另一個問題：「關於說你『收集海外台獨運動的資料提供給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請你

說一說。」他的回答是：「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他們的說法，會笑死文工會啊。」

這是陳映真對你們指控的回答。

現在，請問你所指控的「消息來源」究竟根據什麼？陳映真在何時、何地如何「廣泛」地與那些「統派餘孽」、與那些「中共外交人員」「會晤」，又如何收集了什麼「台獨運動的資料」，在什麼時候交給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周應龍，你們有責任明確舉證。今晚我給你的電話中，你說是「根據海外的消息來源」。我說：關於這點，你們的報導就不真實了。你又對我說：「鼓應，陳映真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我回答你說：「陳映真要委託我透過法律途徑請你答覆並作更正。而且，你們採取這種政治誣陷的手段，別說對陳映真，你們對任何人都不是不可以的。今天如果你許信良被人這樣攻擊，我也要出來為你說話的。」這是我對這事的態度。你答應要回我信，希望廿五日之前得到你的回音。

敬祝
進步

一九八四、四、十一深夜
鼓應

海峽濤聲



生意經和拍洋屁

●許忠仁

從四月二十三日起，美國派遣一批為數達三十人的代表團來華，和我國洽商商標仿冒，侵害專利與著作權的問題，提出雙邊討論。本來，反仿冒商標，是一種維護消費者權利的神聖工作，反侵害專利與著作權，更是保障作者智慧結晶的防範措施。但是若因國外政治壓力，抹殺國內工業發展的潛力，不僅矯枉過正，而且有害國格。

事實上，國內開始重視仿冒及侵害專利等問題，純粹是國外政治壓力的結果。由於美國業界人士自認是仿冒商品的受害者，紛紛向國會議員遊說，要求制裁國外的仿冒者。議員乃循著各種不同的政治管道，向美國政府及外國政府施加壓力，解決仿冒問題。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取消GSP優惠關稅的待遇，要求各國嚴厲取締仿冒商品。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那是蘋果電腦在我國控告數家電腦業者侵犯著作權，國內法院在沒有判例在先，也沒有明確法令可循，甚至電腦的作業系統，能否獲得著作權保障等問題，都還爭論不休的情形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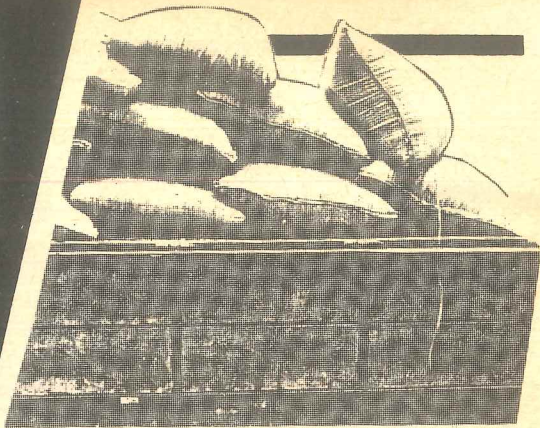
竟然將數個被告判處重刑！

此外，IBM公司為其個人用電腦，申請十三項專利權登記，這些專利權在美國並不獲准，在我國，雖在業界一片反對聲中，却通過了三項專利許可；這些例子，不能說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

經濟部長趙耀東，甚至一度遭受蘋果電腦之脅迫，欲全面查禁國產八位元電腦，而受全國各界的反對，未成事實。此事件之反映，明白地昭示國人：政府各級官員趨炎附勢，拍洋屁，犧牲國內中小企業，而特別「照顧」外國企業之心態，完全表露無疑。

這次中美反仿冒會議開談前，美方對我方，曾有意作若干承諾，以交換我國加強取締仿冒之代價。但國貿局却在未得到美方確實承諾前，自行退讓，將侵害化學品專利權的舉證責任，由先前的原告負責，轉成由被告負責，在會議前就自掀底牌，致使我國喪失了一個可資利用的籌碼。

據悉，國貿局長蕭萬長，所以如此作了重大讓步，恰巧與雷根訪問大陸有關；為了向美國政府表示，我們的確很想維護



●台灣勞工究竟為誰流汗掙錢？

海峽濤聲

台灣治安 好在哪裏？

●黃順興

中國時報載，警政署長何恩廷三月十六日在師範大學的一場演講中指出：台灣地區兇殺案件比例僅次於美國。犯罪率偏高，原因是無緣無故動刀的情況居多。

何恩廷在探討台灣地區犯罪問題的因應措施時，說明台灣和許多國家的犯罪發生率相比，台灣地區兇殺案件特別多，其餘都很少；治安情況良好，破案率也顯著提高。

何恩廷認為，根據警政署現有的統計資料，台灣地區兇殺案件率高的原因是國

面或圖片，以填滿整個社會版面，豈不令人怵目驚心。

依據新聞報導，兇殺案件固有因多瞧一眼而動刀，但其比率顯然愈來愈低，倒是動用現代利器的「槍殺」兇案比率增多了，據推測流入黑社會的槍枝足可裝備三個師的軍隊，到底如何就非吾人所能確知了。

何恩廷祇說台灣犯罪率之高僅次於美國，他應該說台灣兇殺案所使用的兇器已經趕上美國水準了。時下動不動就亮小刀子的小混混不但被黑道大哥瞧不起，即連刑警先生也不甚重視了。

談到兇殺案的原因，何恩廷說台灣人民無緣無故動刀的居多，不像外國都係財殺，情殺或仇殺。這說法也顯然有違事實吧！就報紙上所見台灣發生的一百件兇殺案動機，九十件以上是屬於，財、情、仇

，再以高價採購，以示國民黨政府的「奴顏」。可是我們換取到什麼？竟是被美方脅迫，召開不該談的「中美稻米談判」，連賣到東南亞的稻米，都要受到美國的干涉和限制。

究竟台灣是美國的「第幾州」？臺灣的農民、工人和中小企業商人，究竟為誰辛苦流汗掙錢？這些質疑，至少令我們殷切期望國民黨，在對外談判時，拿出對付黨外時耀武揚威的勇氣，不該談，不該讓步的，就不應該談，不該讓步！否則再讓步下去！大家只好到太平洋洗澡了。

人有細故動刀的惡習。在其他國家，兇殺主因不外財殺、情殺或仇殺，不像我國許多兇殺案件，常起於互相敬酒，搶著付帳，或路上多看一眼，即取刀互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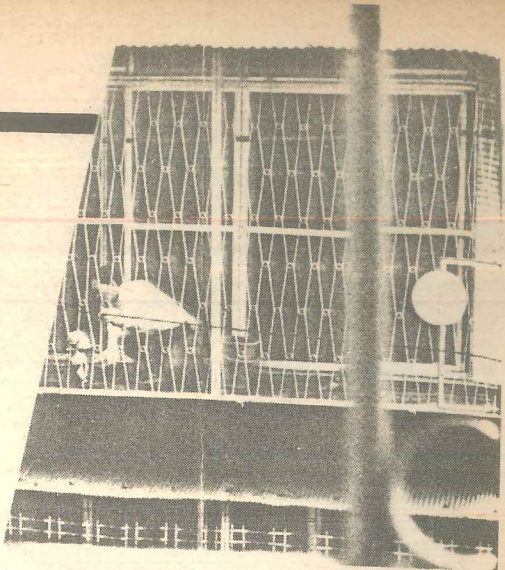
看完了這一則報導，相信很多讀者都會有莫名其妙，突然間墜入五里霧中的感覺吧！

當吾人於一日之始，一翻開當天的報紙，最先映入眼簾的，都是種種「為財」、「為情」、「為仇」而動刀槍殘殺的醒目標題，發生的兇殺案件，還附帶橫屍場

或其混合體者。

至於中國人「生性好鬥！」的說法，這似乎又與實際不符，歷史上除了蒙古出身的大頑童不說，大漢民族主動去別人家開闢討戰的並不多見，反而多的是受盡人家萬般欺凌而忍辱，甚至不惜割讓國土而求和者，歷史斑斑可稽，如此世界第一「愛好和平」民族怎能說是「生性好鬥」呢？更何況「好鬥」與「兇殺」之間亦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啊！

總之，今日台灣社會槍刀泛濫，兇殺、搶盜劫掠無日不有，家庭遭遇失竊者既賴於報案（因難得破案），而劫殺案歷久不破。凡此事實，使善良百姓睡不安寢，造成台灣家家戶戶裝釘鐵窗之奇景，難道身為最高警察首長者竟還有「此地治安良好」之言論呀！如其非中國時報記者之筆誤，豈不叫吾等百姓憂心忡忡乎！



●家家戶戶裝鐵窗，治安究竟好在哪裏？

海峽濤聲

「春風」創刊 ，警總查禁

●陳省民

在歐威爾筆下的專制年代——一九八四年，台灣吹起一陣文學的「春風」，但不出歐威爾所料，「春風」果然被國民黨查禁了！！

出版於今年四月的「春風」創刊號——

獄中詩專輯——事實上不是政論雜誌，而是一本文學雜誌。國民黨之查禁文學刊物，在台灣近三十幾年的歷史中，這倒是絕無僅有的。若有，也僅有高準以前辦的「詩潮」。



春風詩叢刊·獄中詩專輯

創刊號的「春風」以文學評論，文學史介紹，譯介及詩創作為主。在發刊詞中，他們力倡當今的文學工作者應當更加勇於批判，承續傳統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及日據下的賴和揚華等的批判精神，見證歷史，寫出「史詩」。並認為「展望未來的台灣文學，正與展望台灣前途一樣是緊緊連結的」。「春風」標舉出三大信念：

「第一，在形式上，繼承優美的韻文傳統，走向平民化社會化。第二，在內容上，秉承優秀的現實主義傳統，及其抗爭精神，勇邁前進。第三，在方向上繼承新詩發展以降的平民性，運動性，批判不義，擁抱台灣，參與改革。」

創刊號的論文，首篇是「文學與政治的歧途——訪許達然先生談台灣現代文學」，文中深刻地對目前文壇的宗派現象，再三致意，希望不要走上文化協會的覆轍。並對作家與世界觀的關連，台灣的資本主義的統治本質，有極為深刻的剖析。

陳映真的論文「反諷的反諷」則對目前用「理性學術」來裝扮自己的「鬼影子知識份子」，加以分析，而明顯地浮現出這些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泛歐美中心主義」的學術買辦罷了。

另外，有韓國社會運動家金藝河的介

紹，這是金藝河的詩創作，首度在台灣有完整的翻譯，值得文學創作者參考。

「詩的歷程」則重新探視新詩的歷史發展足跡，從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首刊新詩始，寫到一九四九年的國民政府遷台，對詩的發展有極為詳盡的介紹，也打破了現代派在台灣製造的神話。

最值得一看的是「獄中詩專輯」及「山人詩抄」。該輯以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的「獄中詩」為主，另有三十年代詩人戴望舒及日據下台灣詩人楊華的詩選。希克·梅特坐牢二、三十年，仍然勇敢豪邁，在獄中高唱：「就是這個樣子，我的朋友／問題不在落成了囚徒／而在怎樣避免投降。」是一篇振奮人心之作。

「山人詩抄」則是台灣的先住民第一次創作現代詩。歌唱了他們原始的生命力與當今的處境。台灣文學有了先住民的文學，才能算是完整的台灣文學，「春風」總算是跨出了第一步。

據了解，「春風」是由戰後成長的年輕文學工作者所共同創辦。當第一陣「春風」被國民黨查禁時，「春風」同仁正積極籌劃，準備推出第二集「台灣山人人文學專輯」，預料中也是台灣現代文學的一項突破。

海峽濤聲

全斗煥 打了阿Q一巴掌

·黃承興



(全斗煥)

四月間，台灣民衆的熱門話題有好幾個，其中之一，就是亞青杯退賽事件。在今天，除了睜眼睛子才會說「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之外，到底有沒有真正為體育而體育的國際性體育競賽？

十幾年以前，中共的優秀運動員到美國各州比賽乒乓球，你會相信這純粹是球技切磋，而非「政治」外交嗎？

四年前，美國爲了巴解在奧運村對以色列運動員的一項報復性屠殺行爲，而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你會相信它不是一種政治行爲嗎？

二年前，台灣地區主辦世界盃女子壘球賽，所引發的那場熱烈討論。你會相信我們只愛體育而不愛政治嗎？

事實上，今天的任何國際性體育競賽，多半淪爲無體育精神的肌肉作戰。體育，已經是國際政治的另一個競技場。

因此，我們都在不願做睜眼睛子的情況下，眼睜睜地看到了韓國（我們對該國稱之爲「韓國」，大概是全世界最尊敬的稱呼了。在國際上，它們是 South Korea，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口中，它們是「南朝鮮」。叫它們「韓國」，等於我們承認它是朝鮮半島的唯一正統國，北韓是韓

匪。所以，「韓國」，這是多麼地含有敬意的稱謂啊。）在這個節骨眼上打了我們一巴掌，這一掌打在國民黨的臉上，也打在非國民黨的臉上。

按理說，台灣朝野應在同仇敵愾的原則上，針對亞青杯退賽事件，一致指責南韓朝野——特別是以全斗煥爲首，美國在南韓所安排的精英買辦集團。但是，聯合報卻在四月十日用極大的標題替一心想相中共握手的全斗煥說：

全斗煥對亞青杯事件關切震怒 授意挽留我隊並下令澈查責任

當台灣外交又一次受到打擊的時候，聯合報所表現出來的「阿Q精神」，不能是該報的編輯不懂何謂體育與政治，而是聯合報一貫地以爲他們必須在傳播媒體的角色上，具備著政治眼光與風範，來保全台灣的大局。殊不知，這一套編輯公式，重覆使用多次之後，是會庸俗化的。

全斗煥打了我們一計巴掌後，在還沒有送糖來的時候，聯合報卻先送了一個免費的大糖替南韓在台灣下台階。在台灣，

駝鳥和兄弟之邦

●金惟名



●亞青杯爆出外交問題

第八屆亞青盃籃球賽，又在「升旗、唱歌」的老問題上，退出比賽。這一幕鬧劇，國民黨自編自導，國內報紙也被授意煽風點火，大搞愚民政策，目的是要把人民的眼光萎縮在台灣，為自己的外交無能掩飾。這種不擇手段，窃取老百姓的同情心理，正是卅幾年來國民黨的慣用伎倆；不論在外交、經濟、貿易上都是這種駝鳥故伎，已經在在顯示出，它是個無法進步的黨。

卅幾年來，國民黨的御用報紙慣常稱呼中美、中日、中韓為「盟邦」，其實中國人再怎麼受盡污辱，也不致於如此聊表自慰，自取其辱。這種作法，弄得今日台灣的外交關係矮化，徒喊「兄弟之邦」、「傳統友誼」等空洞名詞，其實是早已被甩或將被甩，裝作不知，或知而不報。

我們只要看一看，四個月前，中國時報華府特派員傅建中竟然指出美國國務

許多人是該報的訂戶，也是消費者，但同時也為該報在四月十日上的阿Q精神感到憤怒。
南韓親中國大陸的事，結局現在已經可以想像到，這不是南韓的錯，也不是我

們的外交人員亂搞，這是時勢使然。現在問題是我們的應變工作做的不好。不過，南韓在這次亞青杯中表現的無情態度，也同時證實了，南韓的外交手腕畢竟不夠老練，留下了那麼尖銳的稜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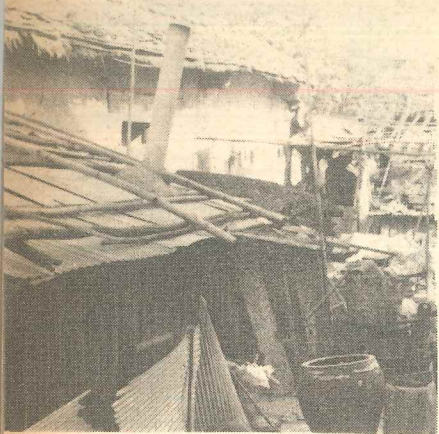
院宣稱「國民黨在台北建立了一個流亡政府 (a government-in-exile)」，就可以了解我們的外交在國際上，建立在甚麼對等關係上？

美國如此，日本如此，南韓也早開始要台灣、吃台灣，他們認為「你沒有我不行，我沒有你無所謂」；又，南韓的貨船可以在台灣攬貨，台灣貨船却不可以去攬貨，韓航來台班機多，華航去的少，他們的蘋果、小馬汽車可以來，台灣的香蕉、裕隆不可以去，這不是早已被吃定了麼？這算是那門子的兄弟之邦？

別人「吃利不吃虧」，我們緊呼「傳統友誼」，這種外交局勢，並非一日造成。卅年前的中日和約，可以直稱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奇特的條約」，為日後不平等的外交關係種下了惡例。日本是戰敗國，和約卻依照日本的約束和條件訂定，而國民黨却大呼「以德報怨」，任日本予取

官商吃紅， 農民叫窮

●廖莫白



(台灣農村)

予求。

韓戰之後，經過數十年的冷戰仇視，中共和南韓之間各自展開國際性體育競賽，迄今為此，雙方又藉著「籃球外交」、「網球外交」，進行友誼外交關係，這個模式正如一九七一年中共和美國之間的「乒乓外交」，對雙方而言都是第一步嘗試。中共自稱，目前北京方面正積極考慮拓

目前，進行於台灣各地的農地重劃，正積極的展開，每個農民除了必須拿出一甲地兩萬元重劃費用，亦需提出十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建築道路、水溝。農民在花了錢、浪費地的情況下，莫不怨聲載道，初步上已對重劃工作喪失了信心。

去年發生於彰化縣溪洲鄉二林鎮的農地重劃貪瀆案件，更可以看出執行時弊端百出。由於重劃委員都由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充任，他們包攬工程、投暗股或由親信出面包工，以致偷工減料的事情屢次發生，在設計圖上則是捨直取彎，不按正道而專走後門，有辦法的人因而獲利；使得老實的農民吃了大虧。

發生在彰化二林鎮新興土地重劃案件，由於農民有上述的受壓迫情形，乃到法

展雙方的廣泛接觸，在未來的二、三年，進行文化、科學和技術之交流。

至於經濟方面，却是南韓一直很想靠攏中共的理由之一，中方也曾表示，可以透過香港和日本為中間媒介，進行間接貿易，至於體育方面，雙方除了在亞青杯交過手，下一回則是游泳賽接觸。

院按鈴申告重劃委員。這件案子雖然不了了之，却傳出設計重劃人員畏罪自殺；以及少數的重劃委員受到拘押。然而，隱藏於重劃工作的背後問題，諸如偷工減料、趁機獲利、偏袒親信等等，已經在農民間傳佈開來。

目前，斗六鎮重光里正在進行中的重劃工作，也產生弊病，幾乎是前案的翻版。四月十九日，重光里的農民聚集在縣議會請願，在投告無門的狀況下，三十幾位農民，一齊騎機車、或搭乘客運汽車，跑到省議會陳情。

他們都說：「相信土地重劃政策是對的，但希望重劃工作在執行的過程中，能做到公平、公正，這樣，我們就不會有任何怨言。」



(台灣山胞)

海峽濤聲

劉家昌排名

第八十五

● 李小中

活動，以保持「純潔」，「只能參加國民黨的活動」，以免受人利用……。而且以惡毒的語句，醜化「高山青」及胡德夫等人，令同學絕勿效法。但高山青就在座談會一週之後，發行了第二期。

黨外對高山族正逐漸形成的「自覺」運動，持較肯定的態度，可惜在做法上沒有國民黨那麼積極。康寧祥在任立委期間曾質詢過少數民族的權益，其他如前進、博觀、春風等偶有報導，另外，黨外聯誼會也剛成立一個少數民族委員會。最近有關高山族問題所舉辦與即將舉辦的活動，似乎更為活絡起來，例如：三月廿二日至廿四日以山地建設協會之名所舉辦的「山地自強座談會」，雖然座談的流程仍有令人不滿之處，至少也帶給山地知識份子反省的機會。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台大代聯會

和山服團合辦的「少數民族週」，就有一連串的演講，座談等活動。另外自立晚報也準備從五月起，作一系列的山地專題；還有其他團體或傳播媒體，也正着手做系列的高山族問題及其權益之探討。前述的現象，很明顯的發現高山族的自覺運動正逐漸形成，而在其形成的同時，受到二種勢力不同的反應，只是兩種反應的力量不一，這種正負面的反應，不平衡的情況下，由於正面的反應處於劣勢，使得高山族無法安心的自覺，例如：高山青的某編輯最近受警總的注意，而發生意志動搖的現象。不過，吾人深信，少數民族的問題將是熱門話題，而其成敗，端賴高山族「自覺」運動之有效運作，因此，山地知識份子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終究光是依賴別人關心是不夠的。

也因為港幣大幅貶值，來香港以外幣兌港幣買東西便宜之故。

電子業、成衣業、玩具業……等等，出口業績可觀，只是，香港資本家再投資的意願仍然不振，誰都要「謀定後動」、「信心」還是個大問題。

電影製片業就外表看仍有可為，實際

一九八三年的香港，依然被「一九九七」陰霾籠罩！一般市況在表面上是「強顏歡笑」，作「歌舞昇平」狀，但背後有着重重的隱憂，則是誰都心知肚明的。個別行業，賺錢的當然有，如旅遊業就是，只為外國人好奇，要到香港來看看為「九七」而彷徨的香港人怎麼過日子，

上，新片開拍數量減少了，尤其小本經營的獨立製片，大都掩旗息鼓。

票房紀錄如何？從數字看，比八二年度有輕微增長，只為八三年中加過票價。

新片開拍減少，是因為製作成本太高，外埠銷場收縮，在本港上映收一百萬也要大虧本。若干年前收一百萬，可以擺幾次慶功宴哩。

八三年，國片的新片上映有一〇八部，舊片重映的有一五六部。「百萬鉅片」有一〇式部，比八二年的九十七部是多了；但新片首映過不了百萬關的也有十四部。

八二年的國片「千萬鉅片」有八部，八三年則有九部。最驕人的是嘉禾的「A計劃」和新藝城的「陰陽錯」，到八三年完結時，「A計劃」映過十天，已收入一千五百一十七萬三千餘元；「陰陽錯」映了十七天，已收入一千二百六十七萬九千餘元。兩部片的映期都跨進一九八四年，因此撥歸八四年再算了。

喜劇片在八三年大都賣座，有人認為八四年仍是喜劇片天下，那要看下去才知道。

八三年收逾百萬的國片，按收入次序

排列：

第一名是：「最佳拍檔大顯神通」，二月五日至三月三日，映期廿七天，收入二千三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四十元。

新藝城出品，曾志偉導演，許冠傑、麥嘉、張艾嘉、倉田保昭、汪庭歡、徐克等主演。

第五名是：「火燒圓明園」，九月廿一日至十月十九日，映期廿九天，收入一千五百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三元。

新崑崙出品，李翰祥導演，劉曉慶、梁家輝等主演。

但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國內報紙、影劇版吹捧劉家昌導演的「風水二十年」，在港票房收入，超出李翰祥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但事實上「風」片在港排名第八五，放映成績如下：

「風水二十年」，九月廿一日至廿七日，映期七天，收入一百五十四萬八千八百〇四元。

廣場綜藝出品，劉家昌導演，甄珍、凌波、柯俊雄、關之琳、胡慧中、秦漢、歸亞蕾、陳觀泰、伊雷等主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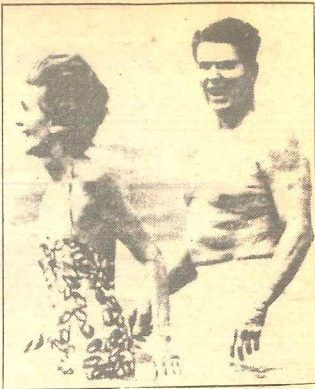
這又證明了國內報紙虛妄、傲慢的一貫作風，睜眼說瞎話的無恥之舉。



(劉曉慶)



(李翰祥)



特別報導

雷根訪問中國大陸

●王開

雷根於四月廿六日訪問中國大陸，這是繼一九七五年福特訪問中共之後，另一次正式訪問。總統雷根這一次的六天訪問當中，除了與中共官方舉行總共七小時的會談之外，並訪問了北京、西安、上海等各地，同時在人民大會堂上舉行演講，南下上海，與當地大學生作一場對談等等，足見這一趟訪問，一般咸以為是多采多姿的愉快旅行。

●雷根和舒茲的公開聲明

美國國務卿舒茲在雷根訪問大陸前的記者招待會席上說：「總統的這次訪問，是一個過程的一部分，也是一種重要的行程」。

雙方在戰略情勢上，持有共同的立場。

三、為了達成共同步調，我們曾經費了十年歲月，因此，這次的訪問，我希望能更加促進雙方的友好關係。

四、夏威夷是美國最新的一州。這次旅行訪問，從位處太平洋十字路口上的夏威夷起程，相當富有意義，對雙方人民的和平與友誼，也是值得重視的一舉。

五、中（共）美雙方的友好，不僅「世界和平」不可缺；對美國而言，含有決定性的國家利益。

六、「環太平洋地區」是美國商品、服務、投資各業最急速成長的市場之一，美國的未來貿易對此地區的依賴性很大。

●中共人民並不熱烈歡迎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之前，中共的歡迎儀式中，雷根接受中共於不久前始恢復的二十一響禮炮，然後，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官員舉行會談，李先念也以國家元首的身分接待雷根。中共方面，自雷

自從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中共以來，使中（共）美關係開始發生急速變化，緊接下來七五年福特的訪問，以及七九年卡特政權時代的中（共）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等一連串行事，使雙方關係更加深固。這次雷根的訪問目的，就是欲把這些已鞏固的關係，再進一步地加強。以上的觀點，都是舒茲在記者會上的說詞。

雷根在檀香山機場對記者表示，這次的大陸訪問，希望能提高中（共）美雙方的友好進展，並發表如下的聲明：

一、和中共展開關係，互相建立外交，這是美國在戰後的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二、現在，美國不僅是中共的第三貿易國，在經濟、教育、文化領域互訂廣泛的協交，關於反對侵略高棉和阿富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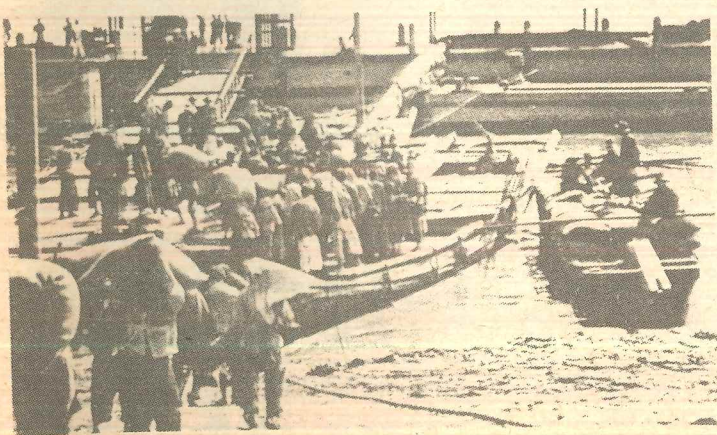
根訪問前一個星期，早已佈置擔任警衛工作的武裝警察部隊，並在北京市內一再舉行護衛演習，甚至還備有緊急用直昇機，其緊張情形可窺一斑。

中共新聞界為配合雷根訪問，連日揭載「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或「國際戰略學會會長」吳修權的論文，討論有關中（共）、美外交問題，並表明希望美國總統的訪問，能加深雙方的安定關係，其中另舉出雙方有關經濟、與貿易方面的發展數字，以介紹七九年恢復邦交之後的實際績效。

中共的一般民衆，並不如官方的熱烈，也不表示歡迎。原因無他，因為不到一年以前，中共因纖維談判、科技移轉、女子網球選手胡娜投奔事件以及清朝鐵路債務問題等，糾紛仍在，並責難「雷根政權傷害中共人民的民族感情」，因而還存有強烈的「反雷根」情緒。

●談判「臺灣問題」

雷根訪問中，的雙方實質決定，祇有簽訂為防止雙重課稅的租稅協定，以及八四、八五年的中（共）美文化協定等等。



●中國大陸的碼頭工人

但對於台灣問題，據中共的外交專門雜誌「世界知識」最新一期，以「求安定的中（共）美間長期發展」為題，明確敘述雙方的意識形態與對第三世界的政策雖有不同，也不致於阻礙雙方關係，而以「雙方之間，目前尚無重大軍事威脅或對應關係，經濟上也各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主張「中（共）美能互相補償」。另外，強調「影響中（共）美關係的各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台灣問題，首先須排除這種障礙」，而要求美國遵守雙方的三項共同聲明，特別是「武器售台」的問題上，須減少它的質與量。

維繫中共與美國關係的三項共同聲明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簽訂的上海公報，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公報與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簽訂的公報。

八一七公報的簽訂是為了緩和中共對美國武器售台的關切，其中美國承諾了逐漸終止「武器售台」。此外，美國同意銷售台灣的武器「在質與量方面」都不超過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時的水準。但中共抱怨說，美國最近銷售給台灣的武器，已超過這個水準。

●雷根扭轉威信的好時機

這篇專論，也重申中共不願與美國合作，在戰略上挫傷蘇俄的世界戰略。美國與中共建交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聯合中共制衡蘇俄，但中共兩年半前宣稱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員，拒絕與美國實行戰略合作，抗衡蘇俄。

七五年尼克遜訪問大陸之際，電視錄影會把各種場面的鏡頭，透過衛星轉播傳給美國每一家庭，那次報導使美國人強烈改變了對過去中國的認識，而且，尼克遜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談話的場面，也令尼克遜的聲望提高不少，從此對於想競選連任的總統而言，訪問中國大陸，確實是

一場很漂亮的政治秀。

今年，美國的電視，可能再度播放站在長城上的總統英姿，這是雷根爲了連任競選活動中，最重要的政治表演之一。對於在黎巴嫩受挫、尼加拉加的秘密佈雷作戰，又被國會批得體無完膚的雷根政權而言，又是一次恢復威信的絕好機會。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此外，十二年來雙方關係的變化，也有許多令人矚目之處。

越戰發生時，美國根據骨牌理論，害怕南越戰敗後，共產主義將會蔓延至東南亞各國，而當時認爲共產主義膨脹的禍源，並非蘇俄而是中共。

由於美國預測錯誤，事實却證明經過

越戰結束後，中共竟然傾向西方，甚至與越共發生交戰。因此，即使舒茲也評價中共將是對蘇共和越共問題的「亞洲鑽石」，可以說，美國在越戰後失去越南，代之獲得中共。以我國俗語而言，可以喻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反觀十二年前，尼克遜離開大陸前夕的回敬宴，與歡迎宴一樣，同是設在人民大會堂，發生了一件總統用著不對的笑話，這次，雷根的回敬宴，則在美國與中共合作新建的長城大飯店，以西餐招待六百名客人。同時北京街上，最近也有一家名爲「義利」的西式速簡餐廳開幕，專賣熱狗與三明治等。這些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在這十二年來的變化確實令人驚異。

賴和入祀大典

實況

康橋

●彰化各界熱烈慶 賴和入祀大典

獲致平凡的抗日烈士賴和先生，生於一八九四年。今年四月廿五日，彰化縣市各界爲賴和先生九十誕辰，熱烈舉行追悼會，暨恭迎賴和先生靈位入祀大典。

當天上午九點半，各地方人士聚集賴府門前，也就是昔日聲名遠播，懸壺濟世的「賴和診所」。這個日子，對賴和家屬及台灣人而言，的確是令人深思，百感交集的日子。

遊行的隊伍由大型的白色布幅在前引導，布幅上書寫著「恭迎賴和烈士恢復入祀忠烈祠」。隊伍雖浩蕩龐大，向忠烈祠前進，但隊伍中最引人側目的，除了排首賴和先生的二位公子，手捧靈位，其次便是黃順興先生所率領的廿五位黨外作家和編輯，他們曾爲賴和先生平反奔走盡力，也可告慰賴和先生一生的抗日英舉。

「安位典禮」由主祭黃縣長主持，與祭者有黃順興、呂世明、胡秋原、鍾肇政、李篤恭、陳映真、楊逵、李賜卿、林荆南、楊雲萍等諸位先生到場觀禮，至上午十時卅分禮成。賴和先生家屬並於中午十



佈滿內外，而參加紀念會的學生卻表示：「賴和是誰？我們不知道。學校要我們來參加，昨天才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

請問執政當局，我們的歷史教育怎麼教的？如此一位抗日英雄蒙冤，今年元月廿二日平反，至今二個多月，學校老師竟從未向學生作機會教育？

2. 當局在民國四十七年時，倉促逐出賴和先生靈位，現在是否也以倉促一舉，交差了事。政府規定檢舉匪諜有二項原則，一是「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二是「誣人匪諜，反坐其罪」。現在賴和先生平凡者，誤陷者是誰？必須昭告天下。

3. 賴和家屬終於脫離長達廿六年的陰影，重見天日，誠可嘉可賀。但台灣尚有多少抗日英雄被關在牢裡？尚有多少人士蒙受不白之冤？也必須昭告天下。例如現今仍在牢裡的劉峯松先生，因爲曾景仰賴和先生之英舉，遭受圍困，又如何解釋！

「平凡賴和先生是不夠的！」這一次平凡紀念大會，國民黨的作法，和中共慶祝紀念會一樣教條。但許多參加盛會的黨外人士紛紛表示，「紀念會好像是國民黨辦的！」，顯示黨外不認清這一點，並不積極主動。而國民黨的新技術官僚却遠遠知道，如何疏導群眾之情緒。

二時宴請親友，以答謝各界。與祭人士皆應邀入席。

「賴和烈士九十誕辰紀念大會」算圓滿閉幕了，但亦引發一些問題令人迴思：

1. 當日賴府貴客盈門，禮幛、紀念花籃

名古屋

反核運動

● 李立苓 寄自日本

些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在工作之暇，乘著理想與實踐而組成反公害、反核武、反戰的運動團體，雖然組織不大，但憑著一股崇高理想和滿腔熱血，他們的行動非常積極，發揮的影響頗為可觀。

● 協助調查台電林口發電廠

名古屋地區就有一個這類的團體，其核心成員有一、二十名，以名古屋大學幾位年輕教授、研究員及附近一些公務員、小生意人為主幹，再擴及到名古屋附近的幾個縣市。他們沒有特定組織，卻有明確的運動目標。以「反公害」為主旨，因為位居日本重工業城市——名古屋地區，不遠處又有一個嚴重污染的石化工業重鎮——四日市，所以他們一向最關切公害污染，多年來，一直參與著四日市的反公害運動，並針對污染情況作長期的調查分析。該團體甚至多次自費前往台灣桃園海岸，調查台電林口火力發電廠對當地沿海地區的污染情形。（編按：由於該團體的幾次調查報告，和前任立委黃順興先生的相繼質詢，促使台電作了某些改善，去年夏天，桃園北濱海枯萎多年的防風林，首次再現生機



● 參加廣島和平公園的反核集會

● 經濟成長，破壞環境生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全力發展工業，雖然在經濟上獲得快速成長，但自然環境也在一代之間完全改觀，造成城市空氣污染、工業區公害案件、自然景觀破壞……。如今，終於激發日本人開始檢討、反省經濟發展的真正價值在那裏？從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一直延續到今日，觸使日本環境運動因而蓬勃地發展，各種性質互異、大小不同的環境運動團體，紛紛在全國各地成立。

一般的環境團體組織，乃為對抗區域性的環境事件而自然形成，慢慢擴大至全國性。不過，在環境運動的風潮中，有一

● 自己產銷柑桔，不怕污染

目前，這個團體亦是九州水俣地區，有機農業的全國特別銷售系統之一。水俣地區自從遭受水銀污染，發生中毒事件之後，當地居民對環境公害格外敏感，因此停止使用農藥和化肥，改用堆肥的有機農業，在此地特別發達。目前已有四十多戶柑農加入有機農業的經營行列，年產二百多公噸柑桔，全部經由全國各大城市的生協（有機農業生產組合）和環境團體共同配銷。

今年三月初，名古屋這個團體成員就曾經在兩天內，大家帶著地圖、帶著便當、夾著傳單，至附近幾個縣市，義務性地將兩大貨櫃（約二千餘箱）的柑桔，配給已經預購柑桔的民宅，並順便發送他們的運動傳單。

● 「廣島原爆紀念」和平集會

除了參與水俣地區有機農業的配銷工

● 帶著放映機，推廣運動

他們經常帶著小型電影放映機、幻燈機，到社區放映該環境團體自己拍攝的反公害紀錄影片，或作專題講演以啓迪民衆。有時便和全國各地反公害團體聯合舉辦活動。而他們核心成員每週定期一個晚上，聚集一起研討預定的主題，配以影片和幻燈片解說。主題涉獵極廣，有全球核武器配備情況、電腦對家庭和社會的衝擊、第三世界農業污染狀況、婦女問題：等。

● 進步性的團體組織

值得稱許的是，他們不但理想高，行動力強，而且思想理念與生活實踐非常一致。絕不流於「講的是一套、生活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在這裏，沒有種族歧視；男女皆能下廚，沒有男女不平等；視勞動為神聖，沒有工作貴賤，也不卑視勞力。平時各自守著工作崗位；活動或工作時，不分男女老少、不論職位名分高低皆能熱情地投入勞動工作，充份顯示了這個團體的進步性。

蘇俄電腦背叛「老大哥」

最近莫斯科的街頭書店，出現了俄文版的電腦程式、電腦設計理論等書籍，民衆爭相搶購。

●為共產主義服務的電腦學

一位蘇聯院士A·I·伯爾格在「為共產主義服務的電腦學」一書中曾強調，沒有一個國家利用電腦，會像蘇聯這樣有成效。他建議蘇聯大學生主修電腦，各大學開設強調資訊理論的課程，蘇聯的教育科學院設立了一所寄宿學校，目的在奠定兒童未來學電腦的基礎，蘇聯的科幻小說也大量描寫「電腦式的頭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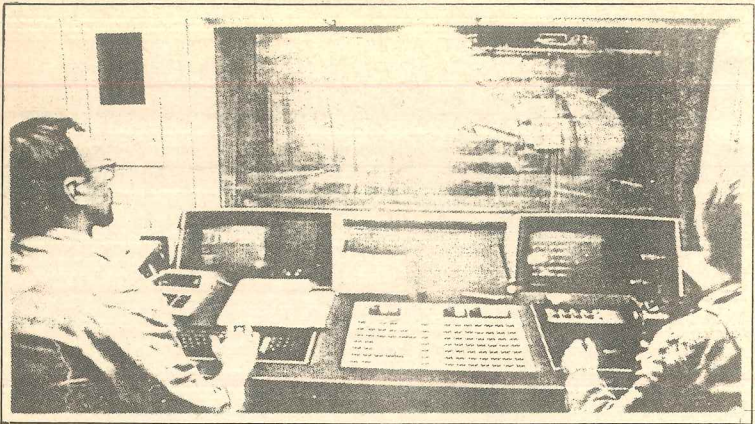
十年前，全蘇聯的經濟是由一個巨大的電腦網所控制，蘇聯官員自信，比起像美國這些經濟活動混亂無序的資本主義體系，蘇聯這種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更能得惠於現代的電腦。但現在蘇聯的態度正在改變，因為電腦這樣的科技，對蘇聯政府並不特別有利，蘇聯控制資訊與重要資料的基本政策，正受到這些電腦及與之相關文化的威脅。

●周濤音

最近莫斯科的街頭書店，出現了滿是俄文版的電腦程式，或設計理論的書，並出現民衆搶購的熱潮。

俄國學者認為，蘇俄的電腦設計正急速趕上西方國家，在現代科技革命中，電腦也改變了蘇聯的經濟體系，並使之走向現代化。

早在二十五年前，蘇聯就了解電腦的重要，只是他們一直沒有把電腦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如今在實際運用方面，蘇聯已經落後於先進國家好幾年了。但是落後並不意味著漠不關心。這幾年，蘇聯境內正掀起一股電腦熱，大部分是以理論分析為主。流行於大眾的文章與書籍，都認為充分運用電腦學的現象，與共產主義的出現及革命的實現有同等的意義。



●蘇聯境內掀起一股電腦熱

●蘇俄人民對「老大哥」洞察無遺

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曾說，現

代科技將使政府變成一個監視一切活動的「老大哥」。但新式電腦需要大量、精確的資料，且需要把資訊的運用分散，這樣一來，公民就能對「老大哥」洞察無遺，而不是「老大哥」監視公民的一切活動。

如果蘇聯幾百萬公民都擁有電腦，活用到各行各業，從電腦中得到各行大量可靠的資訊（包括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人口的），甚至利用電腦「告示欄」交換訊息，蘇聯當局就不可能控制了全國了。因此，只要蘇維埃制度一天不改變，蘇聯人民就不可能被允許像西方國家這樣的運用電腦。

●蘇俄電腦既能控制，又能不改宗旨

蘇聯會不會想出一個辦法，既能利用電腦，又能控制全國呢？在蘇聯制度下，農業並未得到很好的發展，蘇聯體制可能也並不適用於資訊時代。蘇聯在未來十年內如果仍然不改其宗旨，就不能再做第二超強國。在經濟實力方面，日本正把俄國推到第三位，現在只有軍事力量能與美國並駕齊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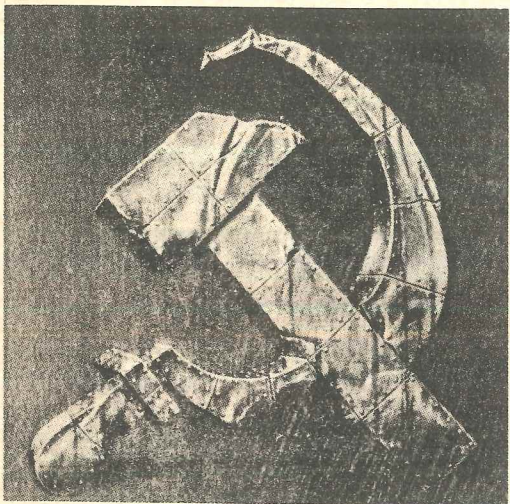
目前蘇聯談電腦的書的確不如一、二

十年前熱門，現在已到了實際製作的階段，早先對理論的著迷已消逝，進一步的想法產生了。

●蘇俄有一部相當有名氣的電腦

蘇聯電腦仍然落後西方一大步，但蘇俄有一部相當有名的電腦「艾爾布魯斯」，就常常解不出問題，蘇聯政府和軍方，不得不漸漸開始使用西方國家製造的電腦，若是買不到，就設法自己仿造。

幾位西方分析家曾提到，蘇俄電腦設



●對蘇俄而言，電腦是個棘手問題

現在微電腦和個人電腦，後勁十足，幾乎可與塊頭較大的老前輩並駕齊驅。不僅如此，小型電腦用途廣泛，可以大量製造，因此必要時，可以聯結各小型電腦成爲一個大型的主體電腦。

廣泛運用電腦，最有效的辦法是，不採中央控制系統，在地方上，較簡單的工作，可用微電腦操作，如果處理事務必須透過更多的資料，或借用集中資料的資料庫，那就把微電腦接在連貫系統上。國際電腦工業這樣的發展趨勢，對蘇聯而言，是個棘手的問題。

國際最難唸的經

周世櫻

一、跨國公司四大特色

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一種現象，此一現象正逐步腐蝕它原本穩固的基礎，它的名字叫跨國公司。據觀察家估計分析，它的特色有四：

一、跨國公司擁有價值伍仟億美元的財產，這個數字相當於西德加上英國國民生產毛額的總和，幾家規模最大的公司，例如通用汽車公司、IBM等，每年收入高達百億美元。

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跨國公司目前占全球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四十，占外貿額百分之六十。

三、跨國公司壟斷了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先進技術，甚至各地的國營機構也無法取得。



(跨國公司才是新國際黑手黨)

四、全球六百家跨國公司中，有四分之三為美國資本家所控制。時代雜誌曾如此評論：「大概除了中央情報局之外，美國沒有一件創舉像跨國公司這樣，引起世人如此深重的猜忌、疑慮與譴責。」

二、牢牢控制自由市場

其中幾個龐大而壟斷國際企業的活動，聯合國深表關切，引以為憂。因此，由開發中國家所發起，針對跨國公司設立常設委員會和研究中心，希望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不久前，聯合國調查十二個開發中國家的外銷市場狀況，專家們發現，這些以生產原料為主的國家，銷售本國產品予跨國公司，每年平均所得為三百億美元，而西方的消費國家則以超過兩仟億美元的代價，購買這些產品，這麼一來，極大部份才開始發展民族經濟的地區，不得不以實際價格的百分之十五銷售其自然資源，因為壟斷買賣原料的中盤商，牢牢控制了整個自由市場的波動價格。

若按人口計算，開發中國家的工業生產量，較西方已開發國家低十六倍，而各地區積欠下來的國債已高達伍仟億美元。



● 跨國公司最新式的設備，控制自由市場

第三世界每年的花費，包括付給跨國公司的貸款利息，計達八百八十億美元。

跨國公司銷售給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品，價格年年提高，結果造成所謂的「價格剪刀」，並不斷削減新興國家的外貿收入。就拿十年前的印度來說，外銷一噸茶葉，可以購入十七噸礦物肥料，如今一噸的茶葉只換得八噸肥料，同一時期的一噸香

蕉，所換得的鋼鐵數量亦跌落兩倍。

為求增加利潤，跨國公司更不惜使出欺騙的手段。不久前一家美國公司賣給奈及利亞一批紡織機器，這批機器狀似新穎，實為四十年前的舊貨，而美國從中獲得暴利，佔去這家美奈聯合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事實上，亞、非、拉丁美洲的醫藥市場，也幾乎全被歐美幾家大藥廠分割殆盡，在當地每年淨得利潤二十億美元，並公然傾銷尚在研究實驗階段的藥品，或者製藥國本身根本禁絕的成藥。不久前，幾家美國藥廠在秘魯推銷五十二種藥品，却建議駐利馬使館的美國人不要服用這些藥物。

三、增加當地就業機會，只是幌子

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投資政策，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一般認為，其投資政策可以增加當地的就業機會，進而加速新興國家的工業化，事實則不然。

不久前巴黎出版的「France Now-elle」週刊，公佈了以下的資料：同一家電子公司，一位裝配工人一小時的工資，根據調查統計是這樣的，馬來西亞和南韓——六十桑蒂姆（法郎的百分之一）；

臺灣跨國企業廠商排名

排名	公 司 名 稱	營收淨額	資本額
1	台灣美國無線電	6,479	1,229
2	橡樹遠東電子	4,538	370
3	台灣飛利浦電子工業	2,780	930
4	台灣有力電子	2,772	118
5	台灣凱普電子	2,484	124
6	美商飛虎航空	2,192	1
7	台灣飛歌	2,181	130
8	台灣飛利浦建元電子	2,150	320
9	台中船井電機	2,124	106
10	台灣飛利浦電視製品	2,012	132
11	台灣船井電機	1,880	87
12	台灣通用器材	1,768	396
13	瑞士商吉時洋行	1,651	5
14	美商勝家縫紉機器	1,498	10
15	白砂電機	1,486	90
16	瑞士海外貿易	1,333	53
17	台北美上美	1,105	172
18	台灣雅開工業	1,049	60
19	台灣矢崎	965	90
20	台灣必治妥	965	132
21	台灣橡樹電子材料	948	95
22	迪吉多電腦	924	9
23	台灣天喜電子	911	47
24	台灣東電化	825	13
25	聯亞實業製衣	782	29
26	香港商孟山都(遠東)	760	2
27	旭台橡膠	665	50
28	歐得工業	637	11
29	台灣車樂美縫衣機	631	109
30	海運貨櫃工業	603	54
31	亞洲航空	572	61
32	台灣電子電腦	559	78
33	四星國際	553	10
34	台灣村田	544	131
35	台灣東光電子	507	83
36	台灣豐達電機	493	77
37	卡林塑膠製品廠	488	136
38	美商惠普遠東	438	3
39	太陽神企業	433	10
40	台灣勝家實業	430	96
41	台灣博士電子	396	44
42	台灣三桂	390	14
43	台灣印刷電路工業	368	102
44	樂園工業	366	35
45	台灣瑪立克	341	37
46	台灣櫻井	327	20
47	樂得電子工業	317	50
48	德化	294	19
49	三甲電子	288	38
50	台灣寶	285	13
51	中國金屬化工	261	88
52	台旭電子工業	259	30
53	嘉福企業	256	11
54	日商丸一貿易	242	7
55	台灣西德電子	231	130
56	台灣旭工藝	216	20
57	田興金屬工業	213	35
58	洲際電子	211	37
59	台灣擎天神	204	75
60	中德貿易	203	10
61	台灣京三	188	13
62	思地電子	174	12
63	希門國際	135	2
64	信誠電子工業	131	60
65	香港商迪高洋行	118	3
66	英商必活國際	117	5
67	相互電子	113	28
68	中日皮革製品	104	4
69	台灣日鏡工業	102	15

台灣——法郎；新加坡——三。七法郎；反觀西班牙、西德和法國則是三十——四十法郎，這是同工不同酬的事實。然而，這些在開發中國家所製造、為數龐大的產品，却依據壟斷商製訂的標準價格在世界市場上銷售，不因成本低廉或工資差距而有任何折扣。

跨國公司在開發中國家的每年投資額頂多八十億美元，回收利潤却超過二百五十億美元，比起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中設廠製造，所得利潤，高出了三、四倍。

根據全印勞工總會的統計，一位在美國企業裡工作的印度工人，所得工資是美國工人的十分之一，當然領美國工人十分之一的工資，總比失業好。問題是，如果換個角度看，跨國公司給一位工人一份工作，却可能剝奪其他十人或百人的工作機會，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舉例來說，外國紡織業在印尼設廠，由於資金雄厚、競爭力強，使得本國企業家瀕臨破產的命運，並造成將近四百萬人失業，其中只有一萬八千人陸續找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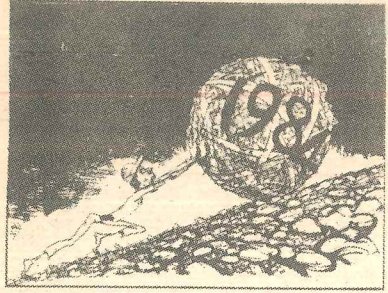
為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跨國公司不在海外設立具有完整工業生產能力的工廠，通常他們會在鄰國設立小型工廠，但一切生產則完全受控於美國、西歐或日本母公司的幾個首腦手中，譬如福特汽車公司曾經設計出一種汽車模型，並將此模型交與各分廠製造，最後才把各廠的製造產品，分銷到亞洲至少十二個國家。

就這樣，跨國公司一步一步控制了新興國家的經濟部門，尤其是製造業，而製造業却又是新興國家的經濟命脈。一九八

○年初，這些壟斷企業控制了各地的工業生產力，例如，佔去迦納百分之五十、奈及利亞百分之七十的生產力。同時，跨國公司還利用各種手段，製造地主國經濟成長的假象，便利侵入各地區設廠的企圖，以拓展自己的企業王國。

四、美國「大象」跨上西歐「小船」

在西歐已開發國家中，跨國公司的活動，已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歐洲幾個小國。這些國際超級資本家們正想插手染指，利用此地發展完備的下屬組織和訓練精良的勞工，掌握西歐國內市場和各種原料。僅僅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間，外國公司在此地的直接投資額就增加了三倍。



△窮國為了「經濟發展」，而以民族主義為代價，對國民的自尊造成長期、重大、慢性的摧折……

大體言之，自一九八一年起，西歐也為資金大量外流美國而擔憂不已，理由是，華盛頓當局採行空前未有的高利率政策。雷根聲稱，採取此一措施，乃因美國目前推動工業生產現代化的資金尚不敷所需。難道美國却不曉得，歐洲也因資金短缺而煩惱不已，為了不使資金繼續外流，歐洲共同經濟地區(EEC)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利率，西德提高至百分之十三，英國百分之十三。五，法國百分之十四。儘管如此，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因為這樣高的利率只有西歐的跨國公司付得起。中、小型公司——自由企業的象徵——事實上已喪失銀行信用貸款，並逐漸縮減生產，結果造成投資能力降低，經濟成長走下坡，失業率增加。倫敦「經濟家」雜誌有一篇文章，論及當今美國與歐洲共同經濟地區之間的關係，文中寫道：「若是一隻大象站在一艘小船上，只要它移動一、兩吋，其他乘客就有落水的危險。」

那些揚言美國資金短缺的人想必忘記了，僅僅依據官方資料統計，至一九八〇年底，美國在海外擁有的直接投資額就高達二千一百三十億美元。不過美國政府當局顯然也無法收回這些資金，因為勢力最大的幾個壟斷企業，已發展成帝國中之帝

國，如何收回？也是一本難唸的經(Do. mestic trouble)。

跨國公司已儼然成為自給自足的世界勢力。他們自訂法律，另有隸屬其下的「政府」和「國營機構」。譬如通用汽車公司機要部門的預算，和法國整個安全部門的預算已不相上下。

五、與其說短視，不如說貪婪

資本主義國家這種跨國企業的政策，也為其人民、社會帶來不幸，其中之一就是失業現象。當西方失業人口不斷上漲之際，跨國公司依舊在海外設立新的生產線，營求更高的利潤。跨國公司的海外企業雇用一千四百萬工人與職員，這個數字，實際上超過了美國、甚至整個歐洲共同經濟國家的失業人口，難怪美國「商業週刊」如是寫道：「我們無法估計由於跨國公司短視而耗費的資金，毫無疑問的，這個數字相當龐大。」如此說來，文中所謂「短視」二字若換成「貪婪」，該不會有人不同意吧！

臺灣與臺灣人

—吳濁流的世界 (中)

戴國輝著
洪鯤譯

鹿港，一個發散著

枯淡而富於中國風情的港市

那是十八年前的往事，但是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所以記憶猶新，也許是因為我們背負的歷史包袱太重了，也許因為鹿港的風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鹿港對我這個客人來說，是一座純粹福佬人的廢港市街，如果說全然沒有一點違和感未免虛偽。但是超越違和感之後，我却深深地愛上這個充滿中國氣氛的港街。

佐藤春夫在他的「殖民地之旅」(收入「霧社」一書)有這樣的描寫：

「鹿港，誠如我所想像的，是一個詩趣盎然的市街。——在內地(日本)古老的港町永遠是有趣的，而這裡却充滿了異國的，尤其是我深愛的國度中國的情調。一種古樸之美、老舊的情懷瀰漫著整個街上。……二層樓的欄干都是亞字欄和綸子紋，窗門也雕成種種花樣，有些人家簷上吊著鳥籠

。木器店、雕刻店到處林立。」

他的話是不錯的。鹿港曾經是中部地區和對岸貿易的要港，雖然在殖民地體制下激烈地受到日本化的侵蝕，却能免於日本俗文化的蹂躪，濃郁地飄散著枯淡的中國情調，所以我深深地愛上鹿港。

聽了令尊敘述「鹿港街與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我們登上了二樓，眺望台灣海峽的晚霞，胸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感動。

鹿港是個不可思議的港街，街上的人說的福佬話和其他地方的福佬話不太一樣，那種鹿港腔強烈地傳入我的耳朵。或許這是因為和對岸往來頻繁，在開拓地不容易消逝的緣故吧。

鹿港腔還沒什麼，最有趣的是，台灣著名的抗日詩人洪棄生和台灣產的大漢奸辜顯榮出身於這個街上。

不只是人的巧合，房屋也呈現了不調和的面貌。在一條充滿中國情調的大街的裏面，竟巍然聳立著辜家豪宅用台灣民衆血汗錢建造的西洋式大宅邸。

這兒曾經有過受到洪棄生感召的詩人所組成的詩會，他們頑強地留著辮子，穿著長衫，無言地反抗日本的統治。因此鹿港街道的表情雖然那樣的靜謐，我却深切地感到文人墨客傳統的氣節深深地脈動著。

兩種不同的台灣舊知識份子

吟風弄月的漢詩人，留著清朝滿族的辮髮，穿著不適於勞動的長衫，雖然有其落後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他們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古老形式，表現出對於異族日本人殖民地統治

的反抗。

事實上，許多老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是通過漢詩唱出抗日的感情，表達他們的心志。

不可忽略的一點，殖民地統治的鐵鍊是由外向台灣人籠緊，老一代的漢詩人的詩會活動越是澎湃地展開。這個事實的背後，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殖民者企圖切斷台灣的傳統，切斷台灣和中國的臍帶的文化抗日的初期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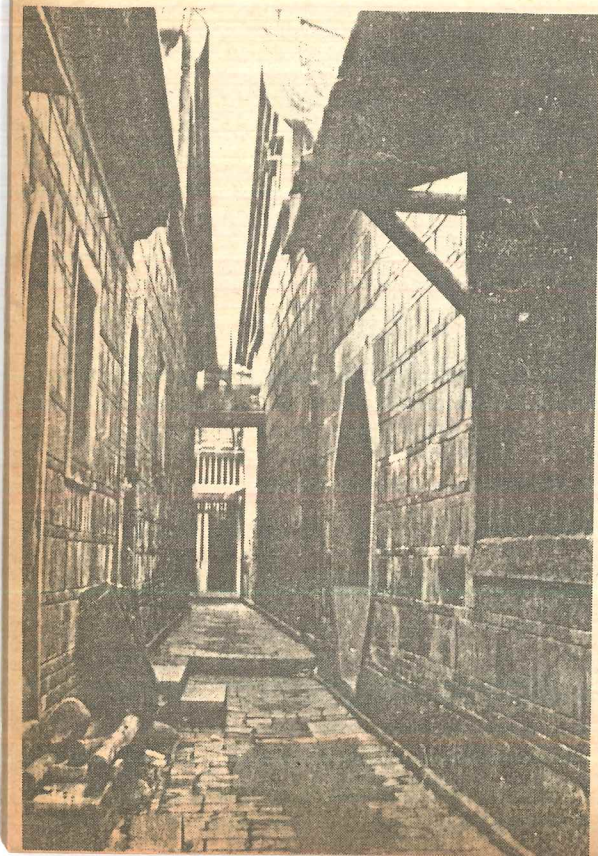
當然，台灣的儒者、漢詩人——他們多半是地方階級出身——並不全是懷著抗日的心情，執著地追求保持台灣文化傳統、心懷祖國而吟詩的。

為了離間分化台灣人的抗日運動，台灣殖民地當局在據台翌年(一八九六)便立即頒佈「紳章法規」，授與台灣人儒者、紳士、名門、閩族以紳章，以為籠絡。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兩人更以官方開辦了「饗老典」(敬老會)、「揚文會」(招集清朝時代獲得生員以上的功名，即舉人等的儒者士紳，使他們和詩寫字的會)。私人方面，兒玉提供有名的別墅「南榮園」邀集台灣人文士及在台日本文士聚會和詩作文，甚至出版了「南榮園詩集」。

窒息的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知識份子

這些吃了甜頭就被安撫的買辦，詠詩歌頌總督府「德政」的史實我們是知道的。

記得一次酒酣耳熱之際，令尊突然問我：「丁君，佐藤的一系列台灣著作，尤其是『殖民地之旅』你讀過了吧？」接著他說



：「裏面有一位佐藤先生稱為A氏的，嚮導佐藤先生參觀鹿港的那個人，其實是我熟識的前輩。……」

現在摘錄「霧社」(一九三六年版)一書中一段有關A氏的記述如後：

「汽車抵達彰化，A氏建議不如利用等待換車的三十分鐘，到此地離車站不遠的公園看看，我一切都順著他。公園是叫做八卦山的小山。(中略)使我難以忘懷的是丘上一處樹蔭下的一座大石碑。這是領台當時我軍(即日軍，譯註)鎮壓匪亂(即台民武裝抗日，譯註)的紀念碑。仰視碑面的A氏就碑文中令人不快的匪徒、賊徒等文字對我大放厥詞，使我無言以對。由內地人(日本人，譯註)的眼光來看或許是賊匪，但由本島人(台灣人，譯註)看來却是愛國者。何況

●鹿港富於中國風情的街巷

他們是有組織、有軍紀的部隊，竟被視為匪賊、劫盜，並且在公園內立碑，實在是為政者的無知。像這樣以激烈的口氣來表示反抗統治者的話，在這次旅行中屢有聽聞，早已如雷貫耳了。這樣的控訴，如果要傾聽的話，恐怕非得聽上幾個鐘頭不可。而且換個立場設身處地的想，又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所以每一次面對這樣的控訴，我都是不自在地避開。這一次也是一樣。但是在前往鹿港的車上，他依然意猶未盡地繼續談論唐景崧、陳季同、劉永福等人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改元永清元年建立「台灣民主國」的建國運動史，說得口沫橫飛。談到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為國徽，終於胎死腹中的建國史，A氏熱血沸騰，不知所止。所幸火車汽笛聲響，鹿港到站。這個流產共和國還沒建國就已亡國，對這些空想的南方之人（指台灣人，譯註）也許是值得悲歌或謳歌的，我認為這誠然是很好的詩的題材。只是他們一面逞口舌之快，一面如A那樣寧願受內地人頭指氣使，企謀一官半職；或者像一般人攀龍附鳳，沽名釣譽，對這種卑屈的態度，我實在不敢苟同。」

我不止是從文學的觀點來讀這一段。我很有興趣知道，這個A氏如果真有其人，到底是怎樣的人物。尤其我一直在想，A氏當時對殖民者之一的佐藤談論台灣民主國及抗日游擊隊史實；抗議八卦山的碑文稱抗日游擊隊為匪徒、匪賊，還煞有介事地在公園之中立碑，並且以激越的口氣表達對日本統治的控訴，對於A氏的這樣行爲，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伯父的話引起我的興趣。伯父好像要回答我的疑念似的說：「佐藤春夫來鹿港時，是個二十九歲的青年詩人。他寫的有關鹿港的手記，在日本人之中，較多比較善意的描寫。他對中華文物有著無限的思慕，對魯迅

謝文達，一個令人悲憫的歷程

去年，爲了知道有關連溫卿、蘇璧輝（均爲台灣國語運動的早期領導者）我訪問了沖繩學者比嘉春潮先生。比嘉先生高齡九十，竟還記得謝文達先生的事，向我問起他的消息，使我嚇了一跳。

如所周知，謝文達嗣後參加了台灣文化協會的議會設置運動，渡海到大陸從事抗日運動。

據前年在香港碰到的前輩W氏說，謝文達先生不只參加抗日運動，並且是國民黨空軍草創期的飛行員。被派往轟炸背叛中央的太原閻錫山部隊，因發生事故受了重傷被閻軍所俘虜。

謝氏因爲是中國少數的飛行員之一，閻氏愛才，放他一馬，其後獲得釋放，回到南京。但是國民黨空軍雖是草創期，早已患了地域主義和美國派的派閥主義，謝氏既是台灣出身，受的是日本教育，又因事故受傷被俘，遂不爲當權派所容。於是謝氏離開南京空軍，在大戰末期，投靠了汪精衛政權，擔任某航空關係機關的要職。這種例子著實不少。

被日本特高跟蹤不絕的謝文達氏，其後竟自毀立場，投效汪精衛，這樣的心路歷程還不只謝氏一人經驗過，實在令人心痛。

痛苦的胎動中迷失和搖擺逡巡的台灣知識份子

● 台灣的儒者、漢詩人多半是地主階級出身



的文學深懷好感，所以在一九三六年的階段他發表了『霧社』，記載了和A氏之間的對話。但如果你認爲A氏的發言只是有勇氣的發言，你就錯了。佐藤先生來訪是一九二〇年初夏到秋天之間的事。當時正值日本『大正民主』開放的時代，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的餘燼未熄，這一陣席捲中國，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胎動的風暴，正波及台灣，台灣青年深受影響。A氏可以說是順著這股熱風發言的吧。直到現在，我的記憶猶新，佐藤來此不久的十月十七日，我們的台灣英雄第一個飛行員謝文達先生在台中堂堂地舉行了鄉土訪問飛行。簡直大快人心。被侮蔑爲『清國奴』，和在殖民地體制的窒息氣氛中，當時即日本人飛行員也只有寥寥數人，謝文達如此活躍，無疑使我們的愁眉大爲開展。」

陪席的前新聞記者楊老伯，似乎是繼續我的思路，接著說：

「謝文達的例子也是一個典型，和我們同輩的，或者我們同輩的當中，有些人頭腦好，脾氣暴躁，爲了反抗日本人的橫暴，鼓動罷工，被處分之後到日本或中國大陸尋找新天地。當然也有人是畢業之後到兩地去留學的。到大陸之後，有不少人在北伐戰爭中殉國。有些到大陸的人，受到前輩的忠告，或者很快的就學會了大陸的政治感覺，隱藏身份，自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在大陸紮根忍耐生活之苦，許多人則是到日本留學，來往於日本台灣之間，受到日本警察的彈壓與壓制，一怒之下，投入大陸革命的漩渦。這些人年輕，受過日本殖民地教育，感染了單純的審美的日本氣質，一廂情願的抱著「大陸即祖國、祖國即溫暖」的簡單公式的期待，滿懷著浪漫主義的思想回歸大陸。

他們在那個被侵略與革命攪亂了的祖國，赤裸裸地目擊祖國處於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到近代、現代的過渡期所發生的一切矛盾與糾葛，無法正確地認識陷於混亂至極的祖國的眞貌。啊，不，應該說，他們在認識之前，已經逡巡於門口，因爲期望過高，失望與挫折也就越深了。」

地主階級台灣知識份子的局限性

「妨礙他們正確認識中國的另一理由是，他們多半和我們一樣，出身於地主階級。日本統治台灣，在精神面確實有差別與鎮壓，在物質面限制台灣資產階級的發展（台灣人禁止設立公司），但是爲了順利榨取農民，台灣寄生地主制被溫

存、重組，我們地主階級的高利率佃租受到總督府權力的保障。在這種恩惠下的所謂「造反」，我想都不過是「秀才造反」而已。T君，你以為如何呢？他們的意識形態只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且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激烈的中國革命過程中搖擺不定是理所當然的。少數人能夠克服這種搖擺，分別投身到當時的延安和重慶。但是投身到後者的大多數人和上述的「克服搖擺」是不相干的，他們只是在中國的政軍界中力爭上游，一聽到光復了，以為時機大好，自命是台灣人的代表，上跳下竄，無所不用其極地追逐權勢富貴。他們早已忘了當年初衷，把革命的熱情，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唯獵官與接收是圖。看到這種情形，實在令人痛心啊。」

楊老伯的這一番話，使我想起游彌堅（已故，日大畢業、湖南大學教授，光復後任台北市長）、黃朝琴（已故，早稻田大學畢業，國府第一個台灣人外交官，光復後任台北市長、台灣省議會議長）、黃國書（淡江中學教員，暨南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光復後任立法院副院長、院長）、翁鈴（龍潭公學校畢業後到廣東、北大、九州帝大、光復後任民政廳長）、連震東（「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之子、慶應大學畢業，與謝南光、李萬居同事於國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光復後任台北縣長、內政部長）、李萬居（北港公學校畢業後到福州、上海，上海國民大學畢業後留學巴黎大學，曾任國際問題研究所（廣東、香港）區辦事處主任。四五年春入重慶，執行台灣革命同盟會業務（從事研究台灣，與日本戰敗後接收台灣的準備），光復後任台灣新生報社長、台灣省議員，二二八之後的四七年創刊公論報，以在野立場批評時政，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之間，與雷震、高玉樹籌組「反對黨」，因雷震下獄，建黨運動失敗，公論報解體，抑

鬱而死）、謝東閔（台中一中、上海東吳大學、中山大學、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執行委員，光復後任高雄縣長、台灣省師範學院長、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台灣省議會議長、曾任台灣省主席）等人物。

台灣知識份子 在歷史的洪流中 翻滾，不同的風格和力量，遭 遇了不同的命運。

這些人在光復後都屬於飛黃騰達的一群。

但是在南京、上海等地因問諜嫌疑被殺的同文書院唯一台灣人教授彭盛木（阿木）、洪棄生之子M、世界語運動者蘇璧輝却走向獄死的非命。

當然，把他們三人處死的權力者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所謂問諜，有依自己的意願，擔任起防衛祖國任務而被毒殺的，也有因一時誤解蒙冤而死者，有忘了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初衷，在革命的漩渦中，因出處進退的錯誤而被殺的，其動機與境遇真是千差萬別。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痛苦掙扎於中日兩國間的戰爭，未見夢寐以求的台灣光復、台灣樂土的出現，就被送上犧牲的祭壇。

楊老伯繼續說：

「不幸中的幸運者是洪詩人的另一個兒子炎秋先生，炎秋先生是當時北京大學少數台灣人學生之一，他雖然沒有張我軍那樣了不起（同時在北京將五四運動的訊息吹入台灣，台灣白話文運動的領導者，七七抗戰以後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

授，以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參加第一次（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起十天），第二次（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起三天）大會，光復後回台灣，歷任台灣省合作金庫研究室主任等職，晚年平淡而終），但以「洪橋」的本名在「南音」雜誌（三二年一月一日創刊的白話文雜誌，嘗試通過白話文做思想與文藝的大眾化。第十二號被查禁之後休刊，第十一號發行於三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文章，由北京明地暗裡把大陸的動向和訊息傳入台灣。

洪先生在中日戰爭中受到國民黨密令，潛留北大農學院，也就是受命當「漢奸」，但是戰後他變得討厭毫無原則的亂抓漢奸，以其台灣同鄉會會長的身份盡力於華北區在留台灣人復員，四六年五月，率領二百餘名台灣青年返台，離開羈旅二十五年的故鄉北京。

返台後擔任台中師範學校校長，開始從事教育事業。不久，二二八事變發生，洪先生險些罹難，於是轉入國語推行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現在台大中文系擔任教授（譯註：洪炎秋先生已病故）。洪家二子差一點都死於非命。

比起炎秋先生來，他的北大唯一台灣人同期生，光復後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文瑞（斐如）就死得太悲慘了。

宋氏在抗戰中到了重慶，在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任該所外國機構「戰時日本」編輯委員會發行的日本問題研究雜誌「戰時日本」總編輯（其他編輯委員尚有謝東閔、謝南光、李萬居、李純青等），在日本問題上發表了許多傑出的研究論文。返台後，被破格任命為教育處副處長，但因為和陳

儀一幫人的台灣施政不相容，辭職辦「人民導報」，批評惡政，二二八事變發生，死於非命。

另一方面，當我們正在向國際連盟強烈抗議台灣總督府的專制與鴉片政策之非時，那個煞有介事地在日本御用新聞堂堂發表什麼「鴉片不但無害，甚至有益」之妙論的連雅堂，其背叛台灣民衆的卑劣行爲，不但沒有人過問，現在竟然被神化成抗日大詩人，著作「台灣通史」的大學者。其子孫還受其陰騭，高居要津……人世間之不平，莫過於此。」

楊老伯說完，眉頭深鎖。慨嘆再三。

你常去的H喫茶店，經營者正是抗日運動孤獨的鬥士張深切。你寄宿的清信病院的經營者，是當年台灣左翼抗日運動領導人，其後墮落和汪精衛政權發生關係的彭華英的夫人彭蔡阿信。你敬愛張先生，對彭氏夫妻也很有興趣，經常強調要把他們的體驗當成教訓。這樣看來，我應該早就了解你不是口頭的反日派，也不是單純的西化派才對，但是遲鈍如我實在無法全部理解你的想法，至今疑惑的地方還是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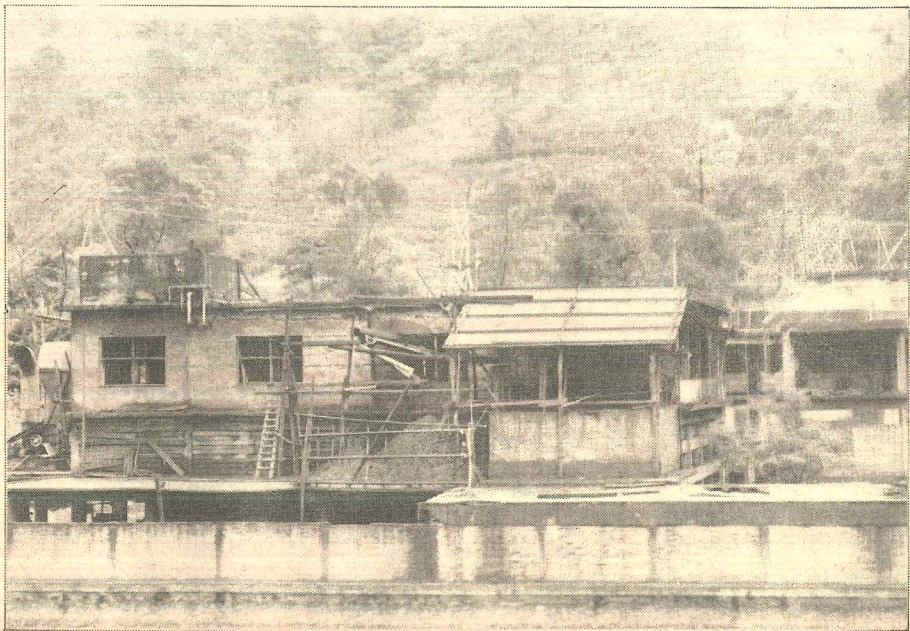


阿義的 礦坑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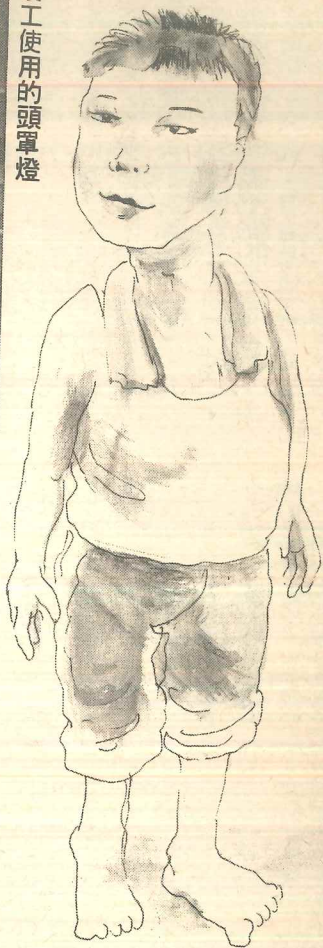
● 土盛

本文作者做過九年的礦坑工作，為了紀念他的難友「土盛」而作（文中稱為阿義）。
土盛多年前罹難，死於一次礦災。作者時時懷念坑內的弟兄，以真實的筆法，描寫那一羣頭戴帽燈，手拿十字鎬的現代黑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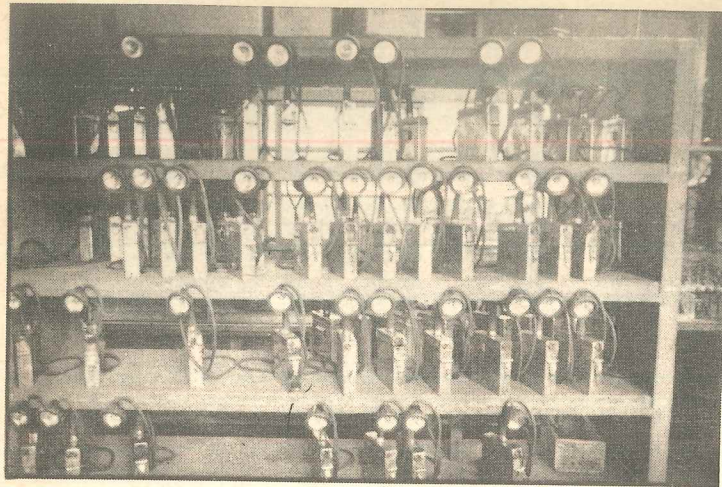
● 台北縣三峽鎮郊區礦場



(58) 夏潮論壇 / 84年5月號



● 礦工使用的頭罩燈



(一) 礦場概況

這個礦場位於三峽鎮（台北縣）北郊兩公里處，緊靠着山腰，和柏油公路相隔一條溪，礦場則自費在溪上建造一座水泥橋，跨溪與公路連接上。

一入礦場大門就先看到約四百坪的長方形儲煤場。大門右側有兩間大的平瓦房，分別是辦公室與工務處。左側是一間磚造的捲揚機（註一）房。機房的牆壁沒有刷上水泥，裸出的磚塊因為長期薰著煤塵的緣故，以致呈現深褐色。

走過儲煤場，坑口就在左手邊不遠處，和捲揚機房遙遠相對，兩者之間有鐵軌連通，並且有一條手腕粗的大鋼繩由捲揚機房的窗口伸出來，順著鐵軌栓接在礦車

上，只要捲揚機捲動鋼繩，礦車就會在坑內上下。此外還有電機房、洗煤場、堆柴場和員工宿舍分散於礦場四週。

每當礦場在工作時，整個礦區都會被三百匹馬力抽風機轉動時發出的又大又深沈的嗡嗡聲所籠罩，天空也會被洗煤場的煤塵遮去一些光采。長期的污染，使得一切物質都敷上一層黑；連礦場外面的溪水也被洗煤場排放的廢水所染烏。

礦場現在的規模，歷經了二十幾年才建立起來。煤炭的開採已經深入地下約八百公尺（指垂直距離而言，斜坑則有二千多公尺），可能再過不了幾年，礦場就會收坑，因為它有自然的敵人——「地熱問題」不能解決。這問題有待先進科學來解決。（每垂直深入地下一百公尺，「岩石溫度」約升高攝氏三度；深入地下八百公尺，「岩石溫度」已高出坑外二十四度。）

台灣的「有用」煤層，平均厚度僅四十幾公分，而且大都是傾斜煤層。因此，煤層的開採就愈來愈深入地下，並通常先開鑿坑道以接近煤層。坑道則像火車隧道，下鋪鐵軌，三壁用木棒支撐。

坑道一般可分斜坑（傾斜的坑道）、平巷（水平的坑道）、中盤（雙線鐵路的

(59) 夏潮論壇 / 84年5月號

大平巷)、小風坑(通風孔)、採煤道(通到煤層的小坑道)。從坑內到坑外都有小鐵路連通(小風坑、採煤道除外)。這種分佈的情況就像人體內的血管;有大血管(斜坑)、小血管(平巷)、微血管(小風坑、煤道),由大到小,管管相接。血管的分布有它的道理與任務,坑道也是同理,無非是要以最實用、最經濟的方法來採掘煤炭。因此,不同的礦坑由於地層狀況的差異,坑道的設置也就大相逕庭。

● 災變的陰影

坑內的工作項目大概可分為:採煤、掘進(開鑿坑道)、支柱維修、鐵路維修、雜務與機電等,工作單純,也不比別種體力勞動業辛苦多少。特出的是:「礦工需暴露於不良空氣、溫度與漆黑的危險環境下,心理負擔很重。」這種認知訓練了他們的直覺,使他們的反應更敏捷。不過,敏捷歸敏捷,大小災變還是不斷發生。那種不斷的「血的事實」造成他們更沉重的心理壓力,使得他們的心逐漸麻木,僅保留了敏捷。因此,當有些礦工「正在工作,而心思卻想著女人時」,一回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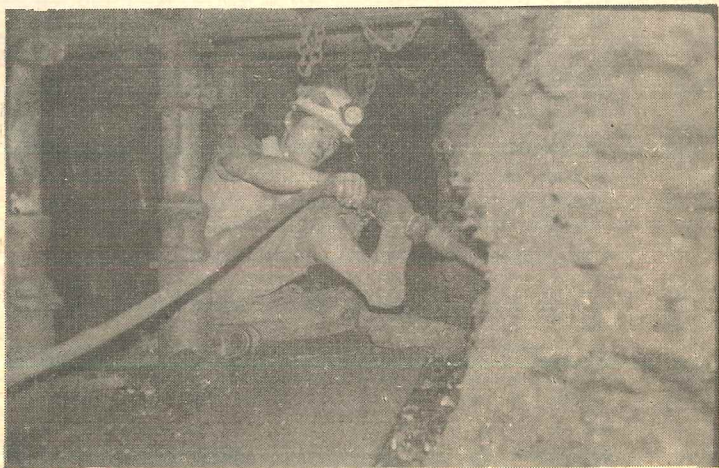
馬上會脫口睡一句:「妾!查某(女人)出出去,沒時間和妳糕糕纏」,來鞭醒自己。(坑內的大氣壓力比坑外高幾個水銀柱,這可能也是礦工心理負擔加重的原因之一。)

這個礦場約在民國五十年六月動工。斜坑連續掘進七百多米,時間過去三年多,花掉了四百多萬經費,卻還找不到煤層,使得合夥的四位老闆幾乎倒閉。他們在借資苦撐下,又繼續挖掘一百多米,還是沒找到主煤層。

就在老闆們急得要上吊時,「支柱維修工」清仔在離坑口七百多米處,因改修支柱而挖掘柱洞時,正巧挖到主煤層,救了他們。那天老板入坑參觀,看到黑亮的煤層後,感動得哭了。他們一定在想:「老天待他真有良心呀!」很自然的,清仔被大家賞了一個綽號叫「黑鯽」,意思是說他真會鑽。不過,黑鯽直到退休前並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獎勵,甚至連退休金都是開會幾次後才勉強發放的。

開始產煤後,一切都順利,不上幾年就給台灣增加了許多位千萬富翁,以至於遲來的那次大災變,並沒有動搖他們的根基。

那次大災變發生於民國五十八年,一



● 礦工手持「風鎬」挖煤層(右面山壁),左邊是「油壓鐵柱」,代替傳統的木柱瞬間就埋葬了二十三條命,粉碎了二十個家庭(三個沒結婚),也給社會平添了一些負擔。

那次災變真正的原因,到現在還沒有查出來,只知道是「瓦斯大爆炸」(註二)。當然,礦方與官方都會用心調查和推

測災變的原因,而知道真相的都拒絕作答,因為他們都死了。

就在災變後不久,礦場來了一位大人——阿炳。他的鄰居阿財說:「這是輪迴,也是報應吧!」他說阿炳本來是這座礦山的地主,賣掉了礦山,即置家庭於不顧,沉淪於聲色場中;直到最後一塊田也煙盡了,喝光了,爲了溫飽終由礦山的地主墜入地下當礦工。

● 滑稽的日本技師

有一次,礦場重金禮聘一位日本高等技師來研究「如何將日本的先進採煤法用在本礦,以提高產煤量,並達到成本更經濟的原則。」

這位技師作了四天的調查和記錄,足跡踏遍礦坑內外。(晚上的休息時間,他被招待去北投兩次,另兩天因吃得太多而鬧肚疼。)

這位高等技師的報告寫成時,用很嚴肅、很專家的派頭和口氣說:「調查研究已有初步的結果;準備將報告帶回日本,會同有關的專家共同來策劃,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交代」。日本人回去後,再

也沒有回音,只給礦工增添了一些話題。

其實,很多礦工都知道「台灣的採煤法是世界獨一的,沒有任何國家會去開採這樣薄的煤層(平均厚度僅四十分公厘)。」這一點是礦工的驕傲與無奈。

那位日本人的來訪不會給本礦帶來任何具體效益;整個煤礦界在以後的年代中,還是有一些進步。這些緩慢的變革,諸如:以「氣壓鉗孔機」替代了「手工」鉗孔,以「氣壓鎬」(註三)代替「十字鎬」(註四)挖煤,女人不需入坑,修改礦場安全法則,訂定違規罰則……,近年來也嘗試在坑內裝設冷氣機。估且不論成果如何,大家都說「有在做」。

註一:礦坑用的運搬機械。

註二:坑內的煤層在碳化過程中會產生瓦斯。而積聚的瓦斯碰上火花會燃燒或爆炸。

註三:氣壓帶動的挖煤小機器,用單手就可挖煤。

註四:形狀像「丁字」的挖煤工具。

(二) 養子阿義

民國五十四年,阿義帶著他的採煤班子來到這個礦場時,已經三十五歲了(他是領班)。他的身高比常人稍矮,但是看起來健壯,同字臉上那對總是眯眯的桃花眼,配上微翹的脣角,讓人感覺永遠在微笑着;雖然說不上英俊,卻很得人緣。

他在十七歲那年就入坑當礦工;那時的煤礦業設備落伍,沿襲日本人制定的「礦場安全法規」罰則太輕,形同虛設,這使得總數三萬多位礦工,年年死於礦場災變者就有一、兩百人,而傷者更是無數。可是「產煤地區(註一)」的別種行業就業機會少、薪資低,因此每年仍有許多新血進入薪水較高、又不挑剔的煤礦界。礦場不挑剔工人的結果造成龍蛇混雜於坑內,以致弱肉強食的事件不斷發生,使得一般人對煤礦界的印象不好。不過,話說回來,礦場也實在難以挑選工人,因為大多數的礦場都在山中,交通極爲不便,而人手又時常短缺,礦場沒有好的條件來精選工人;甚至爲了需求更多勞力而施展挖角的手段。較常見的方法則是設置推介獎金鼓勵拉人入坑,也有較沒良心的老闆設計「賭局」來留住工人。當然,經過設計的賭局一定有詐。

● 脫得只剩內衣褲

這時候的台灣社會還停留在傳統的小農社會裡，一般人的觀念比較保守，在鄉下如果有男女胆敢在路上公然的牽手而行，很可能就會被「衛道」的鄉民指指點點。可是坑內的情形就不同於保守的礦場外社會了，也就是說：「坑內很開放」。因為坑內有許多工作場所的溫度很高，而且空氣污濁，使得勞動者的衣著不得不簡單些來適應環境。簡單到什麼程度呢？「在頭上帽子的光束照射下，脫得只剩內衣褲猶如沙灘上穿著『比基尼』泳衣的女郎處處可見；男人上身赤膊僅穿短褲，偶而在「掘進面（註二）」一絲不掛也不以為怪。（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只是坑內已經沒有女人了）」唉！爲了工作時能少流些汗水，只好「含羞的」過著違反世俗的生活。「含羞的」通常是指新下坑的男女礦工，至於老道的礦工應該不會有這種感覺了。

礦工的衣著竟是這樣隨便，男女的關係也就難以正經了，對不起，這句話的意思是：「要維持正常的男女關係很不容易，不過大多數的礦工還是很正經」。

亂搞的男女關係並不設限在坑內，而是很自然的發展到坑外，使得礦區充滿了「男與女」的故事。以至於許多年後，當阿義也併上一位名叫阿月的寡婦被他老婆知道時，也只說了一句：「這種事等久了終於輪到我頭上。」此外，日子變化並不大。

阿義自身嚐到第一次災變滋味時，已經是入坑一年後了。他由推礦車、拉「拖籠」（註三）、掘進工（只做了兩個月）、採煤助手、到升爲採煤工，共費去了一年。據他所說，那次的遭遇是這樣的——

剛當上採煤工不久的阿義，技術比不上老手。先前學習那段期間，工作都有領班在指導和幫助完成，這兩個月來才不需領班的輔助，能單獨完成工作。一般來說，在坑內肯當採煤工的，都是較有勇氣與頭腦的，工作時間也較助手（推車工）短一個多小時。由於阿義是初出師，工作難免做得比較慢。這天也是所有同事都離開了（平巷裡還留有幾位助手），只留下阿義在完成自己被分配的部分。

● 災變果真來了

煤已採好，剩下的工作是用木棒支撐煤採後留下的空隙。當阿義正聚精會神鋸割木柴時，四週忽然響起岩石擠壓支柱的嘩嘩波聲。阿義惶然的抬頭左瞧右看，卻看不出有何異常，僅是有一股無形的壓迫感；他並不在意，又繼續埋首工作。誰知過沒兩分鐘，不遠處又傳來一陣砰砰澎澎聲，大串岩石崩落下來，揚起的粉塵瀾漫在阿義的四週。他感覺週遭的景物漸漸迫向自己，聲響也愈來愈大。岩石崩落近在咫尺，以致讓他分不清東西南北。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阿義腦海突現一絲靈光，慌忙拿起身旁的木棒，胡亂堆成四方形的柴架。就在柴架要完成的刹那，「轟嘍——」一聲大響，阿義頓感地動天搖，氣悶難受，一顆心直衝到喉頭，不由自主地抱頭縮成一團直打哆嗦，背脊更是涼了一大半。

崩落、折斷和擠壓聲持續一陣子後，終歸平靜。

眼淚簌簌而流、極度恐懼中的阿義緩過氣後，抬起頭來打量眼前景況。只見前後堆滿大小岩塊，通路已被阻斷；所幸有柴架支持落磐，留有容身之地，否則阿義已被活埋。

陷入狹窄、通風不良、有如墓穴的險



● 礦工是現代工業下的黑靈魂

境中的阿義舉起手關掉帽燈，頓時身心被黑暗和絕望所籠罩。阿義默默傾聽著內心的低泣，想到自己對煤礦工作原來就缺少衝勁，他不得已淪入煤礦界，全是因爲身遭家變。「我的前途爲何這樣暗淡？」阿義回想起童年的種種，想起母親的眼淚，想起……阿義終於止不住地放聲大哭。

邊回憶邊哭泣的阿義，力竭之後，朦朧地進入夢鄉：他夢見四週充滿綠油稻田的家，夢見運煤卡車在馬路上不停地前進，響著因超載而怒吼的引擎聲。夢見了自己的童年——

● 阿義是一個養子

阿義是在他養父結婚了十年而尚未生育的情況下，被領養的。誰知領養了他以後，養父母卻接連生了一兒一女，這樣，阿義從不曾受到養父賜仔的重視。

日子在賜仔滿足、平安下流過。風景如畫的家門前，遠處是蒼翠的青山，近處則是九轉十八彎、激湍流過綠色平原的大霸溪。在不知親生父母是誰的阿義，確實渡過了一段寧靜無憂的童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對鄉下的孩童而言並無多大

影響，下課後常利用放牛的閒暇，在冰涼的河水中捉蝦、釣蛙，偶而也和飛機捉捉迷藏，這種生活直到小學畢業。要不是有一次阿義無知、自滿的誇口，引起壯碩黝黑的養父的反感，聰明會讀書的阿義，還會背起大書包就讀高小（初中）呢。

阿義的弟弟土仔，或許是母親頭胎懷孕太晚的緣故吧，頭腦竟有些遲鈍，常被同學譏笑。偏偏會讀書、頑皮的阿義常對土仔吹噓：「將來要做個先生（醫生），成爲體面的人」。受了委屈的弟弟每次都被氣得淌著淚水向母親抱怨：「父母不公平，生給哥哥當醫生的頭腦，自己只配放牛做苦工。」

賜仔有一次做完田裡工作回家途中，

碰巧聽到阿義的大願望與誇詞，心裡黯然而，雖然供得起學費，也藉口「戰禍連綿，弟妹需要照顧」，不願阿義再讀書。

光復前後的台灣由於軍事與工業急需能源，便全面開採煤礦。擁有一甲田地的賜仔，爲了避免日本的徵役，也隨著開採潮流進入煤礦界；稻田裡的農事，只在工作之餘兼顧着。好問、肯學、喜交朋友的賜仔經由基礎磨練，進而成爲技術嫺熟的掘進師父；工作雖然辛苦些，總算能免除妻離子散的危機，因此，在戰禍中可說是較爲安定的家庭。不久，台灣光復。而賜仔那位遲鈍不馴的兒子，光復後不久即被大霸溪的湍流奪去了生命。

失去愛子後，賜仔消沉了，很少喝酒的他在不覺中逐漸沈迷於酒瓶中，更甚的是他也染上了賭習。他的積蓄用光了，土地也變賣了，再加上長期來過度的沈耽，耗去他不少精神，終於在一次失神下，喪生於「煤礦突出災變」（註四）……

不知過了多久，受困的阿義忽然被一陣吵擾聲吵醒。他趕緊轉亮帽燈，並出聲拼命喊叫着，這一喊叫，使他啞澀的喉頭有些痛。

「這一刻，覺得世界比往日都可愛。阿義獲救後，說出他當時的心情。」



●礦工死亡率最高

根據省礦務局統計，台灣省煤礦業最盛時，礦工人數高達六萬人，目前只有二萬餘人，平均每年約有二千人離職。

除工作辛苦，待遇不高原因外，煤礦工人遭受災變的可能性，也使年輕人不願從事礦場工作，造成礦工平均年齡高達四十七歲左右，後繼無人。

和其他各國的煤礦工人因工死亡率相比，台灣地區仍然是偏高的，高於日、印、美、加、英、法各國。（見附表）。

年別	台灣			日本	印度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發生數	死亡數	死亡率%						
民59年	87	122	3.11	2.04	0.54	2.35	1.81	0.43	0.76
60	75	128	3.16	1.08	0.60	1.66	1.70	0.34	0.70
61	62	97	3.80	2.09	0.53	1.37	1.69	0.36	0.41
62	52	61	3.56	1.42	0.50	1.10	2.26	0.43	0.64
63	46	53	2.66	1.73	0.46	1.03	2.75	0.30	1.31
64	46	75	2.76	1.85	0.26	0.98	1.00	0.35	0.34
65	52	55	2.60	0.81	0.58	0.86	2.26	0.29	0.84
66	47	57	2.41	1.73	-	0.82	1.22	0.25	0.28
67	39	51	2.54	0.77	-	0.65	1.43	0.38	0.36
68	45	52	1.92						
69	41	87	3.35						

●安全檢查，虛應故事

這些煤礦勞工因工死亡的原因，根據省礦務局資料顯示，有落盤（百分之二十九點八二）、瓦斯突出（百分之十七點五四）、搬運與埋沒（均佔百分之十二點二八）、瓦斯爆炸（百分之十點五二）、水災（百分之五點五二）、瓦斯中毒（百分之三點五）、炸藥（百分之一點七五）、以及其他（百分之七點零一）。

這些死亡原因，除了搬運之外，幾乎都和礦場的安全措施有關，換句話說，只要加上人為的努力，這些災變大部份都可避免，而非不可抗拒的。

由此可看出大部份礦場安全措施的不足，工礦安全檢查的不夠徹底。

煤礦安全檢查，每年初查一次，複查十二次；凡檢查發現有不合格事項存在的礦場，應一再進行複檢。然而「勞工檢查及安全衛生年報」顯示，以六十八年為例，煤礦安全檢查不合格事項，高達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一項次，其中又以通風保安的不及格率最高。

台大社會系教授張曉春會就勞工職業

開採。

——在送交礦務局的年度施工計劃中，隱瞞開採事實。

——開採煤礦一年多，仍未繪製符合規定的礦場安全圖。

——缺乏對外通訊設備、救護器材，致無法向外求援，使搶救工作時間拖延。

——安全管理人員請病假，未依法報備、或報而不全。

調查報告並指出，永安煤礦的這些做法，已嚴重違反礦業安全法及礦業法，而礦務局竟然未予糾正、制止、監督，僅是去函要求改善，做表面文章而已。

事實上，這份調查報告所提的違法事件，不僅只永安煤礦，許多其他煤礦也有一樣的情形，尤其在能源危機過後，煤價一直不高，煤礦業主在無利可圖情形下，就更不願意在安全設備上做更多的投資了。

而礦場業主若違背了有關安全事項，根據礦場法規定，可處銀元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金，折算台幣為三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這樣的處罰對業主而言簡直微不足道，尤其和投資改善安全設備相比，業主當然甘冒被處罰金之「險」，況且礦務單位對煤礦業者也總以勸導方式居

●為何不放棄開採？

台灣發展煤業的先天條件，比起其他產煤國家要差很多，以歐美或日本的標準來衡量，台灣的煤礦都可以廢棄，不值得繼續開採。

但為什麼政府還要核准繼續開採呢？永安煤礦災變後，當時的礦務局長邱岳曾經這樣回答：

「因為目前面臨能源危機，如果全部依賴由國外輸入，需要考慮到供應國家是否會中斷，另外海上運輸、碼頭卸貨及內陸運輸可能也有問題，所以只要坑道的保安檢查合乎標準，站在礦務局立場，還是同意礦主繼續開採。」

換句話說，煤礦業的發展是不能單純從經濟的角度看，由利潤高低來決定其生存與否，它還有政策上的因素。

但在礦務單位既不積極輔導改善，也不消極禁止採礦的情況下，台灣煤礦業的前景並不樂觀，煤礦工人行業的式微是可預見的，只希望式微的方式是最人道的——不要再有任何災變。

多。

災害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其中問及煤礦工人對工作災害的預防措施時，沒有人認為「很完備」，認為「完備」的有百分之二十六點五，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認為「不完備」，百分之六十二點四的人認為礦區對災害的預防措施「很不完備」。

由以上各類統計資料可獲得這樣的結論：台灣區煤礦業的安全設備並不完善，而歷年來的煤礦災變和這些人為的安全措施是高度相關的。

可以看看近年來最大的煤礦災變——永安煤礦的例子。

六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台北縣永安煤礦因坑道出水發生災變，三十四名礦工身陷坑道，是民國六十年基隆七星煤礦以後，最大的礦坑災變，當時七星煤礦造成四十三人死亡。

●處處違法，導致災變

永安煤礦災變後一個月，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這份由監察委員吳大宇和熊在渭所提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永安煤礦有數點違法：

——在安全開採計劃未核定前，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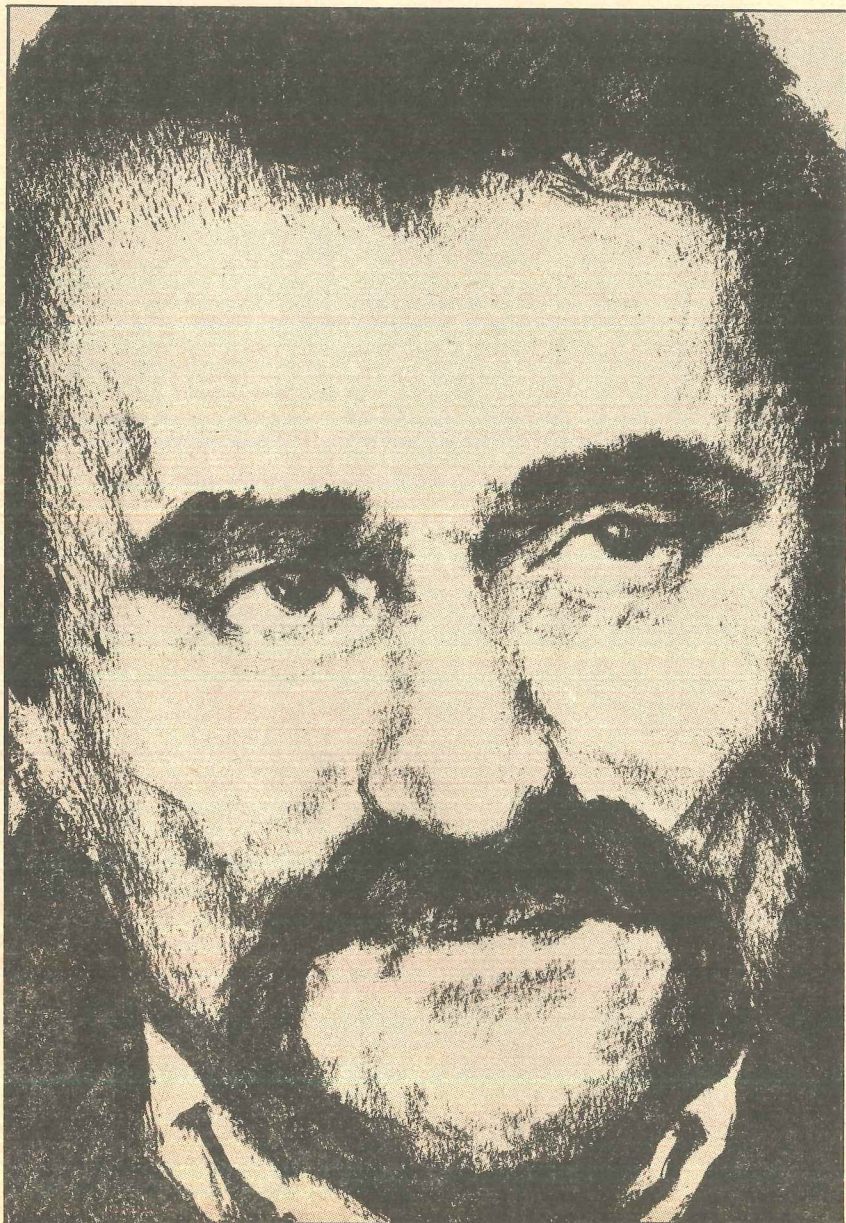
工人與世界和平的希望

林波海譯

華勒沙
演講詞

工人廣場

吳耀忠／畫（華勒沙）



華勒沙以一個工人的眼光，來看世界，呼籲工人起來談判。並詳述波蘭格丹斯克船塢工人，如何抗暴，走過艱辛險惡的歷程。這是一篇感人、富於啓發、令人深思的工人獻詞。也告訴我們，人由於勞動，變成了工場的真正主人，也終究會變成辛勞成果，及其分配的真正主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此時此地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身份向各位發表演說的，是波蘭格丹斯克船塢的一個工人，是波蘭獨立工聯的締造者之一。

要我說我沒有資格獲得這份殊榮，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但是，當得獎的消息傳遍我的國家，當我的同胞因感到共享這份榮譽而歡欣鼓舞時，我覺得我必須把這份殊榮視為對團結工聯運動的一種肯定，肯定它對團體的貢獻——而我則會全力投入此項運動。

我以對和平獎至深的敬意接受這項殊榮，同時，我明白，此獎並非頒予我個人，而是頒予團結工聯，頒予我們以和平與正義精神為之奮鬥的人民與理念。我最大的願望則莫過於因此獎的頒予能夠有助於波蘭的和平與正義，全世界的和平與正義。

今日我第一句向各位所說的，並希望透過各位向全世界所說的，乃是我自幼以來所熟知的一句話：願一切友善的人終能獲得和平——不論是東方西方，還是南方北方。

●廢墟與灰燼

我的青年時期是在我國從戰爭的廢墟與灰燼中重建的過程中渡過，在這場戰爭中，我的國家從未向敵人低頭，在奮鬥中付出了最高的代價。

我屬於工人的一代，這一代，生於波蘭農村的小屋中，得有機會接受教育，得有機會受雇於工商業，並在這過程中意識到他們的權利與在社會中的重要性。這是

工人與農人的希望漸次覺醒的時代，但也同樣是錯誤、貶抑與幻滅層出不窮的時代。

一九五六年六月，當波茲南的工人為爭取麵包與自由而遭受血腥鎮壓的時候，我只有十三歲，而在那次鬥爭中被殺的男孩羅麥克·斯特札可夫斯基也僅是十三歲。

二十五年以後，團結工聯要求紀念的也就是他。——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工人示威遊行湧入波羅的海海岸諸城，那時，我是格丹斯克船塢場的工人，也是罷工組織者之一。工人同志的喪生，我們所遭受的暴力與絕望情境，乃是我永不能忘的一課。

●工人的權利與尊嚴

幾年以後，一九七六年六月，渥撒斯與拉丹的工人罷工，更堅定了我的信念：工人的要求與希望是正常的，而他們的團結則更為急需。這一信念使我在一九七八年夏季加入了自由工聯——一個由勇敢而又獻身的人所結成的單位，旨在保護工人的權利與尊嚴。

一九八〇年八月，罷工的浪濤掃遍波蘭。當時的宗旨已經不止於物質條件的改革。我的生活之路，在那段鬪爭的時期，又把我帶回格丹斯克船塢。全國均與格丹斯克和塞茲辛的工人聯合。最後，格丹斯克·塞茲辛與雅斯特吉比協議終於簽署，而團結工聯於焉誕生。

我剛才所提到的波蘭大罷工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它們的性質一方面受制於周遭威逼的環境，另一方面則受制於其目標。參與這次罷工的波蘭工人，實際代表了他們的國家。

● 由經驗所得的教訓

當我回顧我一生的經歷，我不得不提及暴力、恨惡與謊言。但從這些經歷中我

們所得到的教訓，却是只有在我們自己不訴諸暴力的時候，我們才能有效的反對它。

在這多事之秋的幾年，格丹斯克協議像大憲章一樣的屹立，代表著那永不可能被任何力量摧毀的工人們的權利。

一九八〇年的協議是以工人的勇氣、責任感與團結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那時的雙方都已認清，如要阻止流血事件的發生，就必須達成和解。因之那時簽訂的協議，在當時是唯一的可以遵循的模式，於未來亦然，是唯一可在暴力的應用與無助的鬪爭之間產生中道機會的模式。

我們深信我們的主張是正當的，深信必能找到一條和平的途徑，以通往我們的目标——這種信心給了我們力量，同時使我們覺察到，某些界限是我們必不可越過的。在那時看來似乎不可能的，於今已成爲生活中的事實。我們取得了組織工聯的權利，不受政府控制，這個工聯是由工人自己建立與塑造的。

● 重大時機

我們的工聯——團結工聯——業已成



● 我們賴以活下去的信念乃是相信法律就是法律，正義就是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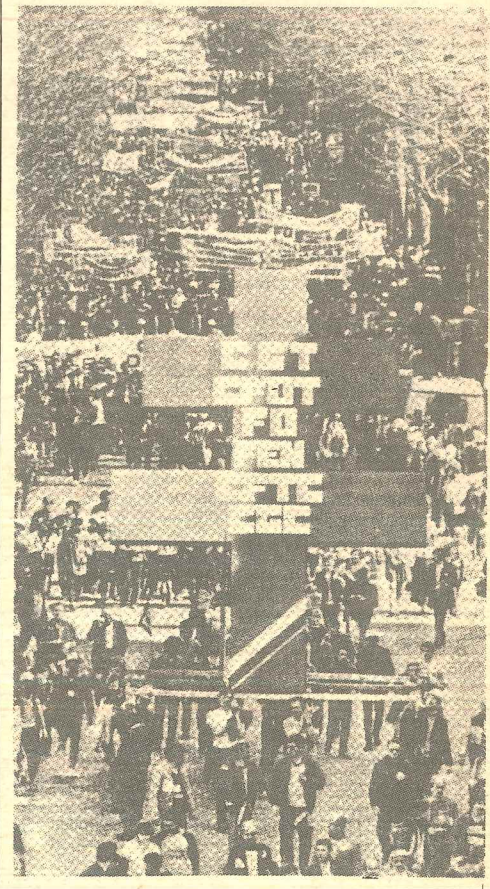
(69) 夏潮論壇 / 84年5月號



● 我們的勞苦具有意義而非徒勞

(68) 夏潮論壇 / 84年5月號

●今年四月十三日，法國鋼鐵工人抗議政府縮減工作



幕把它掩蓋吧。而沉默，畢竟也是會說話的。

●波蘭沒有屈服

然而，有一件事必須在這個莊嚴的會場上說明，那就是，波蘭人並沒有屈服，他們也沒有選擇暴力和屠殺同胞的途徑。

我們永不向暴力屈服。我們工聯的自由不可被剝除。我們永不同意爲了人的信念而將他們送入監獄。監獄之門必須打開，而那爲團結與民權而奮鬥的人必須釋放。

我們已被宣布受審的十一名運動首領絕不可受審。凡是因工聯活動或因信念而已判刑或正待審判的人都必須讓他們回家，同時要允許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與工作。

保衛我們的權利與尊嚴，同時又努力不被恨意所掩沒——這乃是我們選擇的道路。

波蘭人的經驗因諾貝爾和平獎而成爲舉世注目的焦點了，而這個經驗是艱困的、激動人心的。然而我相信它是向未來展望的。那在人類的心中所發生的事，那

殺或受傷的。

我們的運動大步前進，大幅度擴充。爲爭取權利與行動的自由，我們持續不斷的奮鬥，但同時，我們也給自己加上自我限制——這種限制是必不可免的。

我們的運動之計劃是發源於基本的道德律與秩序。我們的力量之唯一的、基本的來源是團結：工人、農人與知識份子的團結，舉國人民的團結，那希望在尊嚴中、在真理中、在與自己的良心相合中生活的人共同的團結。

至於其後發生的事，暫且讓沉默的布

長爲社會解放與精神解放的強大有力的運動。從恐懼與冷漠中掙脫出來的人民，現在呼求著改革。爲了我們的生存，我們會做過艱苦的鬭爭。這是我們國家的重大時機。我認爲這個時機也同樣標示了行政當局所要採取的道路——設若政府當局期望在治理這個國家時，得到所有國民的合作與參與。

團結工聯，是一個工商聯合運動，它並不求取政權，也不打算反對已經建立的政體。在過去十五個月，團結工聯的合法存在時期，沒有一個人是因它的活動而被

將人類的態度重新塑造的事，是不可能湮滅或毀壞的。它們會一直存在下去。

我們承續了祖國歷代的期望，由於這期望，我國人才永不可能變成沒有其自己之意志的惰民。我們賴以活下去的信念乃是相信法律就是法律，正義就是正義，我們的勞苦具有意義而非徒勞，我們的文化會使自由精神得到培育，使其成長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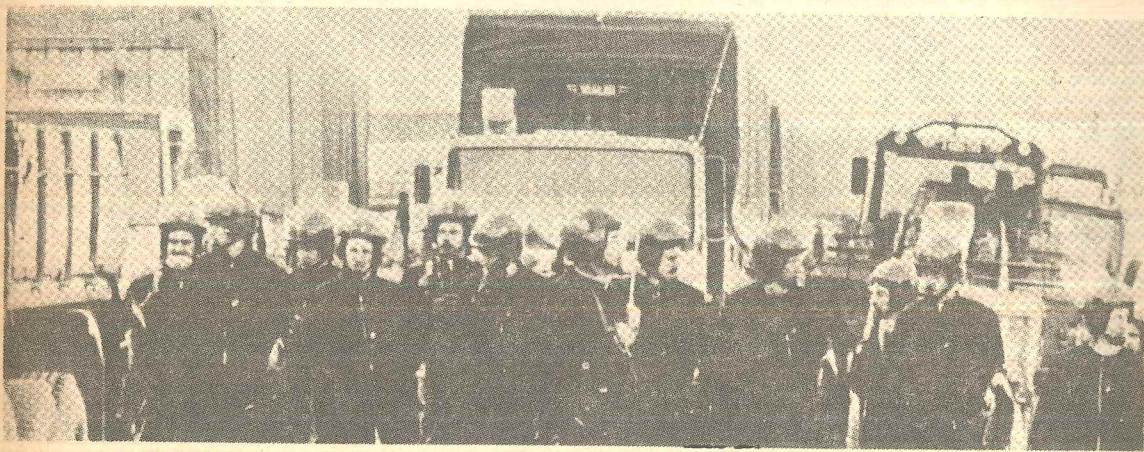
由於我們是一個民族，我們有權決定我們自己的事務，鑄造我們自己的未來。這對任何人都不能構成威脅。我們的民族充份察覺到在現代世界複雜的環境下其對本身命運所負的責任。

不論過去兩年在我國發生的事情是如何，我仍舊深信我們除了達成協議之外別無選擇，深信波蘭當今所面臨的難題只有透過政府當局與人民的真正對談始能解決。

●辛勞的成果

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在他上次返回祖國訪問時，針對這一點曾說過這樣的話：

「波蘭工人——以此而言，世界各處的工人也是一樣——爲什麼有權做這樣的



●那曾經呼吸過自由之空氣的工人，不會被壓碎。上圖是歐洲卡車司機罷工，警察加以干涉

對談？因爲工人並不僅是生產的工具，而是主體；這主體，透過生產過程，其重要性與地位便超越了資本。人，由於勞動，變成了工廠的真正主人，勞動過程的真正主人，其辛勞之成果及其分配的真正主人。如果他感覺到自己是真正的伙伴，在共同的努力所產生的產品之分配上有發言權，則他就願意爲之犧牲。」

然而，這種感覺正是我們所缺乏的。設若人心普遍的感覺是挫折，辛酸與無望，則什麼東西都幾乎難以建立起來。

那曾經察覺過團結工聯之力量，那曾經呼吸過自由之空氣的人，便不會被壓碎。對話是有可能的，而我們有權參與。因歷史事件而轟起的牆，必不可成爲不可超越的障礙。我最熱切的渴望莫過於我的國家能夠掌握住和平前進的歷史時機，而波蘭得以向全世界證明，即使是最複雜的情勢，也能藉由對談來解決，而非藉用暴力。

我們已經準備對談。我們也已準備在任何時刻將我們的理由與要求公之於人民的判斷。至於所得的裁決如何，我們毫無懷疑。

我相信全世界一切民族都有生活尊嚴之權。我相信個人、家庭與夫社團的權利



(卡列斯特)

海外短波

巴西的 左派和右派

周正宏

遲早要在世界一切角落得受尊重。
尊重波蘭的公民權與人權，尊重我們民族的人格，乃是於全歐洲最佳的利益之一，因為和平的波蘭有益於全歐；而波蘭追求自由的意願是永不可窒息的。對談，乃是波蘭達成內在和平的唯一途徑，而正因如此，它也是全歐和平不可或缺的元素。

我認識到，波蘭人民的努力奮鬥增益了全世界人民的了解與團結感。允許我在此處向全世界一切幫助過波蘭與波蘭的人士表達我最深摯的謝意。同時我也藉此時機表達我的懇切願望：願波蘭追求對談、追求人權的希望得以藉著積極的思想而加強。

大屠殺的威脅

我的國家正處於經濟危機中。這對波蘭人的許多家庭的生存造成了劇烈的後果。設若波蘭的經濟危機長期蔓延，將可能亦對歐洲造成嚴重影響。為此，波蘭應當得到幫助，也值得得到幫助。

我是以一個工人的眼光來看現在這個世界——這個工人屬于一個遭受戰爭悲慘

考驗的國家。我至誠的希望，我們生活於其間的這個世界能夠擺脫核子大屠殺的威脅，擺脫毀滅性的軍備競賽。我深深的希望和平不要同自由分家，而自由乃是一切民族的權利。這是我的切望，我為此祈禱。

我願在此重覆表達，波蘭目前的根本需要是了解與對談。我相信全世界皆是如此；我們將繼續談判；我們必不可關門或做出任何足以阻礙互相了解之路的事。而我們必須記得，唯有建立於正義與道德秩序上的和平才能持久。

世界上的許多地區都在冀圖找尋一個解決辦法，將兩種基本價值結合在一起，即是和平與正義。這兩者不啻是人類的麵包與鹽。一切民族，一切團體，都具有這兩種不可剝奪的權利。若非竭盡一切辦法追隨這一途徑，則任何困難都不可能期待解決。這種願望是普世遍存的，我們這個時代要求我們對這些願望的注視與承認。

團結的精神

我們的努力與艱苦的經歷向全世界展現出一個事實：團結的價值。在接受此一

在巴西，或任何拉丁美洲地區，路易斯·卡羅士·卜列斯特（Luís Carlos Prestes）這個名字，已經等於是共產主義的同義詞。由於背棄莫斯科而受報復，以及服膺馬克斯主義，表現出旺盛的鬥志，使他身受困圍、屈辱，和放逐的命運。

卜列斯特現年八十六歲，一九七九年經由軍政府特赦裁決，回到巴西。他曾經領導巴西共產黨達四十年之久，後來為了過份左傾，而遭放逐。

「許多人以為我是瘋子！」他作了這個戲謔的回答，似乎渾然忘記了他曾經為思想信仰而遭孤立。「大部份的人在某個確定年齡，才會找到自己的生活調子。他們年青時，激進而富於革命熱情；結婚之後，又必須照顧家庭和安定問題。現在我八十六歲了，却從來不會有過好的生活調子。」

他的理想主義，被左派或右派的評論認為「天真、犬儒、古板、或純粹是史大林主義者，但這個信仰，一直依存在他心中，一直執行到底。最重要的是，他仍然保存，深信巴西正朝著共產主義的理想，向前邁進。

「我仍舊期待有生之年，有一些事終

殊榮之際，我思念到與我在團結的精神中互相聯繫的人士：

首先，是那些在我國為工人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奮鬥中付出最高代價的人——付出了他們的性命。

我思念到我那些為保衛團結工聯而犧牲了自由的友人，他們業已判刑，或正在等候審判。

我思念到我的國人——他們將團結工聯的運動視為他們身為工人、身為公民的權利之實現，他們常遭屈辱，準備犧牲，他們習得將勇氣與智慧相連，並忠誠的堅持我們所發起的主張。

我思念到全世界為工人與工聯權利而奮鬥的人，為工人的尊嚴、為人權而奮鬥的人。

格丹斯克船塢入口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死難同胞所立的紀念碑上鐫刻著詩篇的話：「主將能力給予他的人民；主將給他的人民以和平的至福。」

願以這些話做為我們友善與希望的訊息。

——發表於諾貝爾和平獎慶祝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由流放的團結工聯領袖波格丹·塞文斯基於奧斯陸公佈，由挪威外交部從波蘭文譯出。

「我的預言是：偉大的鬥爭等待著巴西！透過工人的罷工和奮鬥！有些事會到來的。從而產生新的偉大領袖，一名真正的人民領導者。」
但這個史實尚未來臨。巴西目前面臨著，過去未有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這種情況，卜列斯特將它歸咎於右翼投機份子的作祟。

「這些人，統統向獨裁政府投降了！」他說，「他們奢望國家主義和民主政府，但我回答說，至少一名共產黨員可以為人民而奮鬥，但絕不與獨裁妥協。他們應該起來，站起來組織群眾。」

內部分裂對巴西左翼而言，並不新鮮。一九五〇年代，巴西人因為莫斯科的斷然拒絕，騷動不安了一陣子。一九六〇年代，許多巴西人因為起來反抗，遭受軍政府嚴酷的整肅。現在，儘管共黨的旗幟再度出現，公開示威，在貧窮的人民當中，仍然不能振奮人心。

卜列斯特開始他的革命生涯，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卜列斯特生於里約格蘭德的南部，並接受軍事工程教育。一九二二年，他參加著名的「中尉事件」，加入革命。兩年之後，他參加另一次

韓國教會 和獨裁政府

楊布仁

的起義，帶領著一小隊騎兵和步兵打仗，立即獲得「卜列斯特縱隊」之盛名，並以「希望之武士」的小名，在巴西盛行一時。

隨後的幾年，由於政權易幟，只好到處躲藏，也陸續被政府捉放了幾次。一九六四年，由於推翻鳩俄·古拉特（João Goulart）政府，使他重獲地位。一九

七一年，由於和軍政府決裂，透過黨中央的指示，潛往莫斯科。

「官方的理性，就是我的安全」他說，「但它的確是一項暴力的驅逐。自從一九七九年，我再度回到巴西以來，為了防止新名目的迫害，我已經不再參加任何集會了。」（譯自紐約時報）

被稱為儒教國家的韓國，這兩、三年來，基督教信徒有急遽增加的趨勢。漢城市內，雖然新建的教會相繼落成，但還是難於趕上新增信徒的需要，據聞：有不少的會派租大廈房間充做臨時教會。郊外的大建築物往往是教堂，目前韓國的基督教信徒約有一千萬人，即是說，四個韓國人民之中（包括嬰兒），就有一個基督教徒。大體上，五〇至六〇年代之間，基督徒每年平均增加十萬人，七〇年代則每年平均增加二十萬人左右。

韓國天主教教會史研究所長崔秉佑牧師認為最大的原因是，人民害怕戰爭，據他說，韓國的基督教成長情形可分為三個階段，即①韓戰結束後，②七〇年代中期，③八〇年代初期。

第一期，造成民族分離的韓戰，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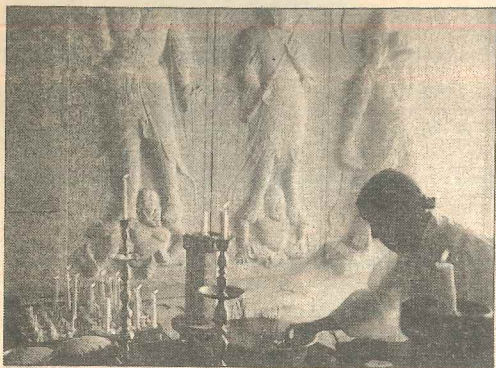
了無法彌補的創傷，如現在還繼續舉辦的尋找失散家屬節目，可證明因戰爭而受的傷痕，直至三十年後的現在還未痊癒。因戰火肆虐而家破人亡，骨肉離散的人，在飢餓與驚懼的逃難中，祇有靠信仰自救。

美國對於天主教戰後復興事業，確實有很大的貢獻，教會方面也做了各種「文化傳教」工作，如醫療與救濟活動等，有不少的人專為求取食物而到教會，這些人都被戲稱為「Rice Christian」。也有不少韓國人由基督教關係機構推薦到美國留學，韓國基督教的發展基礎，可以說是在這個時期萌芽。

第二期，朴正熙政權為決定實行維新革命，在七〇年代，加強獨裁統治，那時還在貧民窟或下層地區展開救濟活動的基督教長老派人士，他們為爭取民主與恢復



（韓國婦女）



（求佛許願的韓國老婦）

人權，起來參加鬥爭，天主教也組織了一個叫做「正義俱現司祭團」，共同爭取人權。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金大中等新舊基督教徒在漢城市中心明洞大聖堂發表了「民主救國宣言」，此即該項運動的明顯象徵。這時期的韓國基督教確實提高了素質。

第三期，被稱為漢江奇蹟的超高度經濟成長停頓的八〇年以後，信徒人數更激烈增加，甚至被人諧稱為「宗教爆炸」。

基督教徒增加最多的是青年階層，特別是學生，他們對全斗煥政權所施的種種獨裁政策與壓制，曾經發動數次抗議活動，結果却換來了一連串的逮捕與徒刑代價，據聞目前尚有數百名學生身繫囹圄。校園中不僅有所謂「校內言論提前審查辦法」，並且還厲行「學校內外十人以上的集會、校內廣告、散發印刷物、邀請校外人士等，均須事先批准」等，連極權國家都不可能存在的怪規定。

有個學生說「即使閉著眼睛，守份守己地好好讀書也不成，校園內充斥目中無人的暴力分子，情治人員則狐假虎威，甚至強暴女生，我們只要略有不滿的表示，或是多言兩句，馬上會受到法律制裁，而

他們則全然無事，要人奴顏卑膝至此，實在令人難忍。有煩惱的事，只好到教會向神父、牧師或朋友傾訴，遇到難於解決的困難，朋友或教會也會盡力幫忙。」

據教會方面的調查，八二年底，漢城市內的教會有五千六百家，遠勝於號稱有四千三百多家的達班（茶莊或咖啡廳），外國人看到漢城市內處處林立的咖啡廳，會搖頭嘆息，譏之為「達班文化」，同樣的，現在的漢城也可說是「教會文化」，目前還有許多教堂正在興建，但還是不敷所需。

以單個教會而言，被稱為世界最大的漢城市汝矣島純福音中央教會，是高度成長的典型。每星期日，從早上六點半至晚上九點止，須舉行七次禮拜，能容納一萬人的大禮拜堂的走廊或樓梯，無論何時都擠滿信徒，甚至得借用鄰近的教育館與傳教中心暫充為臨時教堂，以電視傳播做禮拜。根據韓國教會財政管理報告，去年的教會總收入僅新教部分，就超過四千四百億韓幣（約兩百二十億新台幣），這還是很保守的估計，利用這筆龐大資金來建設教會以增加信徒之舉，於國家是否有益，很令人懷疑。

蘇俄拒絕參加洛城奧運

／王開

(奧運會紀念場正門)



蘇聯奧運委員會，四月九日發表聲明，激烈譴責主辦今年夏天洛杉磯奧運的美國政府，並要求國際奧運委員會（IOC），舉行臨時理事會。因而，有關人士猜測，蘇聯今年是否參加奧運？倘若不參加，則將是繼美國之後，其它東歐國家極可能紛紛抵制，回報美國一九八〇年抵制參加莫斯科奧運會，也是國際政治舞台上，再度傳出一項重大的政治體育事件。

蘇聯的目的何在？頗引人側目，然而受譴責的美國政府，却以「要求的項目太多，無法看出蘇聯真正的用心何在！」美國官方傲慢地回答，向蘇聯抽了一支冷箭。一般人以為，蘇聯之所以發動IOC，放出國際論，俾能保障蘇聯選手和職員之生命安全，同時放出「不參加」的空氣，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站在較有利的立場。

蘇聯利用她的奧委會聲明，以及塔斯社、新聞論評等媒介，攻擊美國，強調「美國策動反蘇與反對蘇聯參加奧運之計謀」。

第一，聲明責難美國組成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接受政府機關指示，「勿讓蘇聯參加奧運」！並恫嚇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選手、職員，這種挑釁行為，蘇聯引用美國的報上新聞說：奧運期間，美國準

備舉行政治性示威遊行和集會。

第二，蘇聯最擔心的，就是恐怕美國人勸誘蘇聯選手投奔自由，據蘇聯體育新聞四月三日報導指出，「美國的各種諜報機關已大量刊印，對外國選手洗腦而使其不欲回國的宣傳書，並且特別設立拒絕回國者的「藏身」屋」。

第三，進入美國的簽證問題。蘇聯奧委會聲明，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要求提出全部名單的通告，其中並提起美國國務院曾經拒絕蘇聯奧運會連絡官的入境簽證。

第四，蘇聯抱怨洛杉磯是一個充滿犯罪與色情的都市，而奧運本身毫無限制的商業化作風，根本違反奧運憲章的原始精神。

蘇聯的強硬主張，目的是為了要求IOC召開臨時理事會，並在會中提出檢討，要求美國遵守奧運憲章，為選手與來賓，採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洛城奧運會，將於今年七月二十八日舉行，申請的截止日期訂於六月二日。IOC例行理事會，預定五月底召開舉行。屆時蘇聯若不滿於美國政府或IOC，至少到六月二日之前，可獲進一步的證實。

如果這樣，共產國家可能會協同蘇聯，採取同一步調。四月五日蘇聯、東歐（



南斯拉夫除外）、越南、北韓、古巴、寮國、外蒙等，十二個共產國家的黨中央委員代表，在莫斯科舉行「奧運問題討論會」，這時，參加的各國基本上發表同意，聲明若參加奧運之前，決定採取一致立場。

然而，就事實問題而言，蘇聯如不參加奧運，其損失可能比美國更大。蘇聯當局者曾加以說明，並不打算因美國抵制上屆莫斯科奧運會，而採取不參加洛城奧運會的報復意圖。

歷年來，奧運是發揚國威的最好機會。一九八〇年莫斯科奧運會時，美國及許多國家雖然未參加，但蘇聯竟獲得歷史上最高的八十塊金牌紀錄。如果不參加奧運，對於選手們的技能與士氣，皆有莫大的損失，尚且下屆的漢城奧運會（八八年），由無邦交的南韓主辦，屆時對於難以應付的北韓同盟國，以微妙的政治關係而言，蘇聯將處於難堪的立場。

在美國，由於去年的韓航擊落事件，而引起國內一片反蘇聲潮，所以，蘇聯如果抵制洛城奧運，將使美國火上加油，甚至反而幫助了蘇聯最討厭的雷根，競選連任。

綜合上述各點，不難看出蘇聯對奧運

的責難聲明，雖留有餘地，基本上乃是要求美國政府讓步，擺出不參加的態勢，奧運商業化不過是一種藉口，其最重要的懸慮，却是擔心選手或職員投奔西方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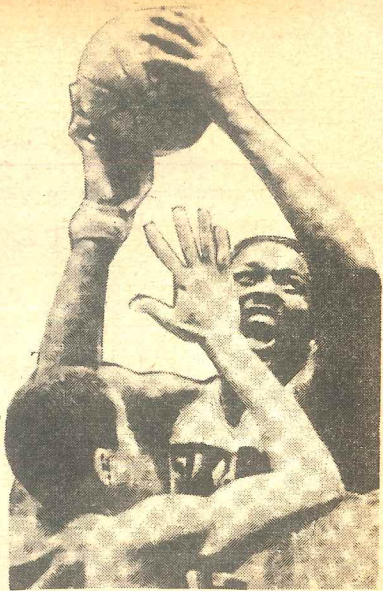
以過去的經驗而言，在西方國家舉辦奧運時，屢屢發生共產國家選手投奔西方之事的端，尤其這次奧運會又在罪惡和色情之城的美國，難怪蘇聯當局更會提高警覺。

因此，蘇聯方面把申請登記延至最後限期，使盡一切手段玩弄，俾從美國政府獲得更多的基本保證。

反觀美國對於蘇聯要求IOC召開臨時理事會，批判美國政府等事，反應却很冷淡，一般咸以為蘇聯的責難是「找碴兒」。

紐約時報，四月十一日的社論說「蘇聯提出費用問題、簽證手續、安全保障以及其他種種太多的問題，令人難測，真正的用意何在？也許蘇聯欲報復八〇年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之舉，但美國政府已經容許蘇聯國營航機飛入美國，奧運期中也同意蘇聯客輪停泊等」。

關於蘇聯所提出，拒絕發給奧運聯絡官的簽證問題，雖然國務院發言人休斯祇說「美國政府認為該員不適合該職務」，



但是紐約時報社論透露「因為查出該員是蘇聯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所以並無反駁餘地」。

對於蘇聯最關心選手的投奔問題，美國認為該項問題非美國政府能力所及，這是民間的反蘇團體，行使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而對選手進行的事，所以政府無權介入。

白宮助理發言人舒必克斯說，「蘇聯的抗議與真正意圖好像不同」。國務院高級官員也說：「任何能使雷根為難的事，蘇聯都願意幹，以便在總統大選前獲取利益，他們為奪取奧運會金、銀牌，曾費了莫大心神，所以他們必定會來洛城無疑！」

海外短波

中共找回

北京人!?

／李立威

中共考古學家，最近在新發行的「文物天地」雜誌上發表，「失蹤數十年，而一直未獲消息的前北京人化石，仍在北京市內，當年被人埋在美國大使館後面的車庫地下」——

這位考古學家名叫周國興，與著名的北京人研究專家裴文中博士交往密切。目前擔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員。

北京人化石，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前夕，受託保管於北京協和醫院（現首都醫院）。但因日美關係呈現緊張狀況，迫使提供研究資金的美國和中國有關人士，

計劃把北京人化石裝在箱裏輸往美國後，適逢戰爭發生而失蹤，迄今仍行蹤不明，不知所終。

長期以來，專家們對於化石去處深感疑惑，一般的解說是：①化石的最後失蹤地點是河北省秦皇島，未運到美國。②失蹤前的化石，落在美國人手中——。

但是，周國興對這些說法却另有意見，他從美國獲得的消息，經仔細研究後，認為：

①發生太平洋戰爭的前日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北京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與美國

大使之間擔任衛兵職務的美國人（現在還生存），目擊兩個人扛着一個箱子，埋在美國大使館後面的庭園。②這名衛兵深信這個箱子正是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並提議挖掘該現場。

據周國興說，該地點目前已擴建為中共所屬第二十三號賓館車庫，他雖已向上級機關申請挖掘許可，迄今仍未獲批准。面臨北京前門東大街的這家賓館，為美國大使館舊址，使館另一部份已改作為貿易辦公廳。

海外短波

美國人為何也叫窮?

／高聞道



新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飢餓、剝削在美國愈形嚴重，許多美國人在去年無錢為家人買食物、衣服及醫藥。

百分之二十的美國成人（包括百分之十七的白人和百分之五十一的黑人）說，他們買食物的錢不夠。

百分之二十六的美國人（包括百分之二十四的白人和百

分之五十的黑人），表示沒有能力買衣物。

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國人（包括百分之二十二白人和百分之四十七的黑人）說，去年他們無法支付家人的醫療費。

經過調查，約有百分之三十五（包括百分之三十三的白人和百分之五十九的黑人）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常常或總是

擔心家庭收入不敷所需。

將一九七四年的情況和現在相較，情況愈來愈壞，這是公認的事實，下面有幾個表，比較十年前和現在的情形：

問卷：你的全家收入是否不夠開支？（問卷統計如左圖，以「每日」、「經常」、「有時」、「不會」、「不會」等表示之）。

時間	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四年
食物短缺人口數	20 %	14 %
白人	17 %	10 %
黑人	51 %	40 %

時間	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四年
衣物短缺人口數	26 %	19 %
白人	24 %	14 %
黑人	50 %	49 %

時間	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四年
醫藥短缺人口數	25 %	15 %
白人	22 %	11 %
黑人	47 %	36 %

時間	每天	經常	有時	不會	無意見
一九八四	20 %	15 %	30 %	34 %	1 %
一九七四	13 %	12 %	36 %	38 %	1 %

艾奎諾的死亡錄音

卓同



(艾奎諾)

這個報告的調查時間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七日至卅日止，在全美三百個地區抽樣，

共訪問一五六二個成人，十八個老人，其中白人一四〇七，黑人一三三。這份資料顯示，

針對白人的準確度，其誤差不會超出百分之三，黑人不會超出百分之十一。

馬尼拉舉辦一場艾奎諾案五人小組聽證會，時代雜誌香港辦事處主任珊德拉·伯頓小姐，提供了一卷錄音帶，並親自出席作證。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一日，伯頓小姐與菲律賓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同時搭乘華航八一客機由台北飛往馬尼拉。案發時，她錄下了現場的聲音，在聽證會前一星期的記者會中播放。

伯頓小姐作證的時候說，在飛往馬尼拉途中，艾奎諾也談到他被暗殺的可能性，「但是似乎死的意念絲毫不能左右他。」她說，飛機一降落，身着制服的軍人立刻上來護駕艾奎諾，她則想盡辦法，尾隨其後。「從他的身影自機艙口消失起，我就打開錄音機，」她

說，「直到錄音帶用完為止。」

錄音帶開始是一段機艙的音樂，又聽到一個人激動地用菲律賓方言說：「我會去做！」「他來了！」以及「打死他！」隨即一聲槍響，然後一名菲律賓女子不斷哀泣著說：「噢，不！他們殺了尼諾！爲什麼他們非殺了尼諾不可呢？」

尼諾是艾奎諾的暱稱。官方宣稱，艾奎諾從機梯步入飛機跑道，就被一名職業兇手擊斃。但是艾奎諾家屬及反對黨各領袖力言，這件謀殺案政府當局脫不了嫌疑，而官方名其爲羅藍道·加爾曼的刺客，就是政府指使的。艾奎諾一被射中，加爾曼立刻被安全人員當場擊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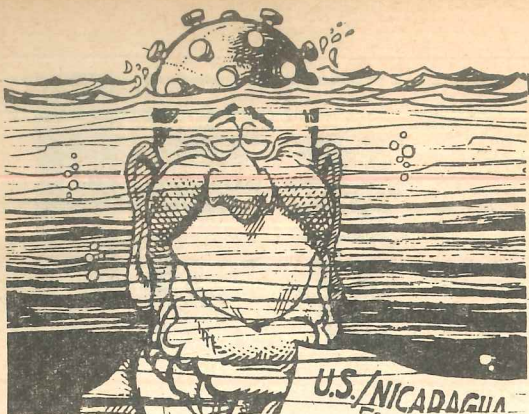
伯頓小姐說，繼第一聲槍響之後，隨之聽到連續三響，然後再一聲，最後是一陣混亂的槍擊聲，她跑到窗口一看，艾奎諾和加爾曼已經躺在跑道上。她還看到一名士兵拿著自動步槍對準加爾曼的身體連續射擊。

由錄音帶得知，從艾奎諾通過機艙口那一刻起到第一聲槍響之間，一共有十秒鐘，聽證委員說，他們在重新模擬時發現，不可能在十秒鐘之內從機艙走到飛機跑道，他們推測殺死艾奎諾的這一槍是他還在機梯上的時候射出的。

主持這項聽證會的退休法官卡拉松·阿哥拉瓦說，這卷錄音帶有助於了解這件謀殺案的不明之處。

雷根爲什麼佈雷？

張元平



雷根的武力外交政策，最近在尼加拉瓜外海插了一腳，爲國際特務之樣版，平添一則佳話。美國一艘小船，載著聯邦調查局的幹員，駛進尼加拉瓜外海，秘密展開佈雷封鎖，以截斷該國的補給線。

如今醜陋的真相已告大白，但這項事件使美國國會議員大爲震怒。因爲不久以前，雷根在黎巴嫩的外交政策失利，引起衆怒，使得某些國會議員不得不緊張兮兮地爲雷根和美國利益辯護。如今他們卻回頭指責，砲打CIA局長凱西，無疑是因爲這一次佈雷封鎖，證明了他們狠狠地自打嘴巴。無論如何，這些議員們措詞非常嚴厲，即使是參議員高華德也忍不住大罵：「迄今，我尚不知如何去解釋這個事件？」他很生氣事先未獲通知，但最近他又很高興地跑到台灣來做生意了。

這個事件的困局所在，即是僵在企圖如何解釋。現在即

使美國當局想掩飾天下耳目，也措手不及，尼加拉瓜已經一狀告到國際法庭，控告雷根違犯國際法，並要求雷根結束戰爭。

除了古巴的卡斯楚政府，巴加拉瓜的桑地政府是中美洲最近以來，首次出現的反美政權，迄今仍屹立不搖，也是中美洲第一個接受古巴軍事支援的政權。

因此，美國如何面對桑地左傾政府，在戰略上是一個棘手問題，至於這個問題所顯示，蘇聯勢力之擴張，以及尼加拉瓜接受古巴支持和影響，如果透過巴拿馬海峽，或從墨西哥邊境伸入美國，當然嚴重影響美國獨霸中美洲之利益，以及美國境內的安全問題。

從另一方面來的蘇聯強勢是否介入？古巴的顧問集團是否擴展？以及桑地政府是否支援撒爾瓦多游擊戰？都是美國政府迫切關心的問題。

然而問題的核心是發展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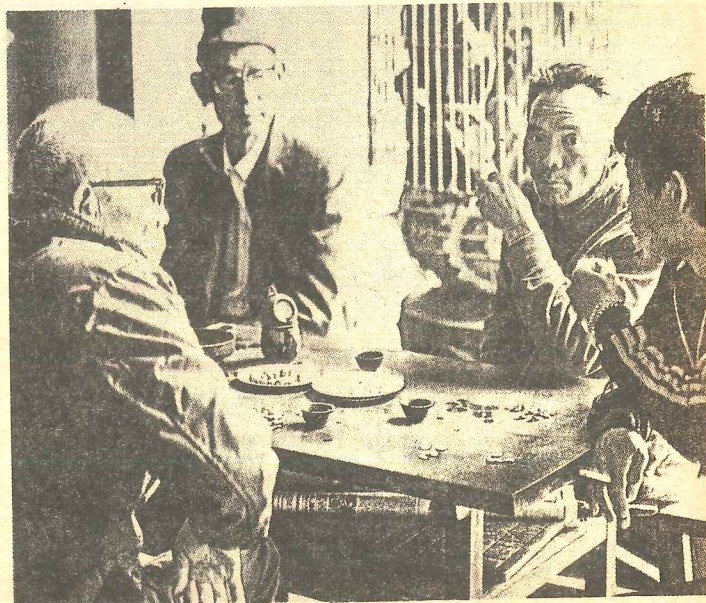
深，美國政府愈來愈急著考慮抉擇，在未來的發展上和桑地政府保持關係如何；也就是說，美國必須考慮，是否容忍一個反美政府存在的問題，是否必須策謀使桑地政府倒台，以保持其榨取第三世界的經濟利益，永遠得逞。

除此之外，美國更要爭論一個嚴肅問題，就是桑地政權骨子裏，究竟是馬列主義，或只是一個左傾政府。但兩者都帶給美國當局政治上的不安。

這種邏輯推論，以及看問題的方法都是狂妄的，才逼使美國訴諸軍事行動，並支持反桑地政府的反抗軍，因爲美國不能吞下任何中美洲國家左傾革命的事實，進而干涉尼加拉瓜的內政問題，這個例子和廿幾年前古巴的卡斯楚革命一樣，證實CIA向來就是帝國作風的幫手。

「臺灣話」和「臺北國語」

／洪鯤



●似乎又起了一陣波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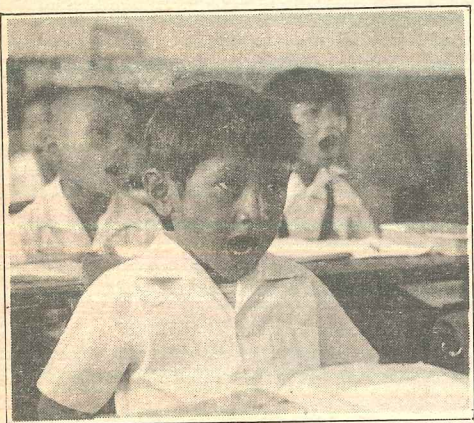
國語與方言的問題，一直都是最敏感的問題。一九六二年，郭國基擔任省議員時，爲了省議員不可在省議會使用方言的問題，熱烈討論過一陣子。一九七三年底，爲了文化局限制閩南語節目，也熱烈討論過一陣子。最近，前進和夏潮同時出現了幾篇討論台灣話問題的文章，似乎又引起了一陣波瀾。

「統一狂熱」和「分裂狂熱」，正暗潮起伏，各自運用「形式邏輯」思考本質問題，事實上，却是「相反相成」、「並行不悖」的問題

「前進世界」第二期，刊出林波海先生的「國語與方言」，引起田朝明先生極力的反對，在前進世界第五期發表了「河洛話（台灣話）與北京話（Mandarin）」。林先生主張公共場合應該使用國語，不適合使用閩南語；但田先生却主張「在民主社會任何人都有權力使用自己所歡喜的語言發言的自由。」林先生說：「不要說一國之內必須有一個共用的語言，就連國際上都必須有一個共用語言。」田先生却主張「必須有一個共用的語言」，就等於其他語言要忍受媳婦仔的運命，不能公開露面，任外來人輕視踐踏而等待被消滅的運命？」他不但聽到「國際上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要「驚死」，並稱國語推行委員會爲「行不義的」。

●暗潮起伏，各自運用「形式邏輯」

另外我在夏潮革新號第一期（三月號），發表了「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收到一個署名「高克迅」的讀者投書（夏潮四月號節錄）激烈的反對，認爲台灣話應該消滅，中國人要使用國語，甚至主張使用國際語（Esperanto）。



●語言學家反對消滅方言

林波海先生我不相識，從他的文章看來，我想我們對「方言與國語」問題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是從不同的角度發表言論，却遭到兩種完全不同的偏激立場所反對。這樣的反應充份顯示了，台灣內部「統一狂熱」和「分裂狂熱」，正在暗潮起伏，各自運用「形式邏輯」思考本質問題，不知道「統一」與「分裂」事實上是「相反相成」、「並行不悖」的。「狂熱」洶湧於心，所以失去了冷靜思考力，走向極端，甚至連別人的文意也看走了眼。

田先生看到林先生「使用共用語言」，就緊張兮兮以爲是要消滅方言，把「共用」讀成「共同」，認爲受到壓迫，於是

連「共用的語言」都認爲不必妥了。這是患了「分裂狂熱病」；高先生看到我主張「保存台灣話」，於是就緊張兮兮地認爲「我主張不要推行「國語」，認爲要消滅方言，依他的邏輯推行下去，那麼「國語」也應消滅，必須使用「國際語」了。這是患了「統一狂熱病」。

我以為語言就實用言，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其目的，就是要令別人了解自己思想情感，如果各自堅持「自己歡喜的語言」，在五方雜處的公共場合，不肯使用大家都能了解的共通語，不但不能達到表達的目的，對於不懂你的語言的人，也具有排斥性，的確是很不禮貌的。

●語言除了實用性之外，還有藝術性

不過語言除了溝通的實用性之外，它還有藝術性、文化性等種種功能，如果只爲了實用性的目的，便刻意地去消滅方言，這種行爲就好比貪婪的人類，爲了滿足自己無窮的欲望，破壞生態環境，以爲把全世界無用的物種消滅掉，只留下人類能吃的能用的，便說自己是在進步、發展一樣，是非常愚蠢可笑的行爲。



● 語言就和生物一樣，它是有生命的東西

● 國家應有標準語，世界應有共通語

但是生態學家反對人類的淫欲無窮的擴張，竭力呼籲，挽救面臨絕滅的物種，當然不是主張人類不要進步、發展，讓歷史回到遍地蔓草、野獸橫行的蠻荒時代。語言學家反對消滅方言，並不就表示反對一個國家應有標準語，世界應有共通語。語言就和生物一樣，它是有生命的東西。

西。世界上因為有這樣豐富的物種，人類的生活內容才能豐富起來，如果把不要的物種消滅掉，不但人類的生活將變得貧乏，人類也無法生活下去。生態學家已經看出這種危機，不必多所贅言了。至於語言也是相同的情形，如果把所有方言消滅，定於一尊，這個統一的「共通語」、「標準語」也必不能維持長久，終歸要分化為許多方言。

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沒有分裂的統一，必然要重歸於分裂。

● 歷史的教訓，俯拾即是

這個教訓歷史上俯拾即是。古羅馬帝國統一了南歐，把南歐的原始語言消滅了，却繁衍出義語、法語、西語、荷語……等多種方言。古漢語（即諸夏語、雅言）把四夷的語言消滅了，却繁衍出中國的無數方言。

但是羅馬和中國發展的結果，却大大的不同。羅馬帝國分裂成好幾個國家，中國却維持了統一。這是什麼道理？

高先生的投書中（編者按：原文三千餘字，未及備載，此據原文）提到：「……如果中國像土耳其（第一個使用羅馬字拼音的阿拉伯文國家）、日本一樣那樣力行（拼音字），則中國可能很少有方言……。」姑不論高先生的推測如何天真。中國果真使用拼音字，中國早就分裂為無數小國了——正如羅馬帝國一樣。

●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許多人把中國能夠維持大統一，歸功

於秦始皇的統一漢字，但一般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漢字在學習上固然很方便，記音的功能很笨拙，但它却維持了抽象的統一。它放縱方言的發展，却用抽象的漢字統一起來，使得各地人語言雖異，文字却能相通。保持了分裂中的統一。

當然文字的統一不能滿足政治的需要，所以歷代都有官話的通行，俗稱普通話，古稱雅語、通語，現代稱「國語」（但我也不太喜歡「國語」這個名稱。「國語」二字傳自日本，有很濃厚的國家主義味道。我主張使用「標準語」的名稱，或者直呼為「北京話」，就像英國以英格蘭語（English）為標準語，所以英語稱為（English）。

● 「台北國語」是很不標準的北京話

現代中國標準語是北京話。不過要想操一口京片子，除非從小在北京長大，沒有經過特殊的語言學訓練是絕無可能的事。這沒關係，中國永遠以北京話為標準，而事實上各地人永遠說不標準，這樣北京話剛好維持抽象的統一，就像以前的官話一樣。許多人以爲他說的「台北國語」很

標準，這不是好事。「台北國語」是很不標準的北京話，如果「台北國語」是「標準國語」，那麼中國便有兩個標準語。一旦台北國語拼音化，或者依據「台北國語」——「注音符號化」（這是非常容易的事，美國英語的韋氏音標、KK音標，便屬這一類），中國便非分裂不可。倒不如維持現狀，大家能說不太標準的北京話，却能說標準的方言，維持了統一的分裂，分裂的統一。

● 台灣話是中國最古風的方言

高先生對我說「台灣話消滅了，台灣文化也就消滅了」的話，覺得很不解，這是因為他只着眼於語言的實用性，沒有看到語言的藝術性、文化性。

我在「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一文中提到「台灣話是中國最古風的方言」，高先生却說台灣話因為是長老所以要被淘汰，就好像文言文要被淘汰一樣。我說台灣話古風，卻沒有說台灣話是文言文。台灣話是表現台灣人生活文化最適當的語言，它是活生生的語言，不是文言文。

但是因為台灣話古風，對於了解古文

● 無論河佬話、客家話、山地話都應該存在

、古詩是極有幫助的。北京話因為是胡化最深的語言，想要利用北京話來了解古代的中國文化，的確有不太方便之處。這一點若不是對台灣話、對古代漢語有深入了解的人是很難體會到的。我們如果要創造中國新文化，不是從地方文化、從古文化中去尋根，難道要從西方文化去尋根不成？

無論北京話如何老么，從實用的觀點言，選擇北京話作為標準語，我認爲是合理的，但是從藝術、文化的觀點，任何企圖消滅台灣話的主張我都反對。因為消滅方言，就等於消滅中國文化。站在民族本位文化的立場，站在中國多元文化的立場，台灣話，河佬話、客家話、山地話都應該保存。

基於以上的理由，三語教育——標準語及方言（母語）、英語（世界通語）是維持國際溝通、中國內部和諧統一、保存傳統中國文化、發揚現代中國文化刻不容緩的大事。搞好標準語教育最重要，其次是母語，最後才是英語，乃至於第二外國語。

追究公害

●黃順興

●世紀之毒戴奧辛



司法獨立

追究政府行政責任

三月十七日中國時報登載一則東京消息，指出纏訟十六年，受害者多達一萬數千人的米糠油中毒事件，是日本有史以來危害最大的食品公害。並且指出，日本政府打輸了這場官司。經福岡高等法院民庭判決，應對受害者賠償四十六億四零零五萬日圓。

依據判決理由，追究日本政府之行政責任，認為政府所委派的主管官員應站在公務員立場，負有「管制、照護人民」之義務，而却因失責過失，不能採取防範措施，阻止油害擴大，致使應該減少三成的受害程度繼續蔓延下去，政府應擔負法律之刑責，科罰賠償總額的百分之卅，約十四億日圓。

一百萬隻雞中毒

五十萬隻死亡

按米糠油含毒疑案最早發生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在日本西部北九州一帶，發現當地居民飼養的雞，因食用一家名叫

「鐘美」(Kanemi)製油公司出產的油類飼料，導致一百萬隻雞中毒，其中五十萬隻死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上旬，住在福岡縣下北九州市的一戶人家因食用米糠油，致使全家中毒，其所食用的油即為北九州市鐘美公司製油部所產，此後中毒事件陸續發生，引起社會嚴重抗議，而設於九州大學的油症研究室，旋於十一月五日發表研究聲明，確認中毒事件為因食用鐘美公司製造的米糠油所引起。

該案判決，引起吾人特別的注目和感慨，乃日本法院對政府行政措施追究責任，固含絲毫不苟的嚴明態度，從而判案中吾人可以看出，日本現行政制的責任分明，「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之被遵行，絕非台灣的行政和司法可以比擬，也足為台灣當局借鏡。

窮困貧民 相繼中毒死亡

回顧一九七九年，台灣中部縣市發生食油中毒事件。自從當年五月中旬，台中縣衛生局發現疑似日本鐘美油毒患病例，延至該年十月六日，確認係由彰化油脂工廠所產米糠油含有劇毒多氯聯苯(PCB

)，引起彰化周圍地區居民因食用而中毒事件。該案爆發時，拖延至五個月以後，工廠負責人陳某移送法辦，訟案糾纏達數年之久，而禍首於一、二審被判十年以上重罪，却在上訴中因病死亡。民事賠償部份則因案發初期，行政機關遲遲未能確認禍源，不僅使法院無從定罪，並在此期間，放任彰化油脂廠利用充分時間脫罪。如今，包括豐原啟明學校師生在內一千人以上的受害者，皆是地方上的窮困貧民，其

中中毒劇深者已相繼死亡，活存者亦在醫藥無繼的慘況下呻吟度日，他們因為上述之故，未獲分文賠償。

台灣官員善長卸責

世界之最

對此民間慘況，政府衛生行政機關初則張惶失措，繼而託辭並無該項檢驗設備，一味浪費時間致失有效機會，令受害者

症狀繼續惡化，甚至遞昇死亡人數。凡此有關官員職務上應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以致被害者的生命、物質、精神上等等等的損害擴大，其應負責任實已大大超過日本「鐘美」油毒事件。
台灣官員之善於卸責恐怕為世界之最，在公眾災害頻頻，輿論批評不絕於耳當中，却能無動於衷、好官自為。這種奇景殊屬罕見，也就難怪台灣各種公害的日趨嚴重了。

不選也罷！

●黃順興

仕政府完全承認它的地位，並准許在全國派駐選舉監督人員，否則該組織將退出今年五月所進行的幾項重大選舉。

選舉光憑執政者信口說公正、公開、公平還是不夠，一定要由各黨各派所指派，而且任何一黨派都不得超過半數的一個超然組織，共同主持選舉事務以及監察工作。這樣的機構來辦理選舉，才具有實質的民主意義可言！

今日這地球上仍有自稱自由民主的政府，在長期實施戒嚴的掩護下造成一黨獨大局面；發動自家人制訂選罷法規，更指派自家人組織選舉委員會來辦理選舉，如此自家人編造選舉人名冊，自家人發選舉票給自家人投票，由自家人監票、開票、

唱票、計票，像這樣的選舉充其量祇能說是一幕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根本就不配說「選舉」。像菲律賓統治者馬可仕之輩就屬於喜歡表演選舉鬧劇的獨裁者之一。然而，民主其名獨裁其實的統治者為什麼能夠自編、自導、自演而愈演愈烈呢？說來十分乏味，每到選舉季節，偏偏有人自願捧進一脚幫人演鬧劇的，這才使得獨裁者鬧劇之餘，還敢以大言不慚對外宣布它的重大勝利。

假使所有不民主國家的民主運動者，都能像菲律賓反對派聯合組織一樣用「退出選舉」的辦法，來抵制以爭取共同辦理選舉的話，相信要達到真正「公正」「公開」的民主選舉就不遠了。

●民主其名，獨裁其實的統治者為什麼能夠自編、自導、自演而愈演愈烈？

菲律賓一個主要反對派聯合組織於三月十七日在馬尼拉發表聲明說：除非馬可



楊麗花換腔走板

● 因是非

楊麗花歌仔戲出身，去年年底，成為洪文棟的「立委夫人」之後變了……

一九六〇年代，在國民黨一貫的「消除方言」、「文化清潔運動」的政策下，在電影、電台、電視的夾攻下，在長期脫離現實的教育和盲目西化的空氣裏，歌仔戲已顯得氣息奄奄。在歌仔戲形將絕響的時候，群眾以電台和電視台的「高收視率」，展現了他們可憐的力量，逼使以營利為目的的半官方電台和電視台保留了歌仔戲的一席之地，作為「搖錢」的對象。就這樣因緣際會，群眾把他們對歌仔戲的熱情齊集在楊麗花身上，歷二十年而不衰。

楊麗花的眼淚 阿婆們的金子

可憐的楊麗花，在群眾如雷的掌聲中受寵若驚，在阿婆們奉獻長生金牌、金腰帶、金冠的壯舉中感激涕零。然而，當她成為「名人」和「有錢階級」的時候，却不可避免的面對了社會的兩極——一邊是熱情的觀眾，一邊是冷漠、瞧不起歌仔戲的「現代化」知識人。

畢竟楊麗花是在歌仔戲班裏長大的，她由衷喜愛歌仔戲，歌仔戲是她的生命，她也深知歌仔戲的生命，所以直樸的楊麗花面對社會的兩極，仍難忘情熱愛她的群眾，甚至以歌仔戲的興衰為己任：「我是從歌仔戲出身的，現在人家一講到歌仔戲，就會想到我楊麗花，我當然有責任。」面對智識階層的冷漠和批評，責任感令她

丟掉「哭調」 改唱「快樂人生」

就這樣，楊麗花——據她自己說——前後作了三次改革嘗試。這些改革（例如廢棄「智識人」攻擊最力的「哭調」，加上很多樂師新編的所謂「電視新調」），雖不一定合宜或進步，但這且不說它。令人驚奇的是，經她多次改革的歌仔戲，竟還沒有完全喪失歌仔戲的傳統精神，她不肯輕易屈從電視台周圍的「智識人」的要

求的執著，著實難能可貴，值得我們讚嘆！像華視巫明霞竟然妄想以平劇的語言唱歌仔戲，結果收視率跌停板。

然而，從去年開始，我們發覺楊麗花「變相」了。以歌仔戲與衰為己任、口口聲聲「傳歌仔戲的薪火」、「不作賤歌仔戲身價」的楊麗花；三年前在國父紀念館以「漁娘」一戲，令很多「知識人」刮目相看的楊麗花變了，在成為洪文棟的「立委夫人」後變了。

早在前年底去年初，楊、洪婚期一延再延，最後決定在去年三月底的時候，楊麗花即表示婚後「幕前演出，將逐漸減少，她將致力於幕後的歌仔戲傳薪工作。」

去年九月，婚後的楊麗花突然意興風發「撈過界」灌製流行歌唱片「快樂人生」。結果「快樂人生」唱片快樂不起來，害得新格唱片公司有苦難言。流行歌唱片銷路差，自是意料中事，但原因不在楊麗花流行歌唱得「不好」，相反的，她的歌仔戲團員，像許秀暉、小鳳仙、黃香蓮、洪秀玉、青蓉……，她們的歌藝和韻味，就是唱起流行歌來也是刮刮叫，決不是一般歌星可比；楊麗花流行歌不流行的原因出在角色混淆，喜愛歌仔戲的人不會喜歡她的流行歌，喜歡流行歌調調的人大概多

瞧不起歌仔戲，自然不會看上她的流行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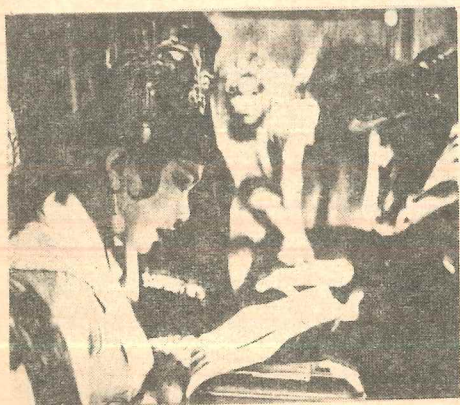
楊麗花台視歌舞團

最近從二月中開始，楊麗花又率團在全省作一個多月的巡迴公演，照說憑楊麗花的招牌和以往票房紀錄，此次公演必再度掀起歌仔戲熱潮。然而這次公演，楊麗花不僅砸了招牌，作賤了歌仔戲，而且大大的挫傷了楊麗花迷的感情。

以二月二十七日在基隆龍宮戲院公演為例說，筆者票買當晚九點十分開演的第三場，結果等到九點五十分左右，上一場的觀眾才陸續出場，這些出場的仕女們普遍表示不滿和失望，有的「幹」了一聲大呼「受騙了」，有的說「我們花了三百二十元是來看歌仔戲的，不是來看歌舞表演的」，有的接著說「要看歌舞表演還不如去餐廳或歌廳！」有的甚至對我們這些在馬路旁「罰站」準備看下一場表演的人說「退票啦，沒啥可看的。」

原來二小時的節目分二段，前段（約七十五分鐘）由益世廣播電台「愛情青紅燈」節目的主持人主持，請一些名不見經

傳的歌星，表演那些充滿聲光色的節目。在冗長的歌舞聲中，筆者忍不住跑到後台找楊麗花抗議，不想楊麗花辯解說，她們歌仔戲是應益世電台邀請表演的，歌仔戲只是歌舞節目中的一項而已。事實上整個演出廣告，不論戲院前、計程車的後窗、報紙報導，清一色是「楊麗花台視歌仔戲劇團公演」，絲毫不見有「益世電台」的任何字眼；預售票時也沒有預告演出節目，問之售票員也回說「不知道，反正就是楊麗花的歌仔戲。」顯然這是一齣挾楊麗花「令名」所作的欺騙觀眾的鬧劇。可笑的是竟然有不滿演出節目的觀眾，還天真的以為隔日報紙會批評攻擊這一騙局。



● 歌仔戲捲入西化狂流

賣掉洪文棟
來繳所得稅

綜觀上述，楊麗花從去年決定婚期就宣佈逐步退為歌仔戲的幕後，灌製流行歌唱片，到帶領歌仔戲團參加歌舞節目演出，我們發現深刻瞭解歌仔戲精神的楊麗花，一步步的陷入「價值錯亂」中，幾乎作賤她自己又作賤歌仔戲到令人要為傳統文化學哀的地步。她的想退出歌仔戲及插手流行歌，可能與她的老公洪文棟有關，「現代化」了的洪文棟可能視歌仔戲為低俗，所以寧可讓他的太太走流行歌的路，而不願楊麗花演歌仔戲。至於楊麗花這次公演如此「不上道」，已不僅是想插手流行歌而已。除了報上所載此次公演每日酬金七十萬的謠傳外，實在沒有更好的說辭；除了為「搖錢」而不顧傷害群眾的感情理由外，一向「愛惜羽毛，珍惜自己聲譽」、「錢，誰都想要，但要取之有道」的楊麗花又何致於此地步？三個月前她為老公洪文棟助選，頻向選民訴求，如果洪文棟此次再度落選，她將沒有臉再演歌仔戲；三個月後却為每日酬金七十萬的事否認說「如果酬金那麼高，恐怕要賣洪文棟才

繳得起所得稅。」

筆者認為歌仔戲深具傳統文化價值，也關心歌仔戲未來命運，看楊麗花如此作賤自己和歌仔戲，實在感到無限的悲哀。但筆者不忍，同時也自覺沒有資格對楊麗花多作責備。一個從歌仔戲班中長大的人，帶領著她的歌仔戲團，置身近代虛矯的西化狂流中，她已難能可貴的為歌仔戲，為傳統文化盡了很大的力量。應該責備或反省的，反倒是「現代化」的「智識階層」，因為有「價值錯亂」的智識人，才有「價值錯亂」的楊麗花。



(楊麗花)

智識人的價值錯亂

首先我要痛切的指出，傳統文化精神愈在文化的上層愈是付之闕如。「現代化」了的智識人，如果認為追求民族本色的文化是必然的話，就應該以「禮失求諸野」的謙虛態度，以宋朝的黃庭堅「以俗為雅，以古為新」的精神，把文化學識的高低上下態位扭轉過來，揚棄「智識人」的自負心理，到文化的低下層、社會的幽暗

角落，尋回傳統文化的精神。

特殊階級的藝術
只是漂浮在
社會上空的雲霧

「現代化」的智識人，一般的通病是先入為主的汲汲肯定西洋文化的進步性，以西洋為標準，來衡量傳統文化，然後武斷的認定傳統文化為低俗。他們以這樣的論斷，竟膽敢否定群眾的感情和判斷，否定「父祖」的文化。放眼當前社會沒有任何一種音樂、戲劇或藝文活動比歌仔戲更能吸引和鼓動群眾的熱情。但「智識人」竟視若無睹，埋首沙堆的自以為「清高」、自以為「精緻」。群眾固然不一定是歷史的「真理」，但可以肯定的是，脫離群眾，不顧現實的任何文化或藝術，只是特殊階級的藝術，只是裝點特殊階級的門面，滿足特殊階級虛矯的心理的玩物而已，這樣的文化、藝術只是漂浮在社會上空的雲霧，只像是撒在石頭地上的種子，終必成為歷史的塵埃。群眾憑著他們受西洋文化濡染不深的感官，憑著直樸不虛矯的心靈，憑著他們的直覺和智慧，生命和本能，也許更能感悟到正確和真實的真理，雖

然他們只能表現在「我喜歡」的行動上，而說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來。

用買辦文化
強姦傳統文化

那些口喊「鄉土文化」、「傳統文化」趕時髦、搶鏡頭、作秀的「現代化」智識人，筆者更不掩飾對他們的嫌惡。他們西化了的身影和心態，根本瞧不起任何傳統文化，根本無法理解傳統的精神和價值，但他們却最喜歡鴉舌的胡說八道，強姦傳統文化。例如去年六月下旬文建會辦了一場「明華園」的試演會，邀請「專家學者」觀賞、評論，這些學者專家說什麼「卓別林的造型、卡通的動作」、什麼「服飾及佈景的用色強烈、大膽，令人想到馬蒂斯野獸派的設色」、什麼「動態傳統劇場的典型」、「發揮了平劇『敘述詩劇場、疏離劇場、象徵性劇場、道德性極高的劇場』的特色」、什麼「『歌』的比重顯著的減少，而這點可能是它的長處，因為『以說代唱』可以加速戲劇的節奏」（見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九月九日的中國時報九版）。看這些「專家學者」的論說，我們不得不慶幸，歌仔戲一向為「智識人」所不齒



• 明華園

文藝季，馬戲團

我們倒要問，「文藝季」每年勞民傷財的請些民間藝人表演，除了滿足一下思古的幽情而外，又有什麼文化上的意義？在文化學識上和大眾媒體上充滿聲浪的「現代化」智識人，如果不能謙虛的承認——對傳統文化來說——自己的無知，如果不能以悔罪的心情揚棄西洋文化的標準，重新向文化低下層的群眾學習傳統文化，否則一切只是作秀、應景、拜拜而已，民間藝術只是「文化樣板」，民間藝人，只像馬戲團的動物，逗人笑樂的丑角。試問那一個「智識人」真心喜愛鄉土文化藝術？試問那一個「研究」鄉土傳統文化的「智識人」不是「為學識而學識」？試問那一個「智識人」對傳統民間藝術和藝人發出瞭解的尊重？試問那一個「智識人」在民間藝術裏捕捉、闡發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和價值了？——「智識人」不是不著邊際的胡說八道，就是「以西非中」的強姦傳統。可憐的洪通，除了滿足某些「智識人」作秀的慾望外，他們得到了什麼？「智識人」又得到了什麼？告訴了我們什麼？

難怪民間藝人有太多不合時宜的自覺，也難怪楊麗花要「價值錯亂」，「變」得更符合「智識人」的社會「價值取向」了。

歌仔戲的價值在「詩樂諧合」

歌仔戲能夠吸引人，鼓動廣大社會群眾熱情的原因，與歌仔戲的中心精神是相關連著的，這精神也正是傳統文化的價值所在。

歌仔戲的精神和傳統價值，在語言與音樂的密切結合，也就是在於語言（詩）聲調和音樂（樂）曲調的諧合一致並行不悖。「詩樂諧合」所以唱什麼聽起來就是什麼，唱「男性的復仇」不會誤聽為「男生會福壽」。

「歌唱只不過是語言的音樂化」，音樂與語言的關係是命定而絕對的，不同的語言產生不同的音樂風格也是命定而絕對的。「詩樂諧合」是古今中外任何民族歌唱的基本要求。

中國的韻文學，從詩經、樂府、詩、詞、曲一線下來，幾千年都極端的講求「詩樂諧合」。然而這「詩樂諧合」的傳統在近代及身而絕，「詩樂諧合」的觀念在

當前社會裏有如一團謎霧。對當前「智識人」來說，「詩樂諧合」的說法簡直「空谷足音」，連作夢也想不到這一課題，他們入「庖魚之肆」，久已不聞詩樂不諧的「詰屈聱牙」和「拗折嗓子」了；然而對喜歡歌仔戲的社會群眾來說，他們也許不知道「詩樂諧合」的意思，但他們的神經和感官，無疑的感知它親切的美感和韻味。這正是廣大群眾和「現代化」智識人不同的地方。

附註：關於「詩樂諧合」的意義、傳統、理論、方法和對美學價值觀念的影響，筆者在此無暇多說，請參見「什麼是台灣歌謠——音樂發展的路向問題」，台灣文藝八十六期；以及「台灣風物」第三十三卷第四期以後，王振義先生「語言聲調和音樂曲調的關係——台灣閩南語歌謠的詩樂諧合傳統研究」的一系列連載。

台北西門町洋服店



臺灣的土洋之爭

孫隆基

台灣在資本主義發展下，業已深化生根，造成社會更大分化的結果，在文化上，所出現的「土」、「洋」之爭，一直是交相組合，相互作用的兩種因素。

自從進入了「現代」以後，在中國社會文化體內就出現了「土」與「洋」這兩種因素的並列。「土」是指大陸型的本土文化，「洋」在狹義方面指海洋型的西洋文化，在泛義方面則包括所有外來的影響（例如：蘇聯）。「土」與「洋」的關係就是指這兩種因素的交採組合關係。

這個交採組合是至為複雜的，並不如西化論者認為凡是「洋」的就是針對「土」的那麼簡單。筆者在下文將指出：有些「洋」因素是侵蝕「土」因素的，有的則藉「土」因素發揮作用，更有些反而傾向於將「土」因素加強。因此，什麼是「進步的」，什麼是「倒退的」，就很難說，這兩面往往共同存在於一個現象中。我們凡事都得作出具體的判斷，不能簡單化地將之歸類。

互扣中國式帽子

「土」與「洋」因素之交採組合、進步與倒退傾向的並存，在三十年來的台灣思想界中亦曾出現。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這一段時期，台灣思想界的變遷，基本下很像大陸上從「五四」到「三十年代

新青年



(上) 新青年雜誌
(下) 魯迅向群眾演講



了這樣的局面：左翼文人視「買辦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為一丘之貉，兩者一起打。

但是，七十年代台灣的「鄉土文藝論戰」，在形式上反而出現：現派文學與民族主義派結合，共同打擊西化派的買辦文人。究其原因，是因為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共黨內走的仍然是國際主義路線，因此「民族主義」的旗號就為國民黨所有。中共在思想戰線上的這個偏差，後來就以「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加以糾正——在這個時候，「馬列主義中國化」已經在進行中，最後終於使中共掌握到「民族主義」這個因素。至於七十年代的國民黨，一方面受到保釣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打擊，另一方面因失去聯合國席位而遭到削弱，因此官方視「民族主義」如蛇蠍，「民族主義」已經完全掌握在民間「鄉土派」手中。

然而，這兩個過程除了歷史背景所造成的差異性之外，却也透露出一個共同的規律性：外來的東西，如果是中國人最缺乏也最需要的「個體化」，在開始時可能會十分打動中國人的心，但是總會趁一個最早的時候將它揚棄掉，如果是比較迎合中國人口味的馬列主義，就會讓它生根，

七十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中『夏潮』與『中華』這兩個刊物的統一戰線之上。

官方視「民族主義」如蛇蠍

「鄉土文學論戰」與三十年代左、中

並且將之改裝，倒過頭來去排斥「個體化」；如果是本土的事物，即在開始時是極「右」的，遲早都可以變成「左」的。

臺灣差一點釀成「文革」

的確，「鄉土派」與民族主義派的互相滲透，產生了如下的狀態：一「鄉土派」無疑更傾向於工農，並用馬列主義架構分析問題。民族主義派也有同情農民者，但在內容方面較接近戰前德國和日本的右翼運動中的鄉土本位思想。雖然如此，兩派的「社會主義」都具有濃厚的傳統「平均主義」色彩。兩者都反對帝國主義——「鄉土派」傾向於用馬列主義架構去對待這個問題，民族主義派則較傾向於種族主義情緒，但是兩者都必須調動社會上排外主義的因素，亦即是訴諸群眾落後的一面。兩者都反對資本主義——「鄉土派」的出發點是馬列主義與「平均主義」，民族主義派的立場則包括：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平均主義」，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有將「民生主義」與國民黨搞的國家資本主義等同者，因此，就有點近似三十年代藍衣社提倡的「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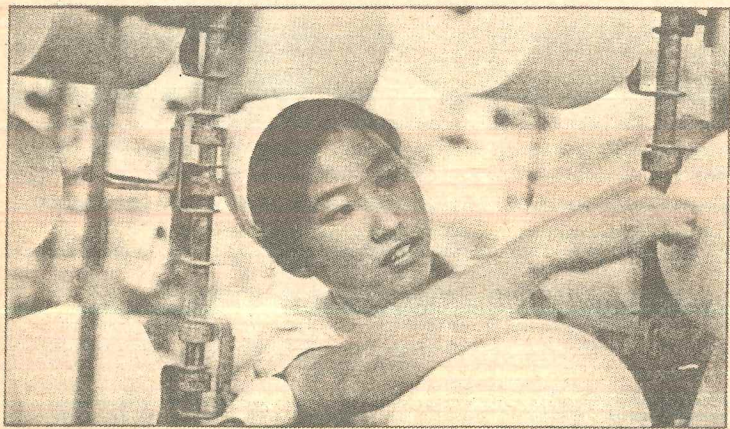
此外，他們評擊某些留美歸國學人為「社會公害」，雖然這些人中也有非善類——例如：亂扣人紅帽子，想借國民黨的刀殺人的那種人——却也不知不覺地訴諸了社會上針對留美學人的剷平主義心態，只差沒有釀成大陸上「文革」時出現的那種廣泛迫害的巨災。

在群眾中生根

筆者對「鄉土派」的這種分析，絲毫沒有貶損他們的意思，只是在肯定他們對民主運動、統一運動、社會運動的貢獻之餘，指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如何地滲入了甚至是最「進步」的運動中。

的確，在中國這個「和合性」文化中，任何搞政治的，要想「不脫離群眾」的話，就必須訴諸落後的因素，例如：權威主義、剷平主義、泛道德主義、「非性化」傾向、「類型化」傾向、鎖國心態，以及左右不分的「愛國主義」，等等。任何「左派」，如果不將這些因素內在化的話，就根本不可能在群眾中生根，而只能變成「托派」或其他什麼的（自然通通可以「類型化」為「托派」）。

筆者實無意深責中國式的「左派」，只是想說明中國文化「深層結構」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事實上，在接觸了「現代」世界以後，中國文化體內產生的「土派」的確是一個可「左」可「右」、忽「左」忽「右」的現象。



• 鄉土派傾向於工農

殖民與反殖民

台灣早期電影活動

● 陳國富

太合理，但至少和本文的論題有兩點密切的關係。首先，台灣的電影活動是在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下展開的。其次，把盧米耶的放映活動當作電影的肇端，給了我們一個啓示：即一八九五年這個歷史性時刻的關鍵，不僅在於一套影片的完成，更重要的是，這些影片是投射給一群觀眾看的。這種「放映」與「集體的觀看」，因此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內容包括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等。同年六月二日，日軍完成接收台灣。再越六個月，法國人盧米耶首次公開在巴黎的大咖啡館中放映「活動影像」；一般公認這是電影時代的正式開始。這個大事記雖然在空間和範疇上都不

成為電影體制形成的重要條件。甚至可以說，往後種種電影的外圍活動（交易、放映、宣傳、片廠、明星：），比少數創作者更能夠界定電影的意識型態本質。

如此的前提一方面避免了「唯心」、「非辯證式」的歷史觀，另一方面也可稍稍緩解我們討論台灣早期電影活動時的尷尬。時至今日，極可能沒有一部台灣攝製的早期劇情片遺存下來（「早期」泛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即使有，我們也無從確定有任何一部完全是台灣人自己拍的。甚至資金、演員、構想皆由台人提供的「怪紳士」（一九三三）和「望春風」（一九三七），也不得不用日人共同擔任導演與攝影。在這種無片可看的情況下，想要做什麼「電影語言研究」或「內文分析」，當然是不可能的。與其對這種創作上的荒蕪和「不純性」感到遺憾（或甚至愧疚），我們不如面對台灣曾經是一個很特殊的殖民地的事實，並以這種「特殊性」為基礎，重新檢視台灣早期的電影活動。

在安德生（Joseph I Anderson）和瑞奇（Donald Richie）合著的「日本電影：藝術與工業」一書裏，有一章節為「背景放映，（1939-1945）」，專述日本及其亞洲殖民地電影工業上的關係。

根據這本書的意見，日本對於佔領地（包括朝鮮、滿州、菲律賓、印尼等等）電影業的扶植雖以教化宣傳為最高目標，但終究加速了當地電影製作的提昇，却是無庸置疑的。安、瑞兩人並下結論道，這應該是軍國主義恐怖戰禍中的一點安慰。這種看法不消說是太過天真了。但即使暫時不和他們抬槓，我們也可以肯定這套公式不適用於台灣。從最初的跡象來看，日本想佔有朝鮮是基於一種帝國主義的「理想」，臺灣對於日本人而言，却是實質利益大過一切；而朝鮮是國家，台灣則是一塊土地。這種心態的差異當然也反映到電影的政策上面，日本政府願意投入鉅資成立朝鮮電影公司，使朝鮮在大戰爆發時能夠保持六部劇情片、十部記錄片的年產量；但對於台灣，日本官方却始終沒有一套電影輔導政策。最多就是偶而的一部政治宣傳片，如「嗚呼芝山巖」（一九三六）；或是把台灣當作有蕃地情調的外景地，如日活出品的「阿里山俠兒」（一九二七，田坂具隆導）和松竹出品的「沙鷺之鐘」（一九四三，清水宏導）。

除了完全的「實用主義」作祟外，日方不熱衷台灣的製片事業和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也有很大的關係。「內地延長

」是日本中、後期治台的一個流行名詞，指日本的官方政策是以台灣為日本領土的擴伸，而非外籍的殖民地。但在實際執行上，這個觀念並未成為「一視同仁」的原則，只是日方壓抑台灣本土性的藉口。在政治經濟上，台灣人從未「享受」過真正的「內地延長主義」。在這種統治心態下，台灣並不需有自己的電影工業，只要日本「內地」把電影拍好送過來演就是了。另一方面，基於同樣的精神，台灣人有自己的電影是不利於日本統治的。因此甚至像「望春風」這樣一部台灣自製，敘述「台灣故事」的電影，也不能用台語發音，只得配上日語。

「內地延長主義」真正的內容台灣人從未享受過，它只是日本壓抑台灣本土性的藉口。

根據現有的文字資料，除去日本官方拍攝的一大堆宣傳紀錄片，截至一九四五年為止，台灣本地製作的劇情片共只有八部。比起「放映」等其他活動，台灣的電影製作是顯得太蕭條了。一九三三年刊行的「台灣總督府第三十七統計書」記載，從一九三〇到三二年，島內的電影院由八家增至二十家；再據呂訴上的「台灣電影



戲劇史」統計，到一九四一年，台灣已有四十九家電影院，演劇、放映混合的戲院還不包括在內。這些數字反映出來的事實很明顯，早期台灣有相當可觀的電影活動（買賣、放映、觀看）。從日片、洋片進口與排片的情形看來，台灣也早在戰前便稱得上是有份量的電影消費市場。

在一般的情況下，電影的生產與行銷愈是和鉅額的利潤結合，電影活動「體制化」的程度也更嚴重。尤其在台灣的統治下，日籍資本家憑仗政治勢力大量壟斷戲院業、影片進口業，造成日片進口在量及放映場所上皆佔絕對優勢的現象。這一方面當然符合殖民地「經濟剝削」的原則，另一方面也配合當局的政治利益（文化宣傳、推行日語等）。然而種種跡象顯示，日本人這一綫的「同化政策」不僅談不上成功，而且應該算是相當的失敗。本文的中心論題，便是試圖透過各種不同層面的現象，說明台灣早期電影活動中「殖民化」與「反殖民化」的矛盾。這個矛盾，最低限度使得符合統治階層利益的「電影體制」，完全不可能存在。

為了方便下面的討論，讓我們再設定一些範圍：

一、在時間的範圍上，本文以太平洋戰

想恐怖，有如此者。」

可以確定，在日人得以明文禁絕以前，電檢是過濾及「嚇阻」中國片的重要關卡。

以一九二九年為例，台灣共進口影片一、五五〇部（其中劇情片一、一四一部），被禁影片三部（皆因公安理由），日本、美國、中國出品各佔一部。看起來很平均，其實却不然，因為中國片進口總數只有日片的二十分之一，美國片的百分之二。再看一九三〇年，日片進口佔總數百分之七十八，美國片與中國片各佔約百分之十，可是這年只有中國片被禁（這項記錄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二年）。在「一切除影片」方面，此年中國片共被剪掉二千七百五十二公尺（其中有一半屬公安理由），美國片只有五百多公尺。到了三一年，中國片的進口量雖然還是和日片不成比例（10%對78%），但被剪影片的公尺數中國片（高達四千六百公尺）却超過日本片。三二年后，中國片雖仍高居「一切除表」的榜首，影片被禁、被剪的數量卻有逐漸減低的趨勢。但這是否意味尺度放寬却大有疑問。關於此點，有條不紊頗值得參考。一九三七年以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事情」第二節「保安」第五章「警察」裏的「

爭爆發（一九三七）以前的電影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這個選擇的理由很簡單：戰事發生後，台灣島必然進入戒嚴狀態；中國片首先遭禁絕，接著全島的電影業（及其他的文化業），皆被半強迫性地「統制化」；及至一九三九年後，影片進口數量明顯的下降，到盟軍開始轟炸台灣時，電影放映已斷斷續續，進入半麻痺狀態。戰爭期間的活動或「非活動」當然也值得探討，但那顯然又是另外一個題目。

二、以影片進口後所引發的活動及反應為順序，我把討論的對象分成六個層面，分別從「電影檢查」至「文字評論」為止。

三、有時某個活動必須和其他層面的活動相互連結，方能顯出其真正的意義，如「電影檢查」與「中國電影」，或「放映」與「日本電影」等。

在日本得以明文禁絕中國片以前，電影檢查是過濾及「嚇阻」中國片的重要關卡。

台灣總督府自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始公佈施行電影（活動寫真）檢查規則。自此進口影片一到碼頭，便需經過報關、驗關手續。至於檢查的方向，大致不

映畫檢閱」欄，有一行小小的備考，聲明本年度進口影片中，已知不獲通過而撤消申請者有三十五部，共計一九八卷，四二、四一五公尺。這分明是變相的「影片查禁」，而且數量比以往「明文記載」時更驚人。至於進口片商在購片時便知難而退者，就更甯提了。

一九三五年，台灣外片的進口與放映進入一個新階段。東京放過過片子，一個月後就會在台北出現。這對日本人意義固然重大，與廣大的台灣人却無關。

若從正規的營業著眼，當時台灣的外片進口與放映要分三個階段。最開始，影片的輸入皆屬於「打游擊」狀態，談不上什麼版權或與影片公司的契約。到了一九一五年，台北的電影院芳乃館（一九〇五年成立）與世界館開始各自與日本的日活、天活兩電影公司接洽，獲得日片在台放映權。但其他各地（如台南的戎座與高雄的高雄座）偷映舊片之風仍盛。據呂訴上在「台灣電影史」中的說法，形質俱全地全島放映權要到一九二三年左右才告確立。一九三五年，日人在台舉行所謂「領台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這個大型活動不僅促成了多家電影院的設立，而且由於福岡到台北的航空線開通，東京放過過片子

出所謂「風俗」與「公安」兩類。然而尺度並不明確。風俗方面，即以「情慾」的表達為例，擁抱可以，接吻不可以，裸體當然不行。至於「公安」，測度的標準就更模糊了。可以肯定的是，直接抨擊或煽動推翻「殖民地」及現行政治體制的作品是不得放行的。一般且公認，既使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中國片進口也是特別受到刁難的。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台灣年鑑」文化篇第六節「電影」一文裏，執筆王白淵寫道：

「日政府對於國產片輸入非常注意，影片……在海關或租用戲院試映給驗關人員觀看，劇情被認定含有革命思想或三民主義思想者均被禁止輸入，如無甚關要故意留難者，知其底蘊，費多少應酬總可以通過，但需要再付一筆輸入稅，當時每套片照重量大概台幣三百元左右。頭關算是通過，尚有一大難關，係總督府保安課，影片商必先將片內劇情大要及對白申請審查，由他們通知審查日期，把影片帶到場將片帶長短尺數量完，以每公尺三分台幣為審查費，付納完備，然後再試映與警察官監閱，片主在另一旁邊照字幕及對白說白，片中如有革命思想或有三民主義行為即有被剪除之例，……可見當時日人對我國思

，一個月就會在台北戲院出現，因此使得台灣外片的進口與放映進入另一個新階段。

對台灣的某些業者和日本人來說，這些發展都是意義重大的。可是所有的「正規」活動，和廣大的台灣人卻沒什麼實質關係。昭和五年版（一九三〇）的「日本映畫事業總覽」記載，台灣有常設電影院十家，皆為日本人經營。（台灣人經營的電影院要到三一年才出現一家。）日本人開的電影院當然沒有規定台灣人不能進去，可是一來這些影院大多放日本片（只有一家放洋片），二來台人似乎政策性地不喜光顧日人戲院。這種「不與日人交」的心態，事實上比現在一般認為的還要嚴重。

台灣人看電影的兩個途徑，一個是以上演本地戲劇為主、間歇放映電影的戲院，另一個是巡迴的放映隊。其中文化協會的「美台團」更是轟動非凡。

那麼台灣人到那裏看電影呢？一個是主要以上演本地戲為主、間歇放映電影的戲院（如台北永樂座），另一條途徑是巡迴的放映隊（昔稱巡業團）。不固定演電影的戲院，日人稱「混合上映館」，一九二九年統計有十二家，到一九四五年則已增至一百多家（其中自備有聲放映機者三

十五家)。巡迴放映隊通常由簡單人員組成，有時甚至完全由一人負責，攜帶影片數部至各地鄉鎮放映。混合館和巡迴隊的共同特點有三：一、皆由台灣人經營，二、大多數放映中國電影。三、收費比正式電影院低廉甚多。其中巡迴隊深入窮鄉僻壤，讓許多當地人得以接觸（中國）電影，意義實不容忽視。

談到電影巡迴放映隊，便不能不提台灣文化協會的「美台團」。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是台灣非武力抗日時期最重要的民族運動組織。根據「台灣民族運動史」的譬喻，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是外交攻勢，台灣青年雜誌（及其後的「台灣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文化協會的活動項目極多，從開辦講習會、學校、組農工會搞罷工，到上演話劇皆包括在內。文化協會的組織及成員，雖帶有濃厚的資產色彩，但其活動却無疑傾向於社會主義理想。其中美台團的活動便是十足具現這種傾向。

一九二五年，文化協會理事蔡培火利用其他同志為其母祝壽的禮金四千餘圓，購買美製放映機一部，影片十數卷，組成電影巡迴放映隊，名為「美台團」。究其放映片目：「丹麥之農耕」、「丹麥之合

作事業」、「紅十字架」、「北極動物生態」等，幾乎全是「非劇情」的教育影片。放映時，一人專管機器，兩人分任辯士，說明影片，俾觀眾易於理解。約半年後，美台團增為兩隊，影片亦持續更換，開始包括一些劇情片，如中國片「工人之妻」（一九二六年，東方第一影業公司出品）。

顯而易見，美台團從事的並不是一般的放映，而是純粹的政治活動，除了收費極微（每人五分），並深入更偏僻的鄉野外，美台團和其他放映隊最大的不同在其全面的「武裝」，充分利用電影放映的每一项政治性潛能：從影片選擇、臨場說明到放映前後時間的「動員」。如美台團有團歌（歌詞當然略帶煽動性），每開映之前，團員必合唱此歌一次，後來觀眾也自然一起高唱起來，聲浪雷動。又放映時皆有警察臨監，經常搞得場面緊張而時起風波。根據當時「台灣民報」報導，美台團的活動幾乎是場場爆滿。

一九二七年一月，文化協會分裂，左傾會員奪權成功，蔡培火退出，但拒不交出美台團產物，使得放映活動逐漸無疾而終。及至大戰期間，所有影片器械於台南遭美軍轟炸時焚毀一空。

一九二七年以後，台灣每年輸入一千部以上的日片，但大多數台灣人並不看日片。這種排斥，當然和台灣人自覺到日人的殖民統治有關。

日本國內的電影生產，在數量方面，自一九二五年起便高居世界之冠，直到五〇年代中期。殖民地台灣當然也是極具開發性的日片消費市場。根據「活動寫真檢閱總數表」，除了一九二六年以前未見統計數字外，二七年後日片輸入台灣每年皆達一千部以上（包括劇情片與其他），平均佔總進口量的四分之一。這種數字再加上電檢政策、日人壟斷的戲院業，日本電影的聲勢自是驚人地浩大。可是大多數台灣人並不看日本片，或說不把日片「看在眼里」。呂訴上的電影史中，便有日片巡迴業者無以為繼的記載。一些上了年紀的本地人，信口談到當時電影時，也會說出「那時沒什麼日本片」的話。這當然是極端嚴重的「錯誤記憶」，可是却相當「忠實」地反映出他們的態度。

為什麼不看日片？安德生與瑞奇在「日本電影」中，也談到日片在台不受歡迎的情形。他們認為：「雖然台灣島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當地的巡迴放映隊也自一九〇五年開始活躍，然而輸入當地的（

日本）電影可說出奇地不受歡迎。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台灣市場可說全未開發。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業者雖然希望送到那裏的影片打上中文字幕，日本政府却堅持保留日文。他們認為，這一方面有利於當地人學日文，另一方面也可懲罰那些不肯學的人。結果很簡單：不懂日文的台灣人乾脆去看中國片。」

這種論點也不知該書作者是什麼想出來的，簡直荒唐。首先，要按照「語言不通」的說法，最難懂的不是日本片，而是歐美各地出品的「洋片」，但洋片却遠比日片受歡迎。其次，要說「打字幕」，應該用什麼語言是很值得商榷的問題。日人據台後實施全面日文教育，台灣人除了上私塾，是學不到漢文的。到了電影大量流入的階段，受日本教育的本籍知識份子已經長大成人。在這種情況下，說觀眾不懂日文而懂中文是不通的。事實上，不管是那一國的電影，所有的臺灣人都看得懂，因為影片放映時必有辯士在一旁「說明」內容，而臺灣辯士一律使用臺灣話。

由此看來，台人不看日片應該是出於「自願」的排斥。這種排斥，當然和同胞自覺到日人各層面的殖民統治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根基在一種和實質利害無關的

反日「情緒」上面。若非如此，我們實難解釋為什麼「歐化」的日本電影，如「卡門」、「孤星淚」，觀眾則願意接受。

當然，大量日本片的消費者大半是在台日人，就如同光顧日人戲院的多屬日人一樣。這使得當時統計觀眾總數的比例為日人七，台灣人三，造成同胞不看電影的印象。但不到日人開的常設館看，並不見得就真的不看。更準確的統計，應該把混合館與巡迴隊的觀眾也算進去。

有了巡迴放映隊、美台團、中國電影日人「統一化」的反抗與排斥。

中國片輸入台灣，前前後後共約有三百多部。這個數字雖不算少，却不及日片一年進口量的三分之一。中國片輸入應該始於一九二四年，影片是「古井重波記」（一九二三，上海影業），「蓮花落」（一九二三，商務），「大義滅親」（一九二四，商務），「閩瑞生」（一九二〇，中國影劇研究社）。依照呂訴上的說法，其後中國片進口的途徑不外：一、直接向上海影片公司購買臺灣版權。二、向廈門買舊片。三、向南洋買舊片。

到底三百多部中國片的詳細片名為何

，現在一時已無法查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片早期大多由混合館與巡迴隊放映，不經報紙廣告，只靠佈告、傳單與沿街叫唱宣傳，而這類資料是難保存的。由此顯示，日人「鼓勵日片，排斥中國片」，盤據正規放映業，事實上也等於連帶壟斷了當時的宣傳媒介（及歷史的記錄）。三百多部中，王白淵在台灣年鑑（一九四七）中曾列出三十多部片名，其中包括許多鄭正秋、張石川、洪深、侯曜、孫瑜、蔡楚生等人的作品。

中國片是特別受歡迎的。這意思就是說，觀眾寧可一集接一集的看「火燒紅蓮寺」、「關東大俠」，也不肯光顧製作水平顯然較高的東洋劍圖片。而一般的時裝片、社會劇，只要不太差，都會引起熱烈的反應。如「孤兒救祖記」、「漁光曲」便都極受歡迎，「一放再放，有的放數次還場場客滿」（呂訴上語）。這種現象，不管是王白淵所說的「當時省人觀國產片頗以為奇，因人情風俗大同小異」，還是呂訴上的「藉此慰安思祖之心」，總之「認同感」有密不可分關係。這種認同感，殖民地時期叫做「民族情操」，平常則可能是「漢族沙文主義」。

社會主義·運動與理論的困境

□本刊資料室

今天社會主義面臨了全新的問題，而且是它前進所造成的結果。但我們不能就此而說：社會主義完了、人民大眾完了！因為那是民衆進步了、強大起來了，所以才出現了未知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難題

◇星野：我從華勒沙在團結工聯活動的那個時候起，就深切地感受到波蘭的問題。不錯，波蘭共產黨和波蘭政府中，存在有種種官僚主義或腐敗，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的。但像團結工聯的那種作為，能夠喚起全體人民；向政府抗議；認真為勞農大眾效勞嗎？我認為，可能不會吧！

波蘭是一個農業國家，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知識差距，我想可能很大。果然這樣，那麼那精明的人，就可能加入共產黨，等出了頭便當起政府的幹部。那麼，在堅持一黨專政的期間，就很可能嚴重地腐敗起來。我想，這可能就是格勒克（E. Gierk）政權吧。這事情，人民大眾是會知道的，那麼大眾中比較進步一類

那麼該怎麼辦？

●武谷：也許是天主教的勢力很強吧。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波蘭國民的九〇%以上是天主教。而天主教所以能夠博得民衆的愛戴，主要的是天主教可以不必做什麼事情。只須聽聽別人的煩惱，談一談神的事情就可以，這一點可真是輕鬆愉快的很。天主教沒有所謂「失敗」的一回事。

◇星野：本來宗教就是沒有失敗的事情。（笑）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武谷：僅憑這一點就可以把聲望保持下去。不過，多多聽取別人的煩惱是一樁很重要的事情，共產黨也不可以忘記這一點。再就是說，波蘭和俄羅斯不同，東歐圈全都有過文藝復興的經驗。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具有比俄羅斯人民更進步的一面，即在文化方面。

再者，波蘭夾在俄羅斯與德意志中間，在歷史上經驗過許多痛苦的打擊。因此他們不肯輕易相信別人，尤其是農民們。那麼該怎麼辦呢，在波蘭這個地方，他們的政治可就不好幹了。

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或是社會主義國家，困難問題都不出在中心的主要國家，而出在較偏遠的國家。從蘇聯看來，波蘭就

的人，就會挺身而出來揭發。這樣一來，就可能出現類似「團結工聯」一類的組織了。可是，這種團結工聯能具有可與共產黨匹敵的組織性、紀律性、思想性嗎？換句話說，他可能具備可與布爾雪維或中國共產黨匹敵的能力嗎？大概不會有吧！我覺得，那裏好像只是聚集了人民大眾的不滿；很自然地把他加以組織起來而已。因此，我不能不覺得，光憑這樣是不夠的。

假定團結工聯掌握到政權了，那麼，勞工肯真心努力工作嗎？農民願意把農作物供給勞工嗎？這，可能會有疑問吧，但你反過來說今天波蘭的——要說他什麼？說他反革命，可能不大好；說他政變，可能也不好；真的，很不容易說得清楚——軍事政權把民主權利通通封殺了，這樣幹起來，農民肯把糧食提供出來嗎？勞工肯工作嗎？這個問題可能要比團結工聯的問題更大了。

這樣一來，至少波蘭共產黨將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即是說，社會主義最艱難的局面，一直到大戰後的今天，方才尖銳地暴露了出來。

●武谷：團結工聯的初期，不曾提出過任何政治性問題。

◇星野：只做了抗議而已。

●武谷：是的。他們得不到滿足，所以要求其它補償吧！他們排列進行，無非是因為工作了也沒有用的緣故。一方面官員們或黨員們又只能空口說白話；要怎樣——又怎樣的。然後才有人說「工聯」應該怎樣怎樣，才出現類似綱領的東西，其中全沒有提到政治性兩字。他們以普通勞工工會的方式出發，由於得不到滿足，所以不滿的情緒就越來越激昂了。

◇星野：當時有些地方同匈牙利事件很相似。比如說，起初是正向匈牙利共產黨當局提出要求，由於匈牙利共產黨態度僵硬，一個一個駁了回去，導致抗議活動迅速擴大，終於使一黨獨裁變得有些奇怪，出現了必須執行歐洲式議會制民主主義才行的聲音。還有人希望北約軍隊駐進過來等，意見很多，最後逼得蘇聯不得不出手干預。

這一次，蘇聯會不會出手干預，還不得而知，總之民衆的要求越來越激烈，有一部分人的意識，可能已經超越過抗議的階段，以為非要取得政權不可。這在波蘭共產黨的一方看來，他們可能已經緊張得快要喊出「反革命」來了……

●農民經過痛苦打擊

是處在偏遠地方，而最有趣的是，波蘭並不與資本主義國家相鄰。因此，81年秋，當大家擔心蘇聯是否會出兵之時，我就在「現代之眼」(十一月號)說過，蘇聯可能不會出兵。這是因為蘇聯這個國家，除非他自己受到軍事上的威脅，否則就不大可能出來干涉，干涉而沒有好處的地方，他也不會去的。從前，捷克和匈牙利都與資本主義國家相鄰，所以他非出兵鎮壓不可。所以他沒有必要去干涉波蘭。

再一個同捷克不同的是，捷克本身會做出不討蘇聯喜歡的事情。即國家的第一書記杜布切克，做過蘇聯所厭惡的事情。波蘭的問題，是出在部分人民的「工聯」，還在與黨無關的階段，這一點多少有些不同吧。還有，當初「工聯」的要求，並未牽連到政權問題。但有關波蘭人或西方人分析波蘭國內社會或農村的問題，您可曾看過？

◆星野：不會看過！波蘭國內或許有。但不可能從自由的立場撰寫吧。縱然有也不會有的作品。從資本主義國家的水進去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也不會有吧。無論是對蘇聯的或是對中國的，或是對東歐的作品。換句話說，以往是在戰鬥體制下，在戒嚴狀態下，既然沒有言論的

自由，就不會有人去做社會狀況的分析吧。還有，不做分析也無所謂，因為是在戰鬥體制下。假如戰鬥體制解除了，那就可能非要有分析不行，沒有分析也不過少了那份累積而已。要說沒有分析就不好，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人民大眾進步了

◆武谷：可是今天的波蘭，都是非做農村的分析與許多事情不可。

◆星野：雖然非做不可，但能做的人可能很少。可能還不懂得方法吧。

◆武谷：還不會受到那種要求吧。

◆星野：這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點。這是當然有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應該會有很好的方法，不是沒有，一定是很難發現吧。換句話說，我們都具有那種條件，我們非要建立新狀況下的新理論不可，但成立新理論的蓄積，起碼在社會主義國家還很貧乏。

從理論上說來，沒有自由的討論，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學問，也不可能會出現有效的學問。可是，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受着帝國主義威脅一天，他就不得不採取戰

鬥體制，也不得不實施戒嚴。這一來，自然不可能有種種的理論了，對不對？所以說今天的局面，已經到達人類所面臨的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節骨眼。

就歷史而言，我想這可能是俄國革命前夕的歷史，也是巴黎公社前夕的歷史。我們已經碰上全新的問題了，而且我們前進的結果，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我們不能就此而說：社會主義完了，人民大眾完了等等。因為那是人民大眾進步了、強大起來了，所以才出現了未知的問題。

再一個就是有關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報。從前，即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種種情報一直被封鎖，以至我們對社會主義，只能說理念上想像。然而無論是東歐的問題也好，好，或是中國文革挫折以來的問題也好，如今都已相當的趨於公開化，也可以相當的獲知社會主義微妙的情報。甚至連日常的他們怎樣生活，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歡樂等事，也可以知道得相當的多。凡這些，都已成為指導新理論非常重要的資料了。

◆武谷：是的。問題是，社會主義不是須要進一步的市民革命呢？(「現代」的理論性諸問題)及羽仁五郎著「續」都市的論理(一九二頁)但最不明白的是農村。

◆武谷：中國的農村擁有悠久的歷史。

◆星野：中共是從農民戰爭中起來的。

◆武谷：是從農民戰爭中起來的嘛。還有在文化上，五千年來一直都有農村的

存在，顯然同蘇聯的農村有些不同。

◆星野：中國農村的水準，好像比較高吧。

◆武谷：智性水準比較高。

◆星野：所以才會有人民公社的設置呀。也就是說農民可以搞工業了。假如是蘇聯，蘇聯的農民可能沒辦法經營工業吧。就這一點說來，中國是利多了，既有蘇聯作後盾，又有五千年的歷史。

◆武谷：因此，當他要在城市勞動者之間搞起來的時候，不就失敗了？中國方面，總之，他是從農民戰爭起來的。

◆星野：只是，人民公社未必辦得很好，現在已經到了非常艱苦的時期，不過畢竟還是要比東歐或蘇聯「一點吧」。那就說城市不缺糧，時而縱然有排隊的現象，那也只是有稀罕的東西才排隊。

◆武谷：這一點有很大的不同。雖說波蘭如何如何，波蘭也不過沒有很多糧食，不容易上手而已，不像我們想像的要比日本戰時更糟。

◆星野：農村的問題也是這樣，不知道有什麼統計沒有。

◆武谷：當然，那統計是很可疑的，但農村的結構實在很難瞭解。

◆星野：有一個問題是，同工業比較來，農業具有濃厚的地區性，所以各國各不相同。甚至一個國家之中都有地區性的差異。實在難以把握。

◆武谷：就因為這樣，在波蘭就是波蘭自己的頭痛問題。農業問題將永遠是社會主義的難題。

◆星野：畢竟社會主義是屬於工人的國家，未必是農民的國家吧……。(笑)

◆武谷：是這樣喲。

◆星野：羽仁先生說的受統治階級保護的鄉村，若情況不得進步，城市的情況也將很難好轉。這項分析，在城市的勞動者說來非常的困難。在勞動者之中將很難出現新的知識階級，從農民之中更是不容易吧。

●農業是社會主義的

永遠難題

◆武谷：問題是，所謂農民的社會主

是處在偏遠地方，而最有趣的是，波蘭並不與資本主義國家相鄰。因此，81年秋，當大家擔心蘇聯是否會出兵之時，我就在「現代之眼」(十一月號)說過，蘇聯可能不會出兵。這是因為蘇聯這個國家，除非他自己受到軍事上的威脅，否則就不大可能出來干涉，干涉而沒有好處的地方，他也不會去的。從前，捷克和匈牙利都與資本主義國家相鄰，所以他非出兵鎮壓不可。所以他沒有必要去干涉波蘭。

再一個同捷克不同的是，捷克本身會做出不討蘇聯喜歡的事情。即國家的第一書記杜布節，做過蘇聯所厭惡的事情。波蘭的問題，是在部分人民的「工聯」，還在與黨無關的階段，這一點多少有些不同吧。還有，當初「工聯」的要求，並未牽連到政權問題。但有波蘭人或西方人分析波蘭國內社會或農村的問題，您可曾看過？

◆星野：不會看過！波蘭國內或許有。但不可能從自由的立場撰寫吧。縱然有也不會有好的作品。從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去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也不會有吧。無論是對蘇聯的或是對中國的，或是對東歐的作品。換句話說，以往是在戰鬥體制下，在戒嚴狀態下，既然沒有言論的

自由，就不會有人去做社會狀況的分析吧。還有，不做分析也無所謂，因為是在戰鬥體制下。假如戰鬥體制解除了，那就可能非要有分析不行，沒有分析也不過少了那份累積而已。要說沒有分析就不好，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 人民大眾進步了

◆武谷：可是今天的波蘭，都是非做農村的分析與許多事情不可。

◆星野：雖然非做不可，但能做的人可能很少。可能還不懂得方法吧。

◆武谷：還不會受到那種要求吧。

◆星野：這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點。這是當然有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矛盾。應該會有很好的方法，不是沒有，一定是很難發現吧。換句話說，我們都具有那種條件，我們非要建立新狀況下的新理論不可，但成立新理論的蓄積，起碼在社會主義國家還很貧乏。

從理論上說來，沒有自由的討論，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學問，也不可能出現有效的學問。可是，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受着帝國主義威脅一天，他就不得不採取戰

鬥體制，也不得不實施戒嚴。這一來，自然不可能有種種的理論了，對不對？所以說今天的局面，已經到達人類所面臨的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節骨眼。

就歷史而言，我想這可能是俄國革命前夕的歷史，也是巴黎公社前夕的歷史。我們已經碰上全新的問題了，而且是我們前進的結果，所以才會這樣的。我們不能就此而說：社會主義完了，人民大眾完了等等。因為那是人民大眾進步了、強大起來了，所以才出現了未知的問題。

再一個就是有關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報。從前，即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種種情報一直被封鎖，以至我們對社會主義，只能說理念上想像。然而無論是東歐的問題也好，或是中國文革挫折以來的問題也好，如今都已相當的趨於公開化，也可以相當的獲知社會主義微妙的情報。甚至連日常他們怎樣生活，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歡樂等事，也可以知道得相當的多。凡這些，都已成爲指導新理論非常重要的資料了。

◆武谷：是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是不是須要進一步的市民革命呢？(「現代的理論性諸問題」及羽仁五郎著「續·都市的論理」一九二頁。)但最不明白的是農村。

◆星野：農村的問題也是這樣，不知道有什麼統計沒有。

◆武谷：當然，那統計是很可疑的，但農村的結構實在很難瞭解。

◆星野：有一個問題是，同工業比較來，農業具有濃厚的地區性，所以各國各不相同。甚至一個國家之中都有地區性的差異。實在難以把握。

◆武谷：就因爲這樣，在波蘭就是波蘭自己的頭痛問題。農業問題將永遠是社會主義的難題。

◆星野：畢竟社會主義是屬於工人的國家，未必是農民的國家吧……。(笑)

◆武谷：是這樣啣。

◆星野：羽仁先生說的受統治階級保護的鄉村，若情況不得進步，城市的情況也將很難好轉。這項分析，在城市的勞動者說來非常的困難。在勞動者之中將很難出現新的知識階級，從農民之中更是不容易吧。

● 農業是社會主義的

永遠難題

◆武谷：問題是，所謂農民的社會主

義意識革命，要怎樣才能做好？

◆星野：這事情，即使立刻建立起集體農場也絕不能算是完全。換句話說，集體農場中殘存有前近代性和官僚性的事物，蘇聯也試辦過集體農場，一如當初所期待的，不過是否真的一如當初所期待的，我們不得而知，總之好像效果並不怎麼好。中共則設立了人民公社，型態與蘇聯的不同，好像要比蘇聯的□一點。因爲糧食產量不像蘇聯的那麼□。

◆武谷：而且還有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與種種的經過嘛，所以要到達社會主義以前，很明顯的，還有許多農村的問題吧。

◆星野：那是有的，我想，畢竟還是毛澤東的創意吧。

◆武谷：是的，毛澤東不是採用農民戰爭的方式戰鬥過來的嗎？

◆星野：說得是，再就是他見過蘇聯的經驗了。已經明白不可以那樣的設置農場，而背後又還有蘇聯的力量，所以中央可以不必徹底控制農村、農村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性；可以搞副業；也可以辦工業等等。像這種歷史性的情況，其實背後是已經存在有蘇聯的撐力。有蘇聯社會主義作後盾，所以才能夠這樣。單憑中共自己，人民公社可能辦不起來吧。

◆武谷：中國的農村擁有悠久的歷史。

◆星野：中共是從農民戰爭中起來的。

◆武谷：是從農民戰爭中起來的嘛。還有在文化上，五千年來一直都有農村的

存在，顯然同蘇聯的農村有些不同。

◆星野：中國農村的水準，好像比較高吧。

◆武谷：智性水準比較高。

◆星野：所以才會有人民公社的設置呀。也就是說農民可以搞工業了。假如是蘇聯，蘇聯的農民可能沒辦法經營工業吧。就這一點說來，中國是利多了，既有蘇聯作後盾，又有五千年的歷史。

◆武谷：因此，當他要在城市勞動者之間搞起來的時候，不就失敗了？中國方面，總之，他是從農民戰爭起來的。

◆星野：只是，人民公社未必辦得很好，現在已經到了非常艱苦的時期，不過畢竟還是要比東歐或蘇聯□一點吧。那就是說城市不缺糧，時而縱然有排隊的現象，那也只是有稀罕的東西才排隊。

◆武谷：這一點有很大的不同。雖說波蘭如何如何，波蘭也不過沒有很多糧食，不容易上手而已，不像我們想像的要比日本戰時更糟。

◆星 野：蘇聯在二次大戰後依舊缺糧，這顯然不是運銷的問題，而是生產的問題。換句話說，集體農場做得太勉強，農民有反感，要抵制，不願生產更多的糧食來供給城市。波蘭的情形可能不是這樣，波蘭農民一定是作了就可以賺錢，賣了也可以賺錢，只是政府常常做些不必要的干涉，造成農民要賣就賣黑市了。農村裏可能還有富農和類似新經濟政策時代的黑市捐客，在連繫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交易。假如沒有城市與農民之間的捐客，富農就賣不出糧食，富農所以能夠大搖大擺，顯然有捐客的存在。

●武 谷：這大概就是問題所在了。爲什麼直到今天還有大搖大擺的富農呢？中共好像沒有這樣大搖大擺的富農吧。

◆星 野：地主真的被打倒了，因爲是從農民戰爭起來的嘛，所以中共的地主確實被打倒了。這與東歐的情形不同。

●武 谷：這一點可真有趣。

社會主義的思考

◆星 野：蘇聯在史達林掌權以前，布

爾雪維克也與富農勾結一起。卡爾（E. H. Carr）這麼說過，波柏（K. R. Popper）也這麼說過，大概不會錯吧。換句話說，只要富農得些社會主義式的好處，布爾雪維克就會在冠冕堂皇的名義下跟着背後走，布爾雪維克本身就同富農勾結而腐敗下去。像波蘭那種情形，富農都沒有滅絕而繼續存在，共產黨當然會像蘇聯一樣同富農勾結一起。換句話，新經濟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了。可是「史達林」却還未能出現。

然而不出則已，一出便是比史達林更粗魯的了。像彼爾路特（B. Bierut），簡直就比史達林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就又出現了哥默卡（W. Gomułka），其次是格勒克（E. Gierek）。格勒克政權可能同彼爾路特不一樣，或許有更多的資本主義式的腐敗而不是史達林式的腐敗。然後就換卡尼雅政權，一直到現在。那麼這社會主義面對着今天的艱難困苦，却是自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期社會，所以這社會主義當然帶着資本主義式的因素。所以說所謂社會主義中的矛盾，其實就是從資本主義帶過來的矛盾。不過即使這樣，還是應該把它當作是社會主義本質上的矛盾才行。換句話說，這不是假性



矛盾，而是本質性的矛盾。

●武 谷：這是對的。生產的社會體制依舊保持着資本主義，只有政權被改成社會主義了。這就表示根本上還保留着矛盾的意思。要說是保留還是說由此出發，總之，今後就要在社會主義之中變換成新的

矛盾了。

嘗試錯誤

和劃一性思考

◆星 野：本來所謂的社會主義，依照恩格斯的話，那就是「以往，人類是跟着經濟法則和政治法則打轉。現在，則人類掌握着政治法則和經濟法則，加以驅使、加以實踐，已由人類來任意的控制政治經濟了」。那麼，究竟什麼叫做政治法則或經濟法則呢？這可就難說了。它既不是物理化學那樣的法則，就算機械或材料等

，也不見得是按照什麼法則在變動，當然客觀地說來確實也在變動。但法則是眼睛所看不到的。所以只能憑經驗或是嘗試錯誤來把握。

技術都是這樣，所以政治和經濟可能更是這樣，因爲未知的因子很多，變數也太多了。這要以法則來把握，究竟能怎樣去把握呢？這種基本上的問題，其實並不能怎麼被瞭解。

所以，雖然社會主義說要把握政治經濟的法則；客觀地加以運用，你若問起，那麼，那是什麼法則時，那就只能提總論性的，譬如抽象引用馬克斯、恩格斯、列

寧、毛澤東的話來解釋，若說具體的，你的公司經營要怎麼辦？每天的生活要怎麼辦？科學技術的戰略要怎麼辦等，這時候，馬克斯主義便可能還在有總論而沒有分論的階段了。

這種難題，社會主義本來就具有。若是在戰爭體制下，這可以運用強權來把政治收緊，但若是戰爭體制緩和下來之後，強權就可能不濟事了。這樣一來，還是須要依照民衆的討論、實驗，或是一步一步來做。那麼這時候要怎樣把法則演化成理論來把握呢？這就成了實際問題，如此一來，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就是總論性的而不是分論性的了。

●武 谷：這還有一個好處。也就是說，在實踐上還保留有可作種種事情的餘地，這也是好的。

◆星 野：總之，那是具有變動性的了。●武 谷：對。那是須用辯證法的思考方法來處理才行。基本線是如此如此的事情是有的，但那會怎樣出現呢？爲此，非要能掌握邏輯上極具因素性的事物不可。因爲複雜的事項規定得並不多。

◆星 野：所以，一方面搬出非常單純的法則，以爲是要做劃一性的思考，一方面却又採用非常個別性的經驗式嘗試錯誤。



●列寧

●武 谷：所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這回事，我的三階段論也是一樣，只是碰到現實的分析時，就拿那個範疇來分析分析而已，並不是那種因為這樣所以那樣之類的推斷。

星 野：怎麼說？

●武 谷：不是常常有人說用我的三段論法，可以明白實體論式的事情，但要想進一步接觸本質論，就不知道應該如何做。可是，那只是要進行其時的分析的範疇而已……。

◇星 野：是分析用的基本性視點，不是分析用的騙人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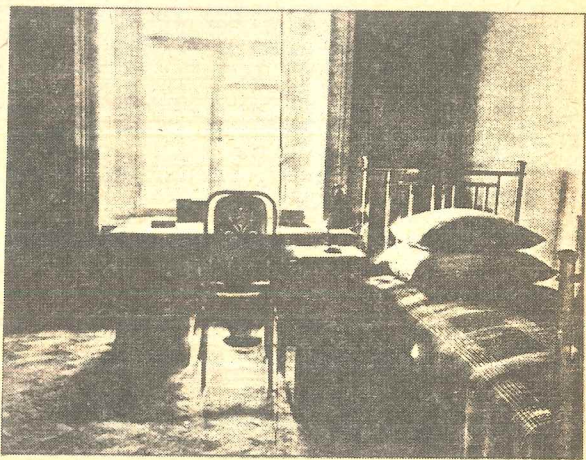
●武 谷：分析的方法，會因其時的對象而有所不同。只是說分析的範疇是如此而已。

◇星 野：不過就算是騙的手段，實際上也會有辯證法式的演變。

●武 谷：這是不不得不做的事情了。不能說這次用這種方法，下一次也可以用同一方法。光憑形式上的論理是不行的。

◇星 野：所以說，馬克思主義乍見好像很抽象，一見又好像很有現實性。

●武 谷：總之，那絕對不是形而上學。若是形而上學，一經決定的事情只要一直做下去就行了。



●列寧的工作室和臥房

過度時期的矛盾

◇星 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一見好像很矛盾，一邊非常抽象，很有道德性，一邊却又非常現實，很有實利性。

●武 谷：對，對。所以不能從形式的論理去思考，必須從無形的因素性的，原性的論理、辯證法的論理去分析才行。

◇星 野：但要取得均衡，可能很難吧。

●武 谷：所以必須經常做分析的討論

才行。

◇星 野：同時也非要有抽象的原則論的討論不可。

●武 谷：可是你在蘇聯要想演講什麼，而要知道馬克思曾經就此事說過什麼話時，只須一通電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馬上就會回答你在資本論的幾幾頁或是什麼書的幾幾頁裏有什麼記載。

◇星 野：大概有類似電腦的資料庫吧。

●武 谷：可能有。不過有一次，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國內發表了一篇綱領性的理論。不料，德國共產黨立刻反應過來說，馬克思不曾說過那種話。(笑)

◇星 野：可見東德也有資料庫。(笑)

●武 谷：可能是引用錯誤吧。像這類事情，真的查得很詳細。不過不管怎樣詳細閱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可能不會有任何答案。對此事應該有所瞭解才行。

◇星 野：這又是馬克思的本質了。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這樣的東西。

●武 谷：但，有人能夠瞭解是很好的事情，若瞭解而至被拘束，那就糟了。那畢竟是從十九世紀的社會情勢中所產生出來的問題。

◇星 野：所以說，連因素都要把抽象

不是創造性了。所以在原則上是嘗試錯誤。沒有原則的嘗試錯誤，錯得再多也活化不起來。若是有原則，有了錯誤，錯誤就會活化起來。

◇星 野：這原則又是唯物辯證法，所以說起來很麻煩。這若是形式理論，那就簡單多了。所以在抽象性階段要多加以思考本身，就是相當藝術性的、策略性的事情。也就是很難說的事情了。所謂的哲學就是這樣。

●武 谷：所以對我的三段論法，有種種的人提出種種亂七八糟的批判。從流動性論理、抽象性因素性原理出發的一個典型，就是常常提到的物理學微分方程式的論理。這是沒有形式的，若把種種條件積分起來，在其原理可以成立的範圍內，可以適用於種種形式的現象。

對於社會，像這種原理性的事物，我把它看作是「特權和人權」(勤草書房刊行)，由此把階級或其他差別現象導引出來。若到此把它當作是無形式的因素性原理，那麼無論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可以作為分析種種體制所出的諸種現象的論理而有所助益。

(待續)

論理和現實性統一起來，這真像是一種才能。類似音樂或繪畫等藝術的特殊才能，極具敏感、直感、感性，而且是論理性吧。這大概不會每一個人都具備有的……。

●武 谷：決不是說多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就能具備那種才能。越是拘執將越糟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列寧是順着情勢適時提出理論，也就是適時地，因應客觀情勢而作的。我想可能這樣才是真的吧。物理學也是這樣。若要說，這要這樣作，那要那樣作就好，那就是形而上學而不是物理學了。

◇星 野：馬克思主義乍見起來就是那樣融通無阻，變幻自在。否則，馬克思主義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了。若要作劃一性的思考，認為可以融通無阻便是無原則；既然變幻自在那便是無節操的話，那就不對了。只要原則是明確的，那就可以有相當程度的融通無阻和變幻自在。若是沒有原則那就不用提了。不過，原則和融通無阻、變幻自在之間，要如何取得平衡，那就困難了。

●武 谷：所謂原則的論理，我就常說非是立體性的論理不可。換句話說，本質性的原則和現象之間，存在有種種的媒介

項。然後種種的論理就會越來越複雜而出現於現象面。只要能以這種論理性加立體性的論理去掌握本質性的事物，那就對了。否則要以直接連結起來，那就會變成形而上學或形式理論，也就是以形式去思考的理論。

立體化去掌握本質

◇星 野：無論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有很多形式論理。非常的劃一性。不過，要把抽象性論理和現實性問題綜合起來把握，可能須要藝術性的直感吧。(笑)沒有素質也不行吧。所以毛澤東就不是藝術家，列寧也一樣。

●武 谷：那是對的了。

◇星 野：反正起初一定有謀略性的意圖，然後把大道理附在背後，其實，在人民公社成立當時，毛澤東也說得很好。不久，好像毛澤東自己都想到「太過份」。毛澤東自己也這樣講過。不過當初他能憑着謀略性的意圖而認為可以做起來。稍後又一定想過是不是可以做，回頭再想可以做等等。

●武 谷：這通常都是這樣，不這樣就

「夏潮」向大家約稿

一、夏潮是人人園地，歡迎下列稿源：

1. 「特別企劃」—以現實問題，探索台灣本土；為人民討回公道，為社會追究真相。（稿長六千至八千）。
2. 「工人廣場」—既稱「廣場」，就是開放的，也是一個運動的集合地。尤其歡迎勞工自己寫，自己說話，用你們樸直無華的筆，教育社會。（稿長不限）。
3. 「夏潮報告」—下鄉農村，寫筆記，作調查研究，為找回美麗臺灣，提供社會報告。（本刊願支援人力、財力，協助作者調查。稿長限六千至一萬五千）。
4. 「生活與環境」—反污染、反公害（稿長四千至五千）。
5. 「環球經濟」—反對台灣接受殖民經濟，揭穿官商壟斷資本，為中小企業的苦水說話（稿長限四千至五千）。
6. 「每月評論」—想說的話就寫（稿長二千至五千）。

二、竭誠歡迎海内外作家共同耕耘，新一代青年加入筆陣。

夏潮編輯部啓

●「Kink」的漢字

寫法是「罌」

接到一九八四年新版三月號。編排印刷的確煥然一新，祇是內容多側重於意識型態的爭論。倒希望島內雜誌能夠多做點基層結構方面的探究和鑽研。

這是讀者對編者的一點關於一般性的建議，還有一點特別要說的是，在「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一文裏，作者洪鯤先生提到那台灣話「ㄟ」，漢字怎麼寫的問題。

□讀者來函□

那台灣話「ㄟ」漢字的寫法是「罌」，普通話的讀法和「罌」字相同，其實以漢文台灣話讀起來「罌」「罌」雖不盡相同，卻也相去不遠。罌米：（名詞）是古代指用煮熟的米飯或麵食搗成的乾糧。（形容詞）則是形容物之軟而韌。

僅此，作為讀者與作者的

一點點共同勉勵。

加拿大 莊宏琪

●梁景峯來函

我「不曾參與一九七二年『現代詩論戰』，又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噤默不語」（陳映真：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文季一卷五期，頁廿五），「當鄉土文學論戰方酣，帽子滿天飛……嚇得噤若寒蟬，不敢吐一口氣」（吳德山：走出「台灣意識」的陰影。夏潮論壇一九八四年三月號，頁四四），已不夠資格談台灣鄉土文學，更別談什麼台灣意識了。不知貴刊是否恩准我以讀者的身份，寫讀者投書，對貴刊的文章，發表讀者的意見？

1. 吳德山指責「『台灣意識』論者（如宋冬陽之流）」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嚇得噤若

寒蟬，不敢吐一口氣」。請問吳德山先生是否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文學的大將？不然，他何有資格也「洋洋二萬餘言」，大談文學，大批判別人的文學論？

2. 吳德山指責「宋冬陽之流」「現在卻跑出來竊奪果實，攘「鄉土文學」為己有」。請問吳德山是否認定鄉土文學何人所應獨有？

3. 吳德山指責宋冬陽「拋掉『中國意識』」，吳德山是否以政治打手自居，要用他的「客觀世界」，他的「真理的巨石」，去砸別人的腳，把別人砸得「頭破血流」，才合他的本色？

讀者的回響應該在原刊物刊出，這樣才能不負「論壇」之名。

編安
梁景峯
1984.4.12
註：疑問引號內的文字皆引自

吳德山的文章。

●江鵬堅來函

立法委員江鵬堅來函：

前承貴社不棄，聘任本人為法律顧問，至感榮幸。頃因本人自二月一日起就任立法委員，依法院內規，在任期間不得執行律師業務，為恐引起不必要之爭疑，請准辭卸法律顧問職銜，不在雜誌上表彰。

本人初涉政壇，經驗缺乏，學養不足，困窘處境，當可想見，惟自信一本追求民主信念，無私無我，橫逆之來，聽其自然，只期坎坷路上，有志一同，互勉互勵，鞭策指教，貴社多年照拂，今後仍盼支持，以匡不逮，先此申謝！

專頌

社務發達
江鵬堅 敬啓
73.4.2